

# 中共党史资料

1950 年全国主要工业及交通基本情况

仙台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反帝革命活动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

1959—1961 年美国对西藏事务的干预

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胡耀邦在华北战场上

关于“毛泽东预言美军仁川登陆”的时间考

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73

总第七十三辑

2000年3月出版

0104117

D239  
6: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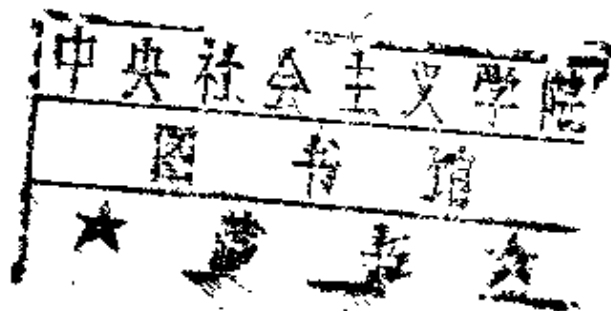


\*201041176\*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十三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北京

主 编:李海文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常务)  
文献编辑:王晓峰  
执行编辑:陈 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73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3  
ISBN 7-80136-350-7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9)第17181号

### 中 共 党 史 资 料 (73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北门10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 7印张 160千字

2000年3月北京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

ISBN 7-80136-350-7/K·306

定 价:10.00元

DH84/3412

## 目 录

### 文献资料

- 1950年全国主要工业及交通基本情况  
.....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1)  
附:新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概况..... 姚甲科(27)

### 回忆录

- 仙台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反帝革命活动 ..... 苏子衡(34)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 ..... 李初梨(43)  
父亲的故事 ..... 王 炯(50)  
忆周总理二三事 ..... 武吉次朗(55)

### 专题资料

- 1959—1961年美国对西藏事务的干预 ..... 路 威(58)  
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 雷 厉(77)  
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 卜伟华(100)  
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与郭沫若..... 穆 欣(127)

### 人物介绍

- 五四闯将韩麟符..... 马熙群(112)

胡耀邦在华北战场上····· 钱 江(153)

刘涌与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 薛宪明(166)

### 史 实 考 证

对周维炯任职的辨证····· 徐修宜(180)

关于“毛泽东预言美军仁川登陆”的时间考

····· [韩]徐相文(184)

### 小 资 料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介绍

····· 王伟红 贺秀红(193)

### 译 文 选 登

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

····· [俄]阿·莫·列多夫斯基 著 陈春华 译(196)

# 1950 年全国主要工业及交通基本情况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

## 电 力 工 业

(一)目前全国电力工业发电容量总计约 1,932,000 瓩(台湾不在内),内中公营电业(包括国营及省政府领导的电业和国营及省营各工厂备有发电设备者在内)占 75%,私营电业(包括私营电厂和各私营工厂备有发电设备者在内)占 25%。以地区来划分,东北居首位,计 36.1%;次为华东,计 32.9%;再次为华北计 18.1%;中南占 8.2%;西南 3.5%;西北 1.1%。如以主要产地来划分,上海居首位,计 13.6%;次为丰满计 7.4%;再次为天津、抚顺、北京、唐山等地。上海的电力工业内中约 99% 是私营的,其中外商上海电力公司复占绝大部分,合计占全上海总发电容量的 72.2%,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1950 年全国发电度数预计约 50.4 亿度(包括向国外购电  $580.5 \times 10^6$  度在内,台湾部分不在内),其分布情形大概如下:东北 43.8%,华东 27.0%,华北 18.5%,中南 6.3%,西南 3.8%,西北 0.6%。

(三)1936 年全国发电容量,除东北部分,因缺乏资料无从统计外,其余关内部分,连工厂自备发电设备在内,共约 872,813 瓩\*,约合目前关内发电总容量 1,233,987 瓩之 70.7%。同年全国

发电度数除东北部分外,其余关内部分连工厂自备发电设备发电度数在内,共约 26.4 亿度,较 1950 年关内发电量预测数 28.35 亿度,少去约 6.9%(\* 此项数字系根据前建设委员会所编中国电气事业统计第七号内所载列入)。

(四)关于原材料供应方面,除水利发电厂无须耗用燃料外;火力厂方面,1936 年计燃用煤斤约 231 万吨,柴油 4.3 万吨,1950 年预计须消耗煤斤约 294 万吨(照每公斤 7,000 卡之标准煤计算),柴油约一万吨。

## 煤 矿 工 业

(一)全国煤矿 1950 年产量约为 3,900 万吨,若照各矿现有设备能力则尚可增加 9%。

按地区分:东北、华北两区占总产量之 76.2%,华东占 13.9%,三区共占总产量之 90.1%。

按公私关系来说:公营矿占 71.3%,私营矿占 26.2%(其中开滦一矿即占 10.3%),公私合营矿占 2.5%。

我国煤矿被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生产技术落后。东北方面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专以掠夺我东北资源为目的,除了抚顺、本溪而外,其余都是小斜井,每日产煤 500 吨的矿井极少。工人的生产效率很低,保安设备很差。西南、西北两区则因交通不便,煤矿工业相当落后。鲁南煤田如新泰、莱芜、峄县等处,为华东优良之炼焦烟煤。而淄博、贾汪、淮南等矿所产煤,均不能炼焦。故为保留将来冶炼工业所需焦煤计,对鲁南煤田,目前似不宜大量开采。

(二)全国销量 1950 年预计约为 3,700 万余吨,产销比较全年约多 210 万吨(1949 年底存煤在外),占总产量之 5.4%。华北一区即占 180 万吨(开滦占 150 万吨),占华北区产量之 12.2%。

出口煤约占总销量之 8.5%，东北煤输出以苏联及北韩为主，华北煤输出以日本、南韩为主。

我国在解放以前，历年来开滦、中兴、抚顺等矿的煤输出日本的很多。据 1943 年的统计数字，输出煤量达 743 万余吨。因此可以知道我国煤矿的生产量一向是超过国内需要量的。但是有些地点如广州、西安、贵阳、兰州等地，则感煤不够用。为配合今后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并避免运输力量的虚耗起见（煤为笨重货物），就近解决这些地点的用煤问题，似属必要。对于下列各煤田，应详细调查钻探并早日开发：

1. 湖南的资兴煤田；
2. 陕西的渭北煤田；
3. 川北的绵竹、广元煤田；
4. 贵阳的林东煤田；
5. 甘肃的阿干镇煤田及景泰、靖远煤田。

（三）全国煤矿工人共约 33 万余人，国营各矿工人占 78%（约 25 万余人），私营各矿工人占 18%，公私合营各矿占 4%。除少数矿外，各矿均感工人太多。主要机器设备除国营中之国营各矿及私营中之开滦煤矿有相当规模之设备外，其余公私营各矿之设备均不甚大，多数小矿仅有水泵一两座而已。

## 石 油 工 业

（一）我国石油自产甚少，历年多靠进口，1946—1948 年三年平均每年进口 1,367,867 吨。

1950 年，自产原油 226,000 余公秉，炼成汽油 41,800 余公秉，煤油 10,800 余公秉，柴油 46,500 余公秉，燃料油 67,600 余公秉，润滑油 863 公秉，天然气 1,825,000 余立方公尺。全部为国营。



需要方面,除天然气因未确定用途未能尽量利用外,其他各种油品均感不足。目前汽油需要量比产量大 84 倍,煤油大 24.6 倍,柴油大 5.7 倍,燃料油大 2.4 倍,润滑油大 58.7 倍。

(二)目前我国产油,可以分为下列五种:

1. 以天然石油提炼的在西北区,甘肃玉门酒泉永昌一带,储量估计约 20,500 万桶,以日产 2 万桶计,可供三十余年之用,但确实数量须待三年钻探,方能知道。陕北区目前产量很少,该区储量若干,现尚不能估计。

2. 天然气在四川。储量颇大,现有生产井二口,年产量约 14,000,000 立方公尺,隆昌井尚未决定用途,暂予封闭;巴县井,供短程汽车及重庆轮渡代汽油之用。

3. 以煤提炼的在锦州。目前虽已修复,尚未试炉。

4. 以油页岩提炼的在抚顺。油页岩储量约 50 亿吨,平均含油 5%,可产油量 2 亿 5 千万吨,因东炼油厂设备破坏,西炼油厂设备陈旧,所以近年生产不多。1950 年生产原油 10 万吨,所炼汽油柴油品质均不好。

5. 进口原油提炼的工厂在上海、大连、锦西三处。

(三)存在的问题

1. 中国石油工业历史甚短,技术干部不够,打井的在目前还足用,发展时不够,炼油的现在已感不足,所以培养技术干部是十分迫切重要的。

2. 西北的油田,应赶快打钻,证实其储量,以便尽早开发。并将铁道早日修成以利运输。

3. 四川的天然气应设法利用,只要有了用途,便可发展起来。

4. 从煤炼油,不论是氢化法和合成法,我国的技术及经验都没有,德国在这方面技术最高,应请东德的技师来设计指导经济的生产方法,否则必多浪费。

5. 抚顺油页岩以储量论是富矿,以含油量论是贫矿,惟西区的页岩,是煤矿的副产,当然应予制炼。东区油页岩将来提炼时,如技术方面不搞好,便不经济。目前西炼油厂提炼出来的汽油柴油,品质不好,不易销售,应研究改良。

## 钢 铁 工 业

### (一)生铁及土铁

1. 我国因炼钢及机械工业未与炼铁工业配合,故生铁产量超过需要。生铁生产最高产量曾达 1,895,184 吨(1943 年)。土铁产量最高曾达 140,250 吨(1936 年)。1950 年计划生铁生产量为 871,880 吨(最近修正者),其中东北占全国 82.1%,次为华北占全国 17.8%,华中仅计划生产 1,200 吨占全国 0.1%。土铁生产本无计划,按照目前情形大致估计 5 万吨左右。

2. 1950 年生铁大致可销 650,000 吨(连炼钢用生铁在内),约多余 20 余万吨。土铁大致产销平衡。

3. 现有生铁设备未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在一相当范围内增加炼钢设备以求配合,实为必要。

4. 生铁均由公营工厂生产,土铁则全由私营工厂生产。四川私营厂中且有新式炼钢炉设备,惟规模甚小,均属战时设备,现在停工中。

### (二)钢锭

1. 产量最高曾达 852,000 吨(1943 年)。1936 年产 350,000 吨。1950 年全国公营工厂计划产量仅 646,302 吨,其中东北占 84.6%,华北占 11.8%。私营约生产 2,000 吨左右,因不能分地区,故未列入表内。

2. 全部钢锭均供轧钢用途,故钢锭产销是平衡的,以整个需要

言,尚不敷轧钢厂之需要,致许多轧钢机尚感缺乏钢坯之苦。

3. 品质方面尚须努力改进。原料方面,电炉及平炉依靠废钢为主要原料,而废钢原料日少,将来炼钢原料宜有所变更以求适应环境。

4. 私人炼钢炉上海及重庆均有,重庆方面现在停工中,上海方面在开工中,按其生产量估计现时每年不过 2,000 吨左右。

### (三)钢材

1. 1950 年国内全国公私共产 446,898 吨,其中公营工厂计划生产量为 435,898 吨,占全国 97.5%。而东北区占全国公私总数的 77.2%,占全国公营数的约 80%。私营方面据估计上海约生产 10,000 吨,平津约 1,000 吨,合计 11,000 吨,占全国 2.5%。

2. 1950 年销售量约 300,000 吨。大致多余 146,000 吨左右。

3. 现在轧钢设备只能轧小型中型,钢板方面只能轧中板、薄板生产量甚少,供不应求。钢轨虽可自轧然设备远在四川,除产品供西南外,经济上不能外运销售。现在存在的问题,即部分材料不能自给自足,一部分钢材则供过于求。但品质方面须大为改进,钢板之厚薄不匀及夹灰。元铁方铁发生灰心焖心毛病。若不早日改进,恐销不出去。

4. 私营工厂向赖旧船钢板、旧轨及旧铁为原料,近则供应日少,将来必须由公营工厂供应钢坯方能生存。

### (四)焦炭

1. 焦炭生产能力超过需要,1950 年公营工厂计划生产 1,269,771 吨。其中东北占 80.5%,华北占 19.5%,土焦方面无资料。

2. 1950 年生产供过于求,大致多余 10 万吨左右。

3. 国内所产之焦,灰份均高,应提高洗煤效率,使焦炭品质提高。

4. 私营土焦销路供求相应,未闻发生困难情况。

## 机 械 工 业

### 一、机械工业概况:

1. 私营及公私合营资料不全,华北区私人仅包括京津二地,西南及东北区私营数字为估计数。

2. 纺织工业机械未列入。

3. 主要机器设备总数约 64,000 台,公营占 45%,私营估 55%,(公私合营包括在私营内)。

4. 工人总数约 160,000 人,公营占 61%,私营占 39%,(公私合营包括在私营内)。

5. 主要机器之精密程度及技工制造技术,以华东及西南二区较高。

### 二、生产概况:

1. 现有设备年产量,缺乏资料。

2. 分区统计,缺乏资料。

3. 产品种类繁多,除自行车,滚珠轴承,造船等外,其余各厂均未走上专业化,生产任务极为杂乱,1950 年计划产量至今尚未确定,现有数字,一部分系各生产单位自定,一部分为压资订货。

4. 各单位自定之计划产量,仅包括公营中的一部分,且数字常有更改。

5. 压资订货原只能满足 1950 年下半年全部生产能力 70%,(东北各厂已由东北工业部分配任务),迄至现在,逐渐减缩,据重工业部最近报告,已签订合同者仅为原来 58%。

### 三、产销概况:

1. 1950 年计划产量各生产单位自订部门中,有些是定货,有

些是盲目的生产,兹因资料缺乏不能将二者加以分析,故 1950 年需要量只能以压资订货部分表出。

2. 自行车,滚珠轴承,销路滞塞,存货极多。

#### 四、存在的问题:

1. 一般生产情况,均极困难,目前压资订货,一再缩减,生产无对象,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困难程度,日趋严重。

2. 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各厂未能走上专业化,品质坏,成本高,使订货部门对承制部门失掉信心。

3. 技术上对于高级精密及大型机器,尚不能制造。

## 电 器 工 业

本表所列示的电器工业包括(1)发电机、电动机;(2)变压器;(3)电线电缆;(4)电话机;(5)无线电机;(6)电灯泡等六类,总的情况:

(一)此类工业为目前我们所必需,且有其远大前途的,但现在我们只能造小的,不能造大的,所以制造大型的发电机,变压器及高压电瓷的工业应大力发展。

(二)1950 年多是以销定产,其中设备能力都高于目前的需要量,但不是表示生产过剩,而是表示工业不发达,彼此不配合,及工农不配合。1951 年因我们将增设十余万 K. W. 的电力,所以电器工业情况会比 1950 年好。

(三)分布地域 80%左右在沿海及南满,此种生产手段的工业与一般轻工业不同,更应注意区域的安全性,筹设内迁或在安全地域设新厂。

(四)主要原材料中如矽钢片,因我们技术上不能制造,现尚必须依赖进口,应研究自制,节省外汇,保证自给。

(五)铜的资源不够,冶铜、电解、压延的设备也不够。

(六)以下是六类电器工业个别情况:

1. 发电机、电动机类:现在设备能力为 312,000 马力,其中公营占 64.7%,公私合营占 1.6%,私营占 33.7%。1950 年预计年产量为 242,000 马力。产品大半为 100 马力以下的,虽然最大可做到 750 马力的,但因定货少,制造经验不足,尚在试制阶段。

目前我们应该注意的:原动设备如蒸汽、锅炉、蒸汽机、汽轮配合不够,急待重视发展,以求配合。

2. 变压器类:(1)全国设备年产量为414,000K. V. A.,其中公营占61.5%,公私合营占7.2%,私营占31.3%,上海一地私营占全国总产量约30%。1950 年计划产317,000K. V. A.,私营占15%。(2)因矽钢片宝贵,同时资金缺少,所以各厂都愿作定货,不作备货,产量即等于销货。(3)变压器最大可做到 4,000 或 5,000K. V. A.,电压到33,000伏或44,000伏。(4)高压电瓷,如绝缘瓷套管用于66,000伏变压器的,急待重视发展,绝缘材料工厂也应设立。

3. 电线电缆类:(1)设备年产在 10,000 公吨,公营占 80%以上,私营在上海、天津两地。(2)目前我们不能制造的电缆是高压铠装纸包电力电缆和电话电缆,公营上海电线厂计划于 1951 年生产电话电缆。沈阳电工局计划于 1952—1953 年生产高压纸包电力电缆,届时此类工业我国可全部制造。(3)除天津外,上海、沈阳、昆明三厂均有冶铜电解,压延设备,天津只能自铜棒做起,但由于供给量有限,所以上海许多私营厂的业务,很难开展,我们应该发展铝工业,使架空电力线和一部分橡皮线改用铝线。

4. 电话机类:(1)除了自动式交换总机在中国尚不能制造,应增加设备自造外,其他各式电话设备均能制造,载波机拟由南京有线电厂于 1951 年试造。(2)1950 年估计年产电话机 27,000 余部。

其中公营占 47.1%，公私合营占 29%，私营占 23.9%。

5. 无线电机类：发射机年产 80,000 瓦已尽最大能力，全部供军用及电讯事业。接收机未使用至设备能力的一半，其中收音机，多系装配性质，因人民购买力低，销路不好。

6. 电灯泡类：设备能力可年产 4,000 万只，公营占 40%，私营占 60%，但需要量不过 2,000 万只，故生产过剩。上海一地全为私营，占全国设备能力的 60%，因东北发展过速，滞销更甚，现已大量减产至 700 万只，故许多厂很难维持，售价低于成本，致有一部宣布关闭，其中包括资力雄厚的亚浦耳及华德。1950 年全国计划产 2,000 万只，产销大体上可平衡。过去外销甚多，我们仍应在外销上注意。

## 化 学 工 业

(一)此次资料所列示的化学工业，仅包括肥料、火碱、纯碱、硫酸、硝酸、盐酸及染料七种。总的来讲各种化学工业在我国均甚落后。

(二)我国经济中农业占极大比重，化学肥料需要量甚大，目前生产力甚小，且价格超过进口货。我们应大量建设化学肥料厂，并减轻成本，农民自乐购用，以增加各种农业产品。

(三)酸碱为基本工业，应与其他工业配合发展。绥远天然碱，待包宁铁路西进，交通方便时，大可利用。

(四)我国染料工业甚落后，而钢铁工业的炼焦厂之焦油颇多，应速研究利用，以制造染料原料，渐求自足。

(五)各业生产情况：

1. 肥料：肥料系指硫酸亚而言。现有设备年产量为 90,000 吨，公私均为 50%。

1950年计划产76,000余吨,公营占47.4%,私营占52.6%。

2. 火碱:现有设备年产量约18,300吨,其中公营占56.3%,私营占43.7%。

1950年产约15,000吨,公营占46.7%,私营占53.3%。机器使用率平均约82%,私营几全力使用。

3. 纯碱:现有设备年产量约120,000吨,公营私营各占50%。

1950年计划产量为100,000吨,公营占40%,私营占60%。机器使用率平均约83%,私营几全力使用。

4. 硫酸:现有设备年产量为27,180吨,其中公营占55.8%,私营占44.2%。

1950年计划产量为22,735吨,其中公营占81.5%,公私合营占18.5%。

5. 硝酸:现有设备年产量约为4,810吨,其中公营占53%,公私合营占47%。

1950年计划产量为1,695吨,其中公营占21.2%,公私合营占78.8%。

6. 盐酸:现有设备年产量为18,581吨,其中公营占22.2%,公私合营占5.8%,私营72.0%。

1950年计划产量13,035吨,其中公营占26.4%,公私合营占6.2%,私营占67.4%。

7. 染料:现有设备年产量为28,310吨,其中公营占21.6%,私营占78.4%。

1950年计划产量为7,421吨,其中公营占32.6%,私营占67.4%。



## 水 泥 工 业

(一)现有设备年产量系指设计能力,共 2,975,000 公吨,由于机器陈旧等因,实际能力约 2,000,000 公吨。

1950 年产量估计为 107 万公吨,其中公营 74 万公吨,私营 23 万公吨,公私合营约 10 万公吨。

1950 年需要量估计为 90 万公吨,虽有多余,差额不大。

(二)公私关系中,以设备能力论:公营占 54%,私营占 34%,公私合营占 12%。以 1950 年产量论:公营占 70%,私营占 21%,公私合营占 9%。平均讲:1950 年使用机器率不过 50%。其中公营较私营的使用较多。

私营中,唐山启新月产 12,000 吨,国家贸易机构每月包销 10,000 吨,故无问题。

沪宁区在关内为生产能力最大者,而需要不多。1950 年机器使用率不过 11%,工厂大半停顿,最无办法,而且全部是私营。

(三)全国水泥设备产量对销售言是过剩的。但分别地区看则不平衡,情况甚为显著。东北可自给,华北有余可供西北,中南有余可供贵州一部分,华东生产能力大,需要小,最有问题,西南及西北有需要而生产不足。水泥厂大半在沿海、哈尔滨、太原、大冶、兰州、重庆五个内地,重要都市虽均有厂子,但设备产量还不到总产量的 20%,除大冶、哈尔滨外,其余均为月产万吨以下的厂子。

四川不够用,本可用大冶水泥,但运费太高,运价比就地售价贵 50%,所以最好在四川灌县区设一小厂,对目前需要不无小补,从长远看,西北兰州也应设一厂。

(四)除军用外,1951 年全国需要量估计为 130 万吨(东北 70,关内 60),仍不到生产能力的一半。

## 棉 纺 织 工 业

一、棉纺织工业全国共有 255 厂，工人 250,000 多。总计纺锭 5,188,406 枚，其中公营 64 厂，计纺锭 2,277,084 枚，约占 44%；公私合营 12 厂，占 6.1%；私营 179 厂，占 49.9%。织布机全国共有 67,812 台。公营 42,909 台，约占 63%；公私合营 3,356 台，占 5.3%；私营 21,547 台，占 31.7%。

二、产量按现有设备，以每日三班工作 24 小时计算，年产廿支棉纱约 386 万件，十二磅细布 4,000 余万疋，需皮棉约 1,583 万担。1950 年纺锭按设备能力比，只运转 51% 强，预计全年产纱 197 万余件。织机运转约 85%，预计年产布约 3,500 万疋。1950 年约需皮棉 810 万担。如将运转能力提高，可能年产棉纱 400 万件，棉布 4,700 万匹，约需皮棉 1,700 万担。

三、销量估计：照 1950 年计算，除复制等用纱约 20 余万件外，如全织成布平均每人 4.24 公尺，估计五年后，由于农村土改完成，生产发展，人民购买力提高，估计每人平均可能增至 10 公尺左右，如此，则纺锭可无须增加，织机须增至 15 万台至 20 万台。

四、由于过去半殖民地性的工业建设，棉纺织工厂，大部设于沿海一带，如上海市有 73 厂，纱锭 2,331,892 枚，占全国总设备 44.9%，布机有 29,731 台，占全国 43.8%；天津 9 厂，纱锭 385,924 枚，占全国 7.4%，布机 8,569 台，占全国 12.6%；青岛 9 厂，纱锭 405,412 枚，占全国 7.8%，布机 8,022 台，占全国 11.8%。三地总计 91 厂，纱锭占总设备数 60% 强；布机几占 70%。因此，为了原棉供应及时，照顾人口密度，调运和减低纱布成本计，今后设厂必须分布内地，靠近原棉产地和适当的销售市场，沿海工厂，亦须要将三分之一的纺锭逐渐内迁。

## 毛 纺 织 工 业

(一)毛纺织工业全国共 134 家,计纺织全能厂 42 家(公营 15,私营 27),单纯纺厂 16 家(公营 1,私营 15),单纯织厂 37 家(公营 1,私营 36),单纯绒线厂 5 家(公 1,私 4),驼绒织厂 28 家,长毛绒厂 6 家。

全国有毛纺锭 149,625 枚(连上海外商二家 22,048 枚,及上海中纺十七厂未装置的毛锭 13,000 枚一并计算,总计为 184,673 枚),其中精纺 79,872 锭,粗纺 52,797 锭,绒线锭 16,956 枚。纺锭总数中,公营占 43.6%,私营占 56.4%。目前实际运转不足四分之一。现各种纺锭共运转 44,587 锭,其中公营占 52.7%,私营占 47.3%。

毛织机共 2,227 台,公营占 31.8%,私营占 68.2%。现在实际运转不足总数三分之一,为 711 台,公营占 55.4%,私营占 44.6%。

(二)按现有设备可年产绒线 540 余万公斤,各种哔叽、呢绒、工业用呢及毛毯等织品,总计约 1,550 万公尺(以每日十小时计)。1950 年绒线预计年产 126 余万公斤,各种毛织品约 460 万公尺,占设备能力的三分之一。由于产品销路不畅,今年秋人民政府为了提倡毛织品,并扶持毛纺织业的发展,乃收购存货和定制军政制服呢达 100 万码。

(三)国内精纺锭和绒线锭,过去大都依赖国外毛条进口加工,按 1950 年产量尚需毛条 275 万公斤。今后应用大力改良羊种及圆梳机之推广和扩充。

(四)全国 134 家毛纺织厂,集中在上海的有 112 家,约占全国 84%;天津有 8 家,占全国 6%;散在内地城市的只有 10%。但羊毛

原料均须由内地输运,以致毛织品成本超过棉织品二倍以上。如欲改变今日之滞销状况,促进面向大众,减低成本,必须就原毛产地,建立洗毛厂、毛涤厂,现有毛纺织厂亦应迁一部分至产毛区。

## 丝 织 工 业

1. 我国桑蚕丝生产地区,分布极广,其中以华东为主要产地,常年产量约占全国 50%以上,此区内苏浙二省又占全区 90%左右。此外广东年产量约占全国 25%,战后降至 10%;川滇区在战前占全国 10%,战后占 20%。其余产地则有华中区之河南、湖北,西北之新疆,柞蚕丝以东北为主要产区,生产量占全国 60%左右。山东、河南二省产量约占全国 16.6%,再次则为贵州、四川。

凡有产丝地区农家多以此为主要副业。过去销路,大部分以外销为主,外销地区为英属印度、缅甸、埃及、法国、安南、美国、德国、意国等地,其余分销国内各地区。抗战期中,经日寇摧毁,胜利后数年,又经国民党反动政权官僚资本,美帝势力摧残压迫下,已遭受严重打击,产量日益低落;解放后因产品不能一时面向大众,因之销路困难,外销不能完全打开,故生产暂时不能发挥,目前大部分依靠国营企业收购维持,本年生产情况良好,收购价格合理,蚕农已有利可图。

2. 生产设备:全国现有缫丝车 37,116 台(公营占 7.04%),绢纺锭 30,784 枚(公营占 55.6%),织绸机 14,890 台(公营占 9.2%)。

3. 过去最高生产量,全国每年产生丝约 160,000 公担,柞蚕丝约 48,000 公担,绸缎约 3,500,000 疋,柞绸约 450,000 疋。销售量在 1936 年生丝销量约 148,445 公担(外销占 52%),绸缎约 300,000 疋,柞绸约 400,000 疋(二种外销占总数 13.8%)。1929 年

为生丝出口数字最多之一年，达 11 万余公担（1949 年降至 2,900 余公担）。

4. 目前设备年产量：生丝 82,700 公担（国营占 10%），柞蚕丝约 14,400 公担（私营），绸缎 1,811,750 疋（国营 50.3%），柞绸 219,000 疋（国营 45%），人造皮毛 5,000 疋（国营）。

5. 1950 年计划产量：厂丝 40,000 公担（国营 1.9%），柞蚕丝 14,400 公担（私营），绸缎 598,750 疋（国营 21.5%），柞绸 196,000 疋（国营 51%），人造皮毛 5,000 疋（国营）。

6. 1950 年销售情况：外销方面：生丝 30,000 公担（占全产量 48%），绸缎 100,000 疋（占全产量 17%），柞绸 14,000 疋（占全产量 7.1%）。内销方面：除大部分代国营企业加工外，余均分销国内各地区，颇呈呆滞。

## 造 纸 工 业

（一）全国造纸工业共有 213 厂，造纸机 305 台，设备年产各种纸约 218,000 余公吨，国营占 49%，私营占 51%。1950 年产量约 116,000 公吨，国营占 70%，私营占 30%。除少数厂外，一般地说，都是规模太小，平均一个厂子只有一台造纸机，而且都是小型的，每日生产能力平均在 3 公吨以下。

（二）机器使用率方面东北最高，达 90%，西南次之。上海一地全部为私营，占全国总设备年产量的 35% 以上，占全国私营设备年产量 70% 以上，但 1950 年机器使用仅 12.5%，主要是缺乏木浆。

（三）主要原料木浆不够用，除东北及西南少数国营厂外，都没有制木浆设备（有苇浆设备的，关内只有天津一个厂），应加扩充或新建木浆厂。东北的木浆造纸厂破坏很重，正逐渐恢复中，广州纸

厂自日本运回一些设备,正在装配阶段,四州宜宾纸厂方开始扩充。

(四)文化造纸是不够用的,且成本也高,比进口货的售价还高,为供应将来更多的需要,应积极努力,在量上增多,在成本上降低。

私营纸厂过度集中的上海,过去制造的是比较高级的纸张(如道林纸、卷烟纸、钞票纸、打字纸等)和纸板,目前这类产品销路都不好,而改造文化用纸,成本又高,造成目前的产销失调。

## 橡 胶 工 业

(一)全国共有轧胶机 1,312 台,其中公营 223 台占 17%,私营 1,089 台占 83%。以规模论公营较大,25 个厂子,平均每厂可有轧胶机 8 至 9 部;私营 531 个厂子,平均每厂只 2 部。一般地说,设备简陋,小厂子过多,因此不易减轻成本,提高品质。

(二)汽车胎的现有设备所制造的多系小型车胎#32"×6",故生产能力有余。实际上大型车胎如 34"×7"、38"×9"等货,国内供应不足,目前亟需加以改装及添制模型。

(三)产销不平衡,缺乏计划。1950 年各货均有多余,但设备使用率不高,其中胶鞋还不到 30%,同时也发生了劳动力过剩现象。今后,一方面国营厂要加强领导,同时要作有计划的订货。

(四)分布地区集中在沿海大都市,全国 556 家中上海占 130 家,轧胶能力占全国总能力的 40%强;天津 86 家,轧胶能力占全国 5%强;广州 83 家,轧胶能力占全国 13%强,三地合计约占全国 60%。

(五)原料不能自给,既消耗不少外汇,也难控制供应,最近生胶价格逐步上升,因此更提高成本,影响销路,威胁生产。此次橡胶

会议决定海南岛为培植橡胶树的重点,但从长远着眼,今后应注意在海南岛、四川、云南培植橡胶树,西北培植橡胶草。

## 面粉工业

(一)表中所列现有设备年产量163,182,000袋,系按每日开工24小时全年300天计算的(如按每日16小时计应为120,000,000余袋)。其中公营占27%,私营占73%。战前全国面粉年销量约7,000万袋,故设备能力对销量言,可谓过剩,因此在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前,应不再增设新厂。

(二)1950年产量系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实际数字,计57,910,000袋,同时间之销量为52,007,000袋,产销相比较多5,903,000袋。而1950年的机器使用还不到一年,所以在近期内增加机器设备的使用率也是有困难的。战前多数面粉厂开工日子,亦不过半年或几个月。

(三)1950年产量中未分公私,仍应继续调查,但从设备能力上看,各地区私营都超过公营。

上海一地全部为私营,现有设备能力的产量占全国22%,既缺原料又少市场,小麦南运,面粉北运,颇不合理。1950年机器使用率不到三分之一,形成半停顿状态,1950年上海产量占全国总产11.52%,天津占14%。

(四)机器面粉的滞销主要原因在都市中由于购买力低,且有土磨存在;在乡村中,由于土改在全国尚未普遍完成,购买力小,农民都吃土粉,故机器面粉工业在最近数年内,应就原料产地作出内迁的准备,以便在将来财经根本好转时,能以机器代替土磨。

(五)据7月份召开的粮食加工会议决定,1950年6月至1951年5月,除东北外,全国计划产54,100,000袋,其中粮食公司将委

托加工 21,400,000 袋。会中并对各区产量根据各区销量作区域分配如下；华东 25,500,000 袋，华北 17,000,000 袋，中南 5,310,000 袋，西南 980,000 袋，西北 5,300,000 袋。中粮公司的加工粮并将照顾开工率低的华东区。

## 卷 烟 工 业

(一)我国现有卷烟机 1,994 台，以每台每日工作九小时可产 7 箱，全年开工 300 天，年产量为 4,187,400 箱，私营占总产量的 73.9%。此数中，国人经营的 55.4%，外商为 18.5%。

外商仅 5 家占全国总家数 1,249 的 0.4%，但此 5 家拥有新式机器，其中大型卷烟机 368 台占全国总设备的 18.5%，此五家均为英商颐中公司所有，分布在营口、沈阳、青岛、天津、上海（上海颐中尚包括美商的花旗工厂）。销售方面外商的牌子老，故能伸入内地，构成对内地及所在地的卷烟厂之劲敌。但随着解放形势的发展，外商厂的黄金时代已过。现在上海、天津、青岛各厂均在勉强维持状态中，营口、沈阳厂，则解放后始终未开工。

(二)公私比重方面，除东北外，各地区私营数均超过公营，但公营厂产销数均在逐步上升中，公营厂出口在市场上已获得很高声誉。

1950 年全国机器设备的使用情形为 39.4%，其中以中南区的使用率 45% 为最高。

(三)1950 年下半年卷烟会议中决定全国生产量为 900,000 箱，1951 年全年约为 200 万箱，但与设备能力比，仍不及一半，故会议中决定各地区除政府准许者外，一律不得增设新厂和手工作坊。

(四)原料方面：



1. 烟叶 1950 年情况：根据全国卷烟会议各区代表报告，至本年 6 月底止，全国烤烟存量估计为 1,656,653 担，又估计本年可产烤烟 933,000 担，则共计 2,589,653 担，以每箱卷烟需用烟叶 1.4 市担，则除去今年下半年的 90 万箱所需烟叶 1,260,000 担外，今年底尚可净存 1,329,653 担。

1951 年情况：1950 年底烤烟净存量 1,329,653 担，可供给制造 950,000 箱卷烟之用，与 1951 年上半年计划产量 1,000,000 箱尚接近，但下半年计划产量 100 万箱所需原料在秋收前（七、八、九月份），有青黄不接之虞，且手工卷烟作坊所需原料尚未计入。

故政府应从速订出烟粮比价，以恢复烟农情绪，扩大 1951 年春种面积，使 1951 年秋后起，烟叶不致供应失调。

2. 盘纸：外国盘纸尚有存货，且国内又能生产，国内盘纸生产能力可够自给，故盘纸供给可无问题，惟国产盘纸价格尚高，品质较差，亟需改进。

3. 卷烟所用包装纸类：国内供给可无问题。

## 油 脂 工 业

（一）全国现有油脂工业均属植物油制炼厂，尚无动物油脂厂。

全国油厂每年榨籽能力约 439 万余吨，其中公营占 33.6%，私营 66.4%。

1950 年以销定产，计划产 158 万吨。公营占 55.4%，私营占 44.6%。

（二）现时一些大都市油厂所产食油的价格低于成本，且缺销路。副产油饼数量甚大，本可作肥田之用，但农村购买力弱，目前尚无出路，此问题须待政府举行农贷，协助推销，增加农产。

（三）较大的新式油厂多集中于上海、青岛、天津等都市，距原

料产地较远,而小城市乡镇的私营作坊、机关合作社,又都自谋小规模生产,耗费原料多,品质也差,且所出油品,当地无销售市场,竞运至大都市求售,货到地头,被迫低价脱售,既不经济,又影响了都市油厂的生产,这是目前油脂工业的严重情形,需要调整。

(四)据油脂会议中,农业部提供 1950 年全国估计所产植物油原料,除留种、吃食、出口外,供国内榨油的约为 1,050 万吨,比榨子能力及 1950 年计划产量要大得多。惟以内地产区与运输及供销均不能配合,故沿海工厂感原料供应不足,生产效率受其影响。

## 制 糖 工 业

(一)我国糖业除台湾外,大陆上新式机器制糖厂全属国营,1950 年全部产量为 38,000 余吨。土法制糖均属私营,1950 年估计产 240,000 吨,故全国今年大陆上糖的总产量不过 280,000 吨。

对日抗战前,国内糖的年产量,加上有统计的进口数量,及私运进口的数量(约 50,000 吨)总计约 900,000 吨,今年生产量不到当年总量的三分之一。

以人口数平均计算;过去每人每年合 1.9 公斤左右,比战前美国每人每年 42.6 公斤,苏联 15 公斤,日本 10.36 公斤,已相差甚远。若以今年产量计,不过 0.6 公斤。

(二)台湾产糖据最近二年的报告,每年约 600,000 吨,设备能力在 1,000,000 吨以上,因蒋匪剥削,蔗农种蔗面积日小。台湾解放后,如糖厂未受损失,恢复种蔗,二年后(台湾甘蔗收获须一年半)当可重见年产 60 万吨之数,加上大陆的产量,可供应战前的需要量。

(三)糖厂分布地区多在西南与极南的产蔗区,北方甜菜糖,只占全部产量的 6.4%,今后为筹全国糖产区的合理分布,便利物资

调配计,应在东北、华北、西北求甜菜糖的发展。

(四)台湾解放前,我国大陆每年现产的糖量,远小于需要量,国内食糖必感供不应求。

## 蛋 品 工 业

(一)按现有设备能力,干蛋品年可生产 22,661 吨,冻蛋 180,000 吨。但由于不少工厂未开工与时开时停及国外销路有限,不能达到最高生产能力。干蛋品估计今年生产 10,000 吨,其中私人蛋厂占 51.6%(订加工合同者在内),公营蛋厂占 47%,公私合营占 1.4%。冻蛋生产 28,000 吨内,国内共产 27,000 吨,香港加工 1,000 吨(此 1,000 吨未列入本表)。盐黄生产较简单,只要需要,随时都可生产,故未列入。

(二)1950 年上半年,冻蛋青岛出口 4,646 吨,天津出口 2,404 吨。下半年青岛拟出口 11,770 吨,天津出口 9,179 吨。干蛋华北区上半年出口 1,490 吨,下半年 3,155 吨。

(三)全国蛋厂共计 66 家,其中:冻蛋厂 13 家,开工生产者 4 家;干蛋厂 53 家,开工者 42 家(内有 10 家时开时停)。就全国蛋厂言生产是过剩的,在国外滞销时,各蛋厂则受影响更甚,因此在今后的整个生产上最主要的是密切注意产销结合,俾防止或减少生产上的盲目性,而树立初步的计划生产。

(四)鲜蛋生产全国产量甚丰,1936 年年产约 150 亿个,估计今年生产 170 亿个,如出口达 1936 年之高峰共需鲜蛋 30 多亿个,占全部产量五分之一强。

今年共需鲜蛋 22.2 亿个,占年产量 13%,成品包装所需马口铁数全部需由国外进口。

## 铁 路 概 况

(一)我国铁路原有总里程(包括台湾省),干支线共计为26,877公里。这些铁路,大多集中沿海地区;以往在修建及材料供应上,几乎全部被各帝国主义垄断。例如京奉、沪宁、津浦南段和粤汉的广九同湘鄂两段,原是由英帝国主义投资建筑的;胶济及津浦北段又是由德帝国主义一手包办的;平汉、正太、陇海又是由法、比两帝国主义分别承建的。

(二)这样,我国旧有铁路设备,如钢轨、机器、机车、车辆等,都由各帝国主义把他们陈旧的商品推销到我国来,既落后而又复杂。就钢轨一项言,除轻磅不计外,只六十磅以上者,目前即有50多种。铁路器材的补充,更为各帝国主义推销剩余商品的争夺对象。据1936年的统计,依赖各帝国主义供给的铁路器材达68.7%,其中购自英国的占34.48%,购自美国的21.25%,购自德国的6.57%,购自比国的2.18%,购自日本的2.92%,购自法国的0.51%;而且这些器材,很多不合使用,造成大量浪费。

1950年铁路器材,国内可制造的,约有75%。约三、五年后可望全部自给。

(三)1950年上半年新建设的成就:通车里程至4月止已达84.17%。3月底机车台数较1949年底增加21.1%;4月底客车较1949年年底增加4.3%,货车增加10.4%。本年6月份统计,一日平均装车数已至10,789辆,较1949年底跃增58%;6月份车辆周转率,准轨是2.87天,较2月份的3.79,缩短了0.92天;窄轨1.67天,较2月份2.31天,缩短0.64天;本年第二季为2.99天,较第一季的3.68天,缩短0.69天。

## 公 路 概 况

(一)全国大陆公路总长 144,320 公里,台湾 17,487 公里,合共 161,789 公里。

以前公路的建筑,大都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内战及便于帝国主义对农村的榨取而修筑的。所以线路集中于东南一带,中南区即占大陆公路总里程的 25.4%,华东达 17%,合近半数;西北只占 8.1%,且设备简陋不堪,基本情况可说没有一条线路是合乎标准的。所用车辆和燃料,以往多依赖帝国主义的供应,车辆厂牌复杂陈旧,运输能力甚低,且不易修理。

(二)1950 年已注意到内地公路的修复,尤其在交通不便的地方赶先恢复。大陆上现已畅通的公路达原有公路线 50.6%,计 64,203 公里。现有公私运货车 35,093 辆。对于公私之间的关系已经加以合理的调整,私营运输业在国营企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发展运输事业,沟通物资的交流。

## 航 运 概 况

(一)我国沿海航路长达 21,325 哩,内河航线 39,799 公里。航运在我国交通上占比重很大。可是我国自有输运以来,就受着帝国主义的垄断剥削,内河开放又使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深进一步;私营轮船公司以前几全为封建官僚所把持。

(二)解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本质上的改变,全国航业也在整理恢复和改造之中,至本年上半年海道已通航 19,219 哩,占总里程 90%。内河已通航 23,438 公里,占总里程 59%。有标志的航道、海道已达 3,302 哩,占通航里程 17%。内河已达 3,482 公里,

占通航里程 15%。至轮船艘数,除流亡在外的轮船 225 艘外,共有 2,121 艘,371,889 吨;连同拖驳各轮,共有机轮 3,925 艘,558,767 吨。1937 年交通部统计,当时我国机轮共有 3,457 艘,376,000 吨,吨数已增加 50%;抗战期间直接间接损失达 3,000 艘 195,320 吨。胜利后接收敌伪船舶,据 1947 年 6 月伪交通部统计,当时所有总数为 2,518 艘,808,815 吨,内有轮船 1,521 艘,734,700 吨;现有吨位较 1947 年减少 250,000 吨。

(三)国营事业在轮运中比重较大。国营机轮共计 1,417 艘,264,678 吨;艘数占总数的 36%,吨位占总数的 47%。轮运的比重,国营占全部轮运艘数的 60%,运输吨数占全部的 70%以上,国营航业已占有主导地位,对于私营航业,密切合作,并使其经营合理化。由于航运业本质上的改善,运输出口的主要物资都是农业特产,进口大部为工业建设材料,内河运输正为交流城乡物资和调剂各地区物资而服务。

## 邮 政 概 况

(一)在交通通信业务上,我国邮政是比较有系统、有组织的企业。可是过去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和特权阶级服务,农村广大人民得不到方便;在邮政运送技术上也长期停滞在落后的状态中。

全国局所现有 53,568 个,而东南沿海一带,就占 76%。广大的西北、东北、西南各地,分布很少,只占 24%。如按中国土地面积计算,每 180 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局所,有一部分县治所在地尚没有邮局,而浙江一区就有 5,241 个局所,超过东北、西北两区的总数。

(二)全国邮路共长 840,374 公里,其中利用机械力的邮路占全长 14%,利用人力的占全长 84%,兽力占 2%;极大部分仍用人力,而人力中靠原始肩挑方式的邮路占全长 65%,邮政落后可以

概见。

在老解放区里，邮政早就以开辟广大乡邮为目标，尽力和群众紧密联系，如山东邮区乡邮路就占了全国邮路的八分之一。至全国解放后，在发展方针上已有基本的改革，至本年6月止，邮路已较去年底增加了13.5%，这个增加，大都是向农村发展的结果，自办邮路现已达80%，超过战前达45%。

# 新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概况

姚 甲 科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而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迫切需要国家工矿企业各方面提供完整而确切的工业资料，以作为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和计划的依据。1950年4月到9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中财委普查组进行了国家工矿企业的普查工作。通过这次全国性的工业普查，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国家工矿企业的基本情况及其内部结构，为制定国家工业建设计划，正确决定全国各区各地各工厂企业单位的工作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 一 高度重视精心筹划

1949年10月21日，中财委正式成立，陈云同志任主任，并立即成立了工业普查组。由组长朱鹤龄，副组长李恢宏及倪效哲、徐坚、王达夫、吕德润、张琰等18人组成。组织和筹备全国性工业普查工作。开始普查组根据苏联专家所提草案编订普查表格式和说明书，确定布置工作计划。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普查设计工作主要由朱鹤龄同志负责进行。调查表格式和说明书几经修正、删除、补充，并反复与苏联专家讨论和召集有关各部代表商讨。

1950年2月16日，中财委召开工业普查会议。会议主席狄超白向参加会议的32个部、署、会、局的代表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



容有两项：第一项是说明国营企业及公私合营企业的普查计划已经陈云主任及薄一波副主任批准；第二项是要求按照普查计划，各大行政区须作区的综合报告。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陈云、薄一波、马寅初签署，向全国各大行政区财委颁发了全国各国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矿企业进行统一的全国普查（训令）。训令明确指出：（一）中央财政经济各部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指定专人进行普查工作。（二）各级政府各工矿企业及工业合作社首长和负责人，接到调查表后，立即开始工作。（三）各项调查报表限于1950年4月至8月1日以前完成，中央财政经济各部、行、署、局及各大行政区财经委员会，应于7月到9月1日以前将所属工矿企业各合作社的报表编制综合呈报中财委。

4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财委发出普字第一号通知，规定自当年4月10日开始工业普查工作，要求各大行政区、各省财委遵照训令及调查计划指定专人，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在普查工作中着重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进行工业普查的目的，即为制定全国性的经济计划准备条件，彻底了解全国国营及公私合营工矿企业生产力配备的基本情况。确定以1949年底为时间点来进行全国普查。使全国国营及公私合营的工矿企业在同一时间用同一表式和同一核算方法表达其正确的基本情况，使各级领导机构能够正确了解国家各种企业的分布地区、生产设备及生产能力、生产品种及数额、原材料的使用情况、技术配备及劳动力配备，各个地区各种企业内部的相互关系等。明确国家工矿企业中有什么？多什么？少什么？能增产什么？需要恢复什么？需要建设什么？以便有把握有步骤地开始全面进行经济建设。二是规定了进行工业普查的地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三是确定了调查范围：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各地方人民政府所管辖经营的一切国营和公私合营的

工矿企业,包括独立的生产单位,或附属交通系统及其他事业系统内的辅助生产单位,不分规模大小,已经开工或尚未开工。四是明确了普查的对象,即以独立经营或具有独立经营能力的工厂或矿厂,为普查的基本单位。五是明确了普查的方法,即以“颁表方法”进行,由中财委颁发调查表格,通过各级政府的传达和督导,由调查对象依据规定表式自行填报。调查截止1949年12月底所存在的状况。这样,全国第一次工业普查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 二 典型引路推动全局

1950年3月16日,中财委召开华北区普查工作组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财委:狄超白、朱鹤龄、徐坚、王达夫、吕德润、李恢宏、张琰;重工业部:庞蔚如、南岳;燃料部:欧阳展;纺织部:席兴峻;华北合作总社:李毅;北京市政府:张锐、杨乃超、陈达;全国总工会:李宝珊、苏克,组成了华北普查工作组。会议对示范区进行了讨论。3月22日,华北普查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中财委召开。会议确定的示范区有北京市、天津市、唐山及塘沽地区内若干厂矿作为重点示范单位。选择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天津中纺一厂等共计16个单位。为进行北京区及重点厂矿的示范工作,暂设立“北京区普查示范工作组”及“重点示范工作组”,受华北区普查工作组领导。3月27日,北京区示范工作组成立确定了填报单位92个,其中国营企业63个,公私合营企业6个,政府代管企业2个,合作社21个。第一步是组织学习普查文件;第二步布置动员工作;第三步实地参加协助各厂进行填报工作。北京区,从3月下旬到5月下旬两个月时间完成了92个单位的调查填表工作。

北京区工矿企业普查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三点:第一,确定调查对象。最初各部门提出的填报单位达181个,经过调查研究,根据

调查范围、目标时间和填报单位的规定,确定了 92 个,向中财委提出了“关于处理调查对象问题的报告”。第二,解决困难问题。中财委原颁发的事项定义与说明,有些项目解释的还不够明确,还有些项目没有解释,又因为各厂矿的具体情况不同,经过研究,对遇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分别做了解答,并择要作成“问题汇编”。第三,介绍填报方法。北京区各厂矿的填报方法,如组织学习、搜集资料、试填、审查等程序,某些项目的计算方法和克服困难的办法等,保证了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重视党和工会的领导作用,特别是企业干部对工作认真负责,在普查工作中努力克服困难,也是顺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如天津中纺一厂在普查工作中,考虑到厂内生产任务很忙,普查表及训令发到中纺一厂之后,厂长和军代表重视这一工作,由 16 人组成了填报委员会,集体领导、分层负责。在整个填报工作中,成立了中心小组,由厂长、各工程师及工会主任组成,由军代表负总责,保证了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

1950 年 5 月,中财委把京津地区示范普查工作的组织和经验,出版了四期“工作通报”,直接发至每一调查的厂矿,全国各地普查工作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在各个厂矿企业全面开展。

### 三 全国第一次工业普查的基本情况

在政务院和中财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各地填表工作均于 1950 年 4 月至 7 月如期完成。此次普查,使党和政府对全国国营企业 2858 个,公私合营企业 359 个,中苏合营企业 109 个,共计 3326 个厂矿企业的情况得到了详细的了解。

1950 年 6 月,中财委决定以工业部门为主分区进行整理的工作原则。7 月 6 日,中财委召开普查资料整理会议,会议讨论了朱鹤龄同志关于普查资料整理的原则报告。会议决议全部普查报表

的总结编制分三个地区集中进行。1. 中财委计划局统计处和有关各部共同整理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四大行政区资料。2. 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整理东北区资料。3. 华东工业部工矿普查组整理华东区资料。8月,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五大行政区的全部一览表及各种重要综合表已经完成。全面的整理工作由60多人参加,经过艰苦工作,于9月底全部资料整理完成。汇集的工业总产值140亿元,其中轻工业103亿元,重工业37亿元。

旧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掠夺下,工业极端落后。1949年我国只有1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从这次普查汇集的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情况看:

1. 重工业的钢铁冶炼。全国钢铁工业的设备是制钢能力小于炼钢能力,轧钢能力小于制钢能力。1949年生产生铁25万吨,钢15.8万吨,成品钢材13万吨,铁合金0.1万吨,铁矿石59万吨。

2. 煤矿工业。全国煤矿工人约33万人,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除了抚顺、本溪而外,其余都是小斜井,西南西北区交通不便,煤矿工业相当落后。主要机器设备除开滦煤矿有相当规模的设备外,多数小矿仅有水泵一两座而已。原煤年产量0.32亿吨,焦炭54万吨。

3. 电力工业。全国发电量43亿千瓦小时,其中水电7亿千瓦小时。我国各地发电容量以东北为最大。华北居第二位,中南居第三位,西南居第四位。

4. 石油工业。我国石油自产甚少,历年多靠进口。1946年—1948年三年平均每年进口1,367,867吨。1949年原油产量仅12万吨。天然气在四川,储量额大,年产量0.07亿立方米。

5. 机械工业。工人总数16万人。主要机器设备产品种类繁多,全国自行车产量1.4万辆,轻工机械0.02万吨,矿山设备0.07万吨,锻压设备0.03万台,滚动轴承14万套,金属切削机床0.16万台。

6. 电器工业。如矽钢片,我国不能制造,必须依赖进口。不能制造高压铠装纸包电力电缆和电话电缆及自动式交换电话总机。收音机产量0.4万部,多系装配性质。电灯泡产量0.13亿只,生产过剩而滞销,导致资力雄厚的亚浦耳及华德厂宣布关闭。

7. 化学工业。全国仅生产农用化肥0.6万吨。火碱1.5万吨,纯碱8.8万吨,硫酸4.0万吨,合成氨0.5万吨。油漆0.50万吨,电石0.3万吨,化工设备0.02万吨,染料0.52万吨,塑料制品0.2万吨。

8. 水泥工业。水泥厂大半在沿海,哈尔滨、太原、大冶、兰州、重庆五个内地,全国有42家工厂,生产水泥66万吨。

9. 平板玻璃全国只有4家工厂,生产玻璃91万重量箱。

10. 棉纺织工业。全国255个工厂,工人有25万余人。全国纱产量32.7万吨,布18.9亿米。

11. 毛纺织工业。全国134家,生产毛线0.18万吨,呢绒544万米,毛毯22万条,地毯15.2万平方米。

12. 丝织工业。我国桑蚕丝生产地区分布极广,凡有产丝地区农家多以此为主要副业。过去大部分以外销为主,外销地区为印度、缅甸、埃及、法国、安南、美国、德国等地。全国生产丝0.18万吨,丝织品0.50亿米。

13. 造纸工业有213个工厂,造纸机305台,生产机制纸及纸板11万吨。

14. 橡胶工业全国有556家工厂,共生产轮胎3万条。

15. 其他工业产品产量,原盐299万吨,糖20万吨,卷烟160万箱,日用搪瓷制品0.9万吨,木材567万立方米。

16. 内燃机(商品量)1万马力。铁路客车23辆,铁路货车0.14万辆。我国铁路近半数被破坏,无一线完全通车。

以上是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交通情况。要实现全国规

模的恢复与发展我国工业,首先要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次工业普查,从1949年9月筹备到1950年9月完成,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查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年(1949年)全国国营及公私合营工矿企业的基本情况,为中央人民政府制定1950年工业生产计划和制定恢复时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依据。

## 仙台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反帝革命活动

苏子衡

我于1927年4月考入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院，我初到仙台时，留学生中以前认识的只有林荣年和李宝华。他们都是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高一班的中国留学生。我到仙台后，才知道他们俩人都是国民党党员。当时旅日国民党组织分为左右两派，左派拥护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右派拥护南京反动政府，而仙台支部是属于左派。

当时急剧变化的国内革命形势也反映到旅日中国留学生当中。在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对于国内的革命斗争，大致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思想进步的留学生，拥护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而积极投入革命斗争；思想反动的留学生则拥护南京反动政府，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另外一小部分不关心政治或中立的留学生，则对两派的斗争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仙台的留学生受到国内革命形势鼓舞，在左派留学生的影响下，绝大部分支持左派国民党。

1927年4月，我一到仙台就参加左派国民党支部的活动，于4月底经林荣年和李宝华的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仙台支部。当时支部负责人是夏邦奇和庞大恩，支部成员有：林荣年、李宝华、陈建功、郑尧梓、龚锡奎、谢邦基。支部的主要活动是了解和研究国内外革命形势，按照上级的指示，向仙台的中国留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理，揭露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

团结当地留学生支援国内革命斗争。我们采取参加留学生的各种集会以及个别访问交谈的方式,进行宣传活动。我们也和当地的日本进步组织,如工会,“农民组合”,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形势,揭露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取得了他们对我国反帝斗争的支持。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政府和南京反动政府合流的消息传到仙台时,我们仙台支部党员受到了极大震动,非常失望,感到失去了革命领导,茫然不知所措,不知怎样继续革命活动。但是我们对革命的热情并没有发生动摇,大家团结一致,继续研究国内形势,考虑怎样继续革命工作。

7月下旬,暑假开始后,我们国民党员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有的回到家乡省亲,有的到日本各地访友。我在暑假期间回到故乡台湾,同从日本回来的和从祖国大陆回来的留学生一起,组织和参加群众性的集会,用进行文艺演出、讲演等方式,反对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歧视,介绍中国革命形势。

我在台湾度暑假期间,从报刊看到南昌起义的消息,无比欢欣鼓舞,感到中国革命还是有希望的,坚定了为革命工作的信心。暑假后9月初,我们分散去各地的留学生又回到仙台。在一次国民党支部会议上,庞大恩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文件。经过几次讨论,大家认为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且国民党内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也叛变了革命,武汉政府已经与共产党决裂,而同南京反动政府合流,整个国民党已走到革命的对立面。因此,一致决定,取消国民党仙台支部,并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同时,成立不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来继续我们的活动。

仙台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是1927年10月间成立的,当时成员除原国民党仙台支部党员庞大恩、李宝华、林荣年、陈



建功、龚锡奎和我以外，还吸收苏步青、谢循贯、郑尧梓、周鸿恩、姜明伦。1928年春，新到仙台上学的漆宗兴（现名漆克昌）和谢位鼎参加了研究会。

研究会的性质是组织性比较宽松的读书会，由庞大恩和我担任联系工作。每周开一次学习会，并事先安排中心发言人做好准备。除了讨论国内形势以外，主要时间用于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当时学习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除此以外，我们在会上讨论和部署留学生的活动，大家都积极参加“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带动了全体仙台留学生的爱国活动。

研究会于1928年5月间，用油印本刊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伊斯科拉》（俄语“火花”的中译名），邮寄给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和国内学生组织。这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日本特支的指示办的。现在看起来，这是代价非常昂贵的冒险行动。因为在刊物上虽然没有写明发行人和单位，但仙台的人口只有20万左右，中国留学生也只有六七十人，而刊物是经仙台市的邮筒寄出去的，如果万一被日本警察当局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幸亏这个刊物没有被日本当局发现。

1928年1月，我由庞大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当时庞大恩担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扶学铤、李宝华、龚锡奎和我。因为当时地下组织需要严格保密，庞大恩没有告诉我仙台支部过去的历史。在国民党仙台支部没有解散以前，庞大恩是该支部的最有力的领导人，而他在中国共产党仙台支部又是领导人，单独负责与设在东京的日本特别支部的联系〔据日本大阪读卖新闻（1931年2月17日）的报道，中共仙台支部是于1927年10月上旬创立的，所以我认为庞大恩是中共仙台支部的创始人〕。

1927年10、11月间，冯骥（当时也叫冯文彬）从东京来到仙台，住在公寓的一个房间（贷间），他平时除庞大恩和我以外，没有和别人接触，逗留不到1个月就离开仙台回东京。我当时不知道他就是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管宣传的常务委员。冯来到仙台以后，国内邮寄给他的几批包裹，直接寄到我所租用的贷家（独院的小房屋），然后由我交给冯骥本人或庞大恩，包裹里面所装的东西，全部是外皮加以伪装的党中央机关杂志《布尔塞维克》，全国总工会的刊物等。这种包裹的邮寄，继续到1928年9月，以后没有再收到。当年7月间我回台湾度暑假时把几份《布尔塞维克》藏在行李中，带回台湾，分别交给几个进步朋友。

1928年春天，东京来了一位姓廖的中共党员，参加仙台支部的活动，庞大恩说，他是在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逃到日本的。他于当年6、7月间，作为中华留日反帝大同盟仙台支部的代表，和龚锡奎一起，到东京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他们两人离仙台以后没有消息。他的名字现在记不清，好像叫廖漆新，他可能是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执行委员廖体仁。

李宝华人党比我早（1928年以前），他于1928年暑假后，8月末9月初，从辽宁省的故乡返回仙台途中，在东京被日本警察拘留拷问后，被迫回故乡辽宁。当时仙台支部开会时，李汇报说，他从辽宁返回仙台途中，在日本的火车中，同一个朝鲜人谈话时，表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到东京火车站时被日本警察拘留拷问。但他没有透露中国留学生的组织活动，没有透露党组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秘密，日本警察从他的口中得不到可以判刑的根据，并且由于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抗议，过了几天就把他释放。但勒令他及早离开日本，不然就要再逮捕他。支部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认为李离开日本较妥当，免得引起不利于革命的事态。所以决定：对李的不慎言行记大过，并让他退出党组织，回国后的组织关

系,在国内解决。于是李宝华于9月中旬离开仙台,以后长期没有任何消息。1943年前后,我在北京的报纸上看到李宝华担任伪满洲国某市(记不清)市长的消息。

漆宗兴(现名漆克昌,现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是1928年冬由庞太恩和我介绍入党的。他于当年4月来仙台入东北帝国大学不久,和我以及马希麟同学共同租用一个赁屋(独院公寓),同住到暑假后才退还这公寓而后分开。漆宗兴到仙台后,积极参加留学生的各种活动,进步很快,所以于当年冬吸收他入党。

谢位鼎于1928年春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习,经漆宗兴和庞太恩的介绍于1929年春加入中共仙台支部。1929年10月中共旅日组织遭到全面破坏时,他也在仙台被捕。据我后来所了解,当年末,旅日中共党员被驱逐出境后,只有谢留在日本,似改名为所仓藏,他母亲是日本人,姓所,他的情况不明。

当时仙台支部至少每星期开一次会,学习和讨论上级党组织的文件和指示,研究和布置对当地中国留学生的宣传组织工作。此外还参加仙台留学生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习和活动。支部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和领导社会科学研究会,领导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通过外围组织和群众性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对国民党对人民的镇压罪行的活动。

1925年的五卅运动引起的轰轰烈烈的反帝浪潮和随后开始的北伐战争,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东京以及其他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很快分裂为左右两派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仙台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支持左派的观点和活动。这可能与仙台的留学生中官僚军阀大地主的子弟很少有关,所以没有积极反对左派的活动。另一方面,中共仙台支部党员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成员,在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也是重要的因素。

当时仙台的中国留学生分散在各种学校学习,其中有东北帝

国大学、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第二高等学校、宫城农业专科学校以及中学。各学校的留学生分别成立留学生同学会，留学生人数少的学校没成立。辽宁金县的留学生较多，他们成立金县同乡会。由各校的同学会以及没有组成同学会的全体留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中华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1927年4月我到仙台时已经存在这个学生联合会，每逢国内的重大纪念日以及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欢迎新到仙台学习的留学生，欢送毕业回国的留学生等，都举行大会。每次开大会，大多数留学生都积极参加，发言慷慨激昂，热切地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并将大会上通过的各种声明或宣言，印发给日本各地的留学生组织、华侨组织以及国内各地的学生会。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侵占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当这一消息传到仙台时，全体留学生无比愤慨，迅即召开学生联合会大会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发表宣言要求日本侵略军撤离中国。大会一致决定，把学生联合会改称为“反帝大同盟”仙台支部，配合东京总部进行反帝活动，并派廖涤新和龚锡奎两人作为仙台支部代表去东京参加总部的活动。

此前学生联合会虽然由各学校选出的领导人组成，但没有进行具体的组织分工。这次在学生联合会大会上，大家推选王紫渊、王久湘、庞大恩、李宝华等人为领导人，成立主席团，在主席团下面成立总务组、联络组、宣传组，以进行具体工作。中共仙台支部的党员都分别参加各组的领导工作，李宝华负责总务组，庞大恩负责联络组，我负责宣传组工作。

济南惨案发生后，于5月底6月初，反帝同盟仙台支部以“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的公开名义，印发不定期刊物《通讯录》（油印本），邮寄给各地的留学生组织和个人及国内各地的学生会。我们宣传组除印发学生联合会的宣言、声明以外，主要精力集中在《通

讯录》的组稿、油印等工作。《通讯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揭露国内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罪行。《通讯录》是不定期的刊物,到1928年10月间,仙台留学生遭受日本警察当局的镇压以前,共发刊3期。

1928年秋,由于从仙台邮寄的《通讯录》以及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品被日本警察查出,仙台警察局拘留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王紫渊、庞大恩、扶学铄、周鸿恩和我。当时仙台的留学生对警察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拘留的学生,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由于《通讯录》以及其他宣传品都没有涉及日本国内的革命问题,并且日本警察当局没有查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存在,更查不出中共党组织的存在,无法用日本法律定罪,只说我们犯了出版法,在拘留两星期后,就把我们释放。

在这期间,我们被拘留的几个留学生遭到毒打,甚至去日本仙台警察局抗议的留学生也被毒打。王紫渊虽然思想是反共的,但还参加仙台留学生的反帝活动。因为他来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学习的时间比较早,岁数较大,他居住的独院房子比较宽,常提供为开大会的会场,所以大家选他为中华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因此他也和我们几个人同时被拘留,并挨了毒打。

我在警察署被拷打后,胸膜炎病情恶化,患了肋骨结核。当年冬天,往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刀切除部分肋骨,出院后伤口未愈合。我于1929年初去东京参加台湾留学生的活动,先后参加东京台湾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大会、台湾彰化同乡会——磺溪会的毕业生欢送会等,在会上介绍中国革命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回仙台后,我因肋骨结核再次做了手术。于是党支部决定我暂时离开仙台回故乡台湾,我于1929年7月末离开仙台回台湾彰化住几天,和台湾文化协会负责人王敏川等人就台湾革命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到台南县四哥的医院治病。

大约在1929年9月末或10月初,我在台湾四哥医院治病期间,有一天下午,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包围医院,进行搜查之后,把我押送到虎尾镇警察拘留所。警察局局长(课长)对我宣布,奉东京警视厅的命令,将把我押送去东京。由于搜查时,没有查出警察所要的任何证据,而且当时我的手术创口没有愈合,病情还严重,经警察医和姐夫对虎尾镇和台南县的警察局长进行了贿赂(我到后来才知道此事)。所以台湾警察当局对我宣布缓期押送,由我四哥做保,回医院继续治病。

当时台湾警察当局不仅对我四哥和医院进行搜查,同一时间,对我在彰化的老家,也进行了包围和搜查(没有搜查出任何所谓“罪证”)。我从台湾警察当局对我所采取的行动来推测,可能是旅日中共组织遭受破坏,不然日本警察当局不会采取这样严重的措施。我心里很难过,为党组织的安全而忧虑,但我还想方设法做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在警察当局的监视下,我利用四哥医院病人来往的机会,与当地进步青年联系,于1931年冬至1932年春,以他们的名义出版启蒙性刊物《晓钟》,这刊物到了第三期就被没收,并禁止发刊。

1931年2月间,警察当局对我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为缓期起诉,管制2年。因为台湾警察当局没有对我审问,也没有说出对我处理的原由,所以我一直不了解旅日中共组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年3月间,我在阅览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时,看到中国共产党旅日特别支部遭到全面破坏的消息。这时,我精神上受到了巨大冲击,对于党组织所蒙受的损失和同志们的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由于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心情万分痛苦,但我对于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并没有动摇,相信将有一天会找到党组织。

去年我从《大阪读卖新闻》1931年2月17日的报道,才对于当时旅日中共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有较详细的了解。虽然该报上

的一些报道与事实有出入,但可以作为了解当时情况的参考资料。

据日本报纸报道,日本仙台警察署于1929年10月3日和4日两天,共拘留仙台中国留学生26名。林荣年同志在1978年7月给我的来信中说,当时他和苏步青同志也被拘留审讯。

回忆起1927年春到1929年夏的两年多的时间的仙台留学生活,真是感慨万千。当时仙台留学生大都充满爱国热情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仇恨,为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紧密团结起来,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所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还鼓励着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大业努力工作。

注:林荣年:1930年回国后,在杭州和厦门医院工作,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厦门市第一医院院长,现已退休;夏邦奇:1927年毕业后回国,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庞大恩:1926年春九州明治专门学校毕业后到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当研究生,1930年初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到瑞金苏维埃政府工作,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英勇牺牲;陈建功:已故,当时是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院研究生,1929年回国;龚锡奎:当时是仙台农业学校学生,1928年6月间作为仙台反帝大同盟支部代表去过东京;夏邦基:夏邦奇的弟弟,当时他到日本时间不久,1927年夏离开仙台;苏步青:当时是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院研究生,1931年离开仙台回国,曾任浙江大学教授,解放后入党,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校长;谢循贯:已故。当时是东北大学理学院学生,1931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周鸿恩:大连金县人,当时是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学生;姜明伦:大连金县人,当时是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学生;扶学铤:1928年继庞大恩任中共仙台支部书记,1930年初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参加过左联活动,后来被关进龙华监狱,在狱中病逝;王紫渊:四川人,当时是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研究生,1929年回国。

##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

李 初 梨

我是1928年5月，同彭康、冯乃超、朱镜我、李铁生5人一道从日本回来并一起入党，编在闸北区第三支部。这个支部后改称为文化支部。由潘汉年通知我们，说已批准入党。然后大家到馆子里吃了顿饭，有闸北区委书记陈德辉参加，并没有举行宣誓仪式。

1929年我调到闸北区委作宣传工作。从此我放下了笔，从事党的工作。这在创造社是第一个人。当时陈德辉任闸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有李富春、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康生等人组成。项英不在江苏省委，他任中央职工部部长。1929年初发生江苏事件。据陈德辉告诉我是这样的：李立三要把李维汉派到江苏省委来检查工作。大家都知道马口事变时他是湖南省委负责人，所以拒绝他来。省委把情况向中央封锁。康生一开始是同意的，也参加了，后又向中央报告。中央改组江苏省委时，把他留下来当秘书长，而把李富春派到法南区当区委书记，王克全到闸北区当区委书记。何孟雄也是参加了这场斗争。江苏事件后李维汉当省委书记。何孟雄做过一段农运工作，是不是农委的秘书我不清楚。闸北区委有两个农民支部，有一次何孟雄到农民支部了解情况，由我带路。因为我在区委工作。后又派何孟雄任沪中区委书记，沪中多是估衣铺，他做店员工作。

当时没有上海市委，上海共有7个区，直接归省委领导。有闸北、法南、沪中、沪东（杨树浦一带）、沪西、浦东、吴淞。



闸北区委第四支部是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等人组成。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高级干部，对当时党的政策不满。开支部会时，一个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区委要派我去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这些新党员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不肯去。王克全说我不怕，我是个工人，由他去参加第四支部。同取消派的斗争搞了几个月。取消派把创造社的王独清拉过去了。他原来在法国留学同郑超麟认识。这个人能量很大，在创造社起的作用很坏，后来当了托派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想通过王独清把创造社的人也拉过去。约我们在王独清的家里见面。彭述之是个才子，风度潇洒，口若悬河。后来陈独秀亲自出面请我们吃饭，我没有去。1929年7、8月间发生中东路事件后，陈独秀向党中央写了意见书，闹得厉害了。11月由江苏省委把陈独秀等人开除党籍。本来应由第四支部开除，可是他们的势力大，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的决议。

1929年的夏秋我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接替陈德辉任宣传部秘书(或叫秘书长)，陈德辉被派到武汉，武汉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刚去两天就被捕牺牲了。他离开上海时，对我说，他是背着棺材去，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共产党员是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坚持斗争，这些烈士永远值得我们纪念。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夏才曦(我听别人说他在南京被捕当天叛变自首，后到苏联。抗日战争时我碰上王明，告诉他，他说应该通知莫斯科。后来我再也未见过夏才曦)。那时宣传部就是几个人，部长、秘书、几个干事。徐向前的爱人黄洁是宣传部驻机关的。对于省委其他机关我不了解。

我在第四支部时，党组织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5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皮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在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

1930年春左联开成立大会，参加会的人在街上碰上临时把我

拉去。鲁迅先生坐在我的对面。我从未参加左联的活动。中央有个文委，文委书记是潘汉年，由他们负责左联的工作。

1930年5、6月，成立了江南省委总行委，李立三是书记，李维汉是副书记。我是宣传秘书（取消宣传部），任弼时的哥哥任作民是组织秘书（取消组织部）。夏才曦负责轻纺工业工人运动，王克全是市政工会的秘书，负责重工业、邮政、电器等工人运动。徐大妹负责纱厂女工运动。我们每天上午8点到总行委所在地碰头。看看有什么工作，起草宣言、传单、标语等。每天碰头都有李求实，他当时任红旗日报的总编辑。

5月底6月初在上海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简称苏代会。事后我到会场去看了。是在沪西的一条路上，一边是旷场，一边有几栋房子。会场在一个弄堂里，门完全锁着，从外面看好象没有住一样。在开会期间连马桶也不倒的。隔壁的房子租下来，由潘梓年一家人装扮成祝寿。门口吹吹打打，有人进进出出，门口还站两个巡捕帮助维持秩序。以掩护开会，对面的房子也租下来，使外人看不见会场内情况。打狗队做好准备，如果被发觉，代表们从旷场上跑掉，他们掩护。敌人以为我们是在学校里开，拚命搜查各弄堂的学校。

30年代初，王明、博古、王稼祥等回国后，王明在一个基层单位（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中宣部工作。当时中宣部秘书长是潘向友。大约7月初，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王明，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监视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里去了一趟。王明和一位叫易坚的女同志（易培之的姪女）住机关。王明当时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

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五军打下了长沙。事先李立三并

不知道。我在北四川路从日文报纸看到了，飞快地跑去报告李立三。他大吃一惊，让我翻译日文报纸，把长沙的消息给他看。这时李立三提出南京暴动，上海暴动，要红军打武汉等口号。并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8月5日红军退出长沙，李立三着急了，让他们再次打长沙，这样才有第二次打长沙。

这时，召开全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当时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是一两个星期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扩大到区委的部长，工青妇等积极分子。何孟雄在会上对中央的路线提出不同的意见。李立三作总结时说：“好啊，现在有人对中央的路线发生怀疑，以后可以讨论讨论。你们等着长沙的消息吧。”李立三是指第二次打长沙的消息。在这个会之前，何孟雄找我谈过一次话，请我到馆子里吃饭。他说：黄浦江里有这么多帝国主义的军舰，你看上海能拿得下来吗？事后我向李维汉汇报了，成了整他的材料。何孟雄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他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马列主义理论少。他反对立三路线，方向对，但道理讲不清楚。比如他对我讲的那些，知识分子怎么会感兴趣呢？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理论问题。

立三路线一再碰壁，9月12日红军撤出了对长沙的包围，长沙也没有打进去。这渐渐地引起我的怀疑。我问王明：你在中央闹些什么，同我讲一讲。王明说：中央打过招呼，不准我外传。我说：你在我这工作，我当然应该了解你的情况。王明反问我：“你敢负责？”“我当然负责。”王明这才讲。他很善谈，一讲就是半天，我同意他的观点。

8月中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带来了十几个决议案，纠正立三路线。但江苏省委仍在批判何孟雄，攻击他为取消派的暗探。

9月正在酝酿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沪中区开活动分子

会，有三四十人参加。我得知后也赶去参加。何孟雄以为我是王明派去的，把我骂了一顿。我回来后告诉王明，王明说怎么搞的，不是有言在先吗？

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会上选举李维汉为政治局委员，仍旧批判何孟雄。三中全会决议，认为谁认为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对此不满。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了，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王明闻讯后来看我，劝我赶快写检讨，埋怨我不该这么干。这时中央已决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到苏区去。他们也同意了，准备去苏区。

过了不多天，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回来两个人，他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少共国际支持我们。我问他：开除我们党籍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少共国际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才知道这两个人是陈昌浩和王盛荣。

中央发一个通知，王明这伙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发了四五个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10月，共产国际来信指出，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这封信是11月16日到中国的。党内思想混乱，已到了不开会不能收拾残局了。关于召开紧急会议我从未听说过。要是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何孟雄这派观点的人 would 去得多些。王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个子非常矮，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多是些知识分子拥护他。何孟雄和王明为什么由反对立三路线到破裂，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王明斗争不坚决，一段时间内偃旗息鼓，同意去苏区；王明是书生没有斗争的经验。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些人不是中央委员，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参加了会，成为合法

的。但是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听说何孟雄、罗章龙也准备了名单，但是米夫先表决他们准备的名单，以一票之差通过了。何孟雄等人认为四中全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王明说，现在的条件，会不能开得很长，前不久第三国际来了一批文件，有十几个决议案，具体问题已解决了。

王明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四中全会后，他让我当宣传部秘书，让夏才曦给我当干事，故意给人难堪。我不同意，过了几天夏才曦不见了，不知分配到哪里工作。后王明指定我做沪东区的巡视员。沪东区是何孟雄等人的大本营，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最多。只有张琴秋一人拥护四中全会。当时沪东区委书记是罗铁成。

1月17日我和张琴秋去华德路小学参加支部会。这个支部有一部分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有二三十人。当时党内斗争十分激烈，无论是拥护四中全会，还是反四中全会的，都不冷静，大家都是昏头昏脑。支部大会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这时张琴秋站起来宣布：我代表区委解散你们支部大会。她讲完，我俩赶快离开会场，否则他们会打我们了。

18日晚沪东区委开会。陈云同志作为省委代表参加。有区委书记罗铁成，沪东区委负责人钱静庵，还有我和张琴秋等人。会未开之前，陈云同志宣布省委有事找李宜兹（即我），要我立即回省委。我刚站起来要走，钱静庵一步上去把门堵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下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头一天解散华德路小学支部大会对不对。双方相持不下。

同时，华德路小学支部在华德路小学也开会商量对策，被敌人发觉遭到逮捕〔据档案记载是18日下午逮去4个人：贺治平，江西人；王佩云（贺王氏），江西人，2月16日无罪释放；刘桂贞（刘刘氏），2月16日无罪释放；王和鼎，江西人〕。我估计被捕的这几个人是支部负责人。

19日王明召开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他先在会上讲了1个小时，我不记得他讲过第二省委和第二区委的问题。大家发言，他就埋头写，我以为他是作记录，实际是在写决议。大家发言完毕，他先作总结，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拿出几千字的决议读给大家听，当场通过。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王明在会上把他训了一顿说：共产党不是菜园子，要进就进，要出就出。向忠发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讲了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被捕的消息，要大家注意。

沪东派了两个人出席大会，除钱静庵外，还有一个宣传部长，是个男同志，姓名忘了。他在会上是举手同意的。散会时天已黑了。张琴秋、阿金、我同这个宣传部长到馆子里吃饭。大家做他的工作：大势已去，大家都是支持四中全会的，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也是无济于事。希望他不回区委，以便张琴秋、阿金给他做工作。他说，我明天要去参加支部会，这是他分工负责的支部，非去不可。我说：我明天去沪东区委，那你写个条子，交我带去。他在叫妓女的条子上用暗语写了一句话。

20日，一大早我就到罗铁成家里去。我走了不久，潘汉年派人通知我罗家已破坏。我到了那，怎么敲门也没有人开，转身走了，可一想这个会议精神十分紧要。王明能否拿下上海，在此一举。又回来敲门。老板娘下来开门，她的眼睛红红的，十分紧张。再向里看，一个包打听坐在床上，我被捕了。我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来，一口咬定是别人介绍我来找工作的。那张条子是用暗语写的没有破绽。敌人判我6年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出来。

(李海文整理)

# 父亲的故事

王 炯

我的父亲王再兴1914年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米脂县位于陕西省北部靠近长城，那里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在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有一座闯王行宫，它向人们叙说着那久远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这里办了一所中学——三民主义第二中学。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闯王的影响，这所学校里有许多学生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青年团组织。最多时竟发展到近百人。1928年5月日本人侵占了山东省济南市，并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公愤，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群众游行示威。米脂县三民二中的学生也在中共米脂县委领导下组织上街游行。刘澜涛、马文瑞等领导、参与了这次行动。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并到县政府请愿。这件事震动了整个陕北，也影响了父亲。他开始参加了革命，1928年7月他在米脂县上小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任米脂县团支部书记。

我爷爷家在米脂县属于小户人家，自己种着几亩薄地，家里不缺吃喝。因为他略通医术，经常有人来寻医问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上学，大女儿又作了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杜斌丞家族的侄儿媳，所以在当地名声不错。但突然有一天亲戚告诉他：你家二小子在学校不好好念书，专门和西街上的穷小子混在一起。爷爷听了火冒三丈，他拿起扁担把父亲痛打一顿，家里谁也拦不住。

爷爷的棍子丝毫也不能动摇父亲的革命意志，他考到榆林上

中学,继续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11月转为共产党,1930年在榆林六中读书时任党支部书记。有一次父亲抄写党的秘密文件被学校训育主任发觉。宪兵队包围了学校,父亲发现后立刻翻墙逃跑。宪兵的马队紧紧追来,一颗子弹把父亲的棉衣打开了花,父亲乘势滚下山,逃过宪兵的追捕。他连夜跑到米脂城外周家沟三姑家。我的三姑奶奶战战兢兢地将他藏到堆麦秸的土窑里躲过宪兵的搜查。宪兵没抓到父亲把我伯父抓去关了几天。父亲从此离开家乡,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受党组织派遣父亲在山西省平遥当了3年织布工人。3年的织布生活使他了解了工人的疾苦,也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一次行军的路上生了病的指导员高克恭掉了队。父亲发现后马上派人去找他,大家找了半夜才把昏迷不醒的指导员找回来。以后高叔叔在人前提起这件事时,父亲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1933年初日本人继占领东三省之后又侵占了热河省,使华北地区陷入危急之中。在中共河北省前线委员会的领导下联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5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那时共产党派了大批党员参加了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发展到十几万人。我父亲也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当时父亲虽然已经十八九岁,但因身材矮小看上去像十五六岁的样子。因为他人比较机灵作了吉鸿昌将军的一名副官。他随吉将军驰骋沙场,学习了军事指挥知识,为以后十几年的战争生涯打下了基础。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将军的直接指挥下于1933年7月攻克塞外重镇多伦,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蒋介石认为抗日同盟军的行动违反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再加上吉鸿昌将军1932年曾在湖北动员二十二军旧部起义参加红军,有一部分人发生了兵变。所以蒋介石联合日本人对抗日同盟军实行了分化和进攻的策略,致使抗日同盟军失败。吉鸿昌将军指挥的部队在北平小汤山失败后,吉先生到了天



津。父亲也随之来到天津。

在天津父亲的公开身分是吉府的副官，实际上他是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一次他到杭州去送一份秘密情报。不知是否走漏了消息，他刚到接头地就被警察围住。他说自己是外地人不认识路走错了地方。警察不相信，让他脱下衣服搜查。他老老实实地脱下外衣，规规矩矩地举起双手站在警察面前。警察从两侧向下摸到腰部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又仔细地搜查了外衣，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扣留了外衣让他快滚。那时我大姑妈住在杭州，父亲穿着衬衣短裤跑到大姑家。其实那份情报就在父亲衬衣上边的口袋里。我大姑妈看见父亲这样狼狈地跑来，实在是担惊受怕，她急忙给父亲缝了一身外衣。正好我大姑妈要回陕北老家，她带了5岁的表姐和1岁的表哥同父亲一起坐货车北上。火车到一小站停下，大表姐杜芳仪站在门口往外看。只听咣的一声，火车摇晃着起动了，把大表姐甩到站台上。父亲见状一个箭步跳下车，说时迟，那时快，他紧抱住表姐冲向后边的车厢。表现出惊人的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天津不时传来有同志被捕或一些人叛变的消息。白区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一天父亲收到从天津德租界监狱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到：王先生，我是一个从米脂到天津来投亲的女人。因为没有找到亲戚，我在这儿举目无亲。现在我被人陷害进了监狱。可怜我怀有身孕遭此灾难，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无声。虽然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是我在老家听人提起过你，知道你为人仗义。所以我冒昧地给你写信，求你看在同乡的份上，救救我这苦命的女人和我那没出世的孩子吧。后边署名米脂同乡尤祥斋。看完来信，父亲心里很着急。尤祥斋是米脂县最早参加革命的女同志之一。她丈夫阎红彦是父亲在抗日同盟军认识的。他们在天津举行婚礼还是父亲帮助操办的。“没想到她也被捕了，她们那是不是出了叛徒？冬天马上要来了，也不知她有没有棉衣？”父亲边想边

收起来信，他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准备去探监。可是当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翻了一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坐在床边。因为他的全部家当中最值钱的只是一件棉袍。那件棉袍还是他前几天把换季的衣服送到当铺后才从旧货店里买的。那时的地下党员中有许多人没有正当职业，他们不仅要长期忍受穷困的煎熬，还要随时面对被捕的威胁。所以像父亲这样有公开职业的人就要倾其所有支援他们，这样一来父亲自己就经常是捉襟见肘了。和父亲一起在吉府工作的还有教书先生陈伯达。陈建国后虽然位居要职，但是那会儿也是个没有固定收入的穷书生。他的生活费主要是吉鸿昌先生资助的。20世纪30年代的平、津市民有职业者都穿长衫。冬天没钱拢火的人就靠一件棉袍过冬。那时已经是秋天了，如果大冬天父亲一身短打扮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其他办法，最后父亲还是毅然把那件棉袍送了过去。

当时吉鸿昌先生在天津的住所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他毫不畏惧，仍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家成了我党的秘密活动联络站。1934年春天吉先生同南汉宸、宣侠父等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们联络东北军、西北军、李济深部队、李宗仁部队等中的全国抗日反蒋军队，组织抗日武装，并在天津开展秘密武装斗争人员培训，然后派往全国各地点燃抗日烽火。因派往安徽省活动的人员被捕，引起国民党对吉鸿昌先生的注意。南京当局下令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等人。我地下党得到情报后宣侠父、南汉宸先后离津。吉先生因一批军火没到没有离津。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任应岐等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被特务击伤，并被送到法租界工部局。据说，吉先生被捕第二天，法租界巡捕在吉府搜查时从我父亲的箱子里搜出吉鸿昌、南汉宸所拟西北抗日义勇军细则底稿，并以此作为吉先生的罪名。父亲因此逃离天津。由国民党军统局特派员郑介民向法租界交涉，并出4万

元买通工部局。吉、任等人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他们在天津五十一军关了十几天后被送到北平东直门内炮局子陆军监狱。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岐等英勇就义。

父亲离开天津后来到北平，他住在东城大佛寺小取灯胡同一位米脂同乡高老先生家中。高老先生祖上曾作过扬州道台，后来家境败落。但是老先生很好客，他家经常有米脂同乡在这落脚。那里无形中成了同乡聚会的地方。他的内侄常紫钟是父亲的朋友，他在东北大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搬到北平，那里有一大批主张抗日的东北流亡学生，也是北平地下党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父亲在北平按老地址去接头，但是原来的联络点已遭破坏。他只好穿了常先生的短外套装成学生的样子，到其他联络点附近闲逛，想碰上自己人接关系。一天他在一个联络点附近发现了可疑情况，本想马上离开，但是又怕来接头的同志吃亏，就在附近徘徊。突然他看见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刘仁同志远远走来。他赶快向刘仁同志迎面走去，边走边向刘仁同志招手。刘仁同志迅速离开了。后来父亲因为身分暴露离开了北平。1935年他回到陕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28军一团当政委。

解放以后刘仁同志在北京市当副市长。当他听说父亲在北京工作时曾派人来联系，他请我们到他家去玩。但是父亲觉得过去的事是自己应该做的，就借故推辞了。只可惜那时的规矩大人说话不让小孩听，所以当时他们回忆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事我就知道了。刘仁同志解放前在北平地下党工作，出生入死十几年；建国后为北京市的建设尽心竭力十几年，“文化大革命”却受迫害至死。

虽然往事如烟早已飘入了历史的长河，但是老一辈革命者出生入死的斗争经历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 忆周总理二三事

武吉次朗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我因供职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而有幸与周总理接触过。其中几件小事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是1971年2月24日,我随同木村一三等去会见周总理。当时日方只有五六人,且都是老朋友,气氛轻松愉快,总理拿着名单,对我们每一人都发问。

这期间,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正准备派一个由日本海运界首脑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作为整个日本经济界面向中国的突破口。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情况,交通部作不了主,层层上报,迟迟没有得出结论。我作为这个协会的北京联络员(那时因没恢复邦交,不能叫驻京代表)几乎天天催促交通部,很着急,无奈任期已到,3月初回国了。后来,交通部的请示报告报到总理那儿,才批下来了。交通部的官员把“欢迎该团来访”这一好消息通知给接替我的联络员,同时还告诉他: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在请示报告中提到贵会北京联络员再三催促的情况时,把武吉次朗先生的名字,误写成“武吉次郎先生”。没想到,总理在请示报告上写:“郎”字似乎写错,应为“朗”(大意,因不是我亲耳听到的)。

当那个联络员转告我这一消息时,我顿时热泪盈眶。周总理日理万机,竟然记得我这个只见过几次面的外国人的名字!今天回想时,我的眼睛还是湿了。

人们都称赞总理记性特别强。这固然不错,但我觉得更宝贵的,还是他对别人的关心。如果没有“他人第一”的精神,记性再强,也恐怕做不到这样细致。

二是1967年6月26日晚,我随同萩原定司去会见周总理。我们事先商量好,并征得接待单位谅解,每人拿一本毛主席语录(那时候,好多中国朋友纷纷把语录送给外国人,我们都有),会见结束时,请求总理给每人签名留念。

半夜,会见结束。萩原定司掏出语录来,请总理签名,总理答应了,我们也掏出语录,排队等候。当签名到三四个人时,总理看了看手表,说:“啊,都12点了!”于是,从下一个人开始,签的日期由6月26日改为27日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本语录成了传家宝。每当中国朋友来我家做客时,我总要给他们看这本语录,并且把“同时会见,签的是两个日期”的情况介绍一番。他们都表示非常羡慕,并且说:“多细致、一丝不苟啊!这就是总理的工作作风!”

还有一件事,1972年恢复日中邦交后,每年年初,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中经济协会等,联合举行“新年贺词交换会”,相当于中国的新年团拜,邀请中国驻日大使以及中国驻日机构代表,共贺新年,出席者少则五六百,多则近千人,十分热烈。1976年的这个酒会,原定于1月9日晚,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具体事务由贸促会担任:事先发通知,谁出席谁事先报名,以便按照确定人数安排酒菜。1975年底,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万万没想到,1月9日清早,噩耗传来。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提早上班,立即商量,并征求中国大使馆意见后,决定取消当晚的酒会。于是,动员事务局全体人员,分头打电话通知给原来报名出席的几百名经济界人士。由于情况特殊,新大谷饭店也很慷慨地答应不收“取消费”。

绝大部分的人,都联系上了,但也有个别人没能联系。傍晚,事

务局负责人责成我(当时我任贸促会理事兼业务第二部部长)和其他几个人,去新大谷饭店原定会场,如果有人不知道取消而来,就说明原委,请他们予以谅解,要做好善后工作。果然,有的因一大早专程从外地坐车赶来,没听到噩耗,来了几个人,经我们一说,他们都表示“理解,理解”。

8点过了,我们几个离开原定会场,不约而同地说:“走,去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定于从10日早晨起,接待前往吊唁的日本各界人士,因此前一天晚上,灵堂都准备好了。我们说明来意,商务参赞特来接待。我站在总理遗像前默哀,禁不住失声痛哭,说不出一句话,久久紧握参赞的手……

# 1959—1961 年美国对西藏事务的干预

骆 威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美国仍然密切注意西藏的形势变化,寻找插手的时机。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美国对此反应积极。对于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美国对藏插手情况的研究,目前很不充分,特别是对美国在插手西藏中所考虑的程度与范围,缺乏整体分析。本文试图利用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和中国平叛档案,阐明这段时期美国对西藏插手的过程,尤其是对美国只有“反共”不提“藏独”进行分析,揭示其决策内情与实质。

## 一、密切注意西藏形势,支持康区叛乱

西藏,亚洲的腹地和天然的战略高地,中国西侧的屏藩。而美国一直企图把西藏变成在南亚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一个“桥头堡”,作为打击新中国、遏制中苏的工具。西藏和平解放前,美国以设法阻止中国解放西藏作为其对藏政策的主要目标,但遭到失败。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仍未放弃希望,继续秘密与西藏接触,怂恿达赖出逃。如1951年11月,国务院还指示美驻加尔各答副领事吉布逊(William G. Gibson)与一些西藏分裂分子联系,由他们转交

劝说达赖出逃的信。<sup>①</sup>美国同达赖和西藏噶厦的联系,既为西藏叛乱中美国的插手埋下了伏笔,也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的一个因素。1952年起在昌都地区发生了一些叛乱活动。1956年,理塘、甘孜和康区先后发生了有组织的武装叛乱。

美国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西藏情报,并派特务与在印度噶伦堡<sup>②</sup>的嘉乐顿珠(达赖的二哥,1951年曾去美国)、当采(达赖长兄,1956年冬他在美国授意下,专程从美国赶到印度参与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夏格巴、鲁康娃等分裂者联系,收集情报,策划行动。

1952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1953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基本确立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的基调。其核心是“在不发生战争的限度内”,“不断保持对红色中国的军事压力,并希望它在某一方面出现内部崩溃”。<sup>③</sup>在西藏问题上,要密切注意西藏形势变化,一有时机就抓紧行动,同时要继续制造“共产主义侵略”、“中共扩张”的舆论。

康区叛乱使美国认为需要重新调整对藏政策。对西藏的援助不能公开进行,也不能通过国务院和驻印外交机构(因不久必然会泄露)。中央情报局于是成为这种秘密援助行动的可靠执行者。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 Dulles)对此极为积极。他认为西藏叛乱的形势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理想机会,它将以向西

---

① FRUS, 1951, Vol. 7, Korea And China, part 2. GPO, Washington, 1985, p. 1847.

② 聚集了不少外逃的西藏上层反动官员及美、英等国和台湾的特务,是间谍活动中心和反共中心。

③ David A.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 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9; Robert Bl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1966, p. 120.



藏叛乱分子提供秘密援助的办法来“袭扰”中国。<sup>①</sup> 虽然达赖起初一直说什么“1959年3月前与美国人并没有直接联系”<sup>②</sup>,但是近年来,他本人终于公开承认,中央情报局曾经支持了西藏的叛乱武装。<sup>③</sup>

1957年初,由嘉乐顿珠安排,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选了6名康巴人接受特工训练。这也是美国首次训练藏人。<sup>④</sup> 训练西藏叛乱分子的目的,如美驻印大使加尔布莱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说,一是增强叛乱力量,袭击解放军,“使中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在平叛斗争中”;二是在国际社会形成中国“侵占”西藏导致西藏反抗的印象。<sup>⑤</sup>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7年到1962年,中央情报局通过嘉乐顿珠等人联系,先后挑选了约170名康巴人为主的西藏叛乱分子,从印度经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到台湾、塞班岛等地受训。1959年以后训练基地搬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位于落基山脉的哈尔营地。这些特工由空投或陆路派人西藏,成为叛乱武装的骨干。人民解放军在三年的平叛斗争中,击毙、俘虏共25名由美国训练的藏族特工人员,缴获了大量美制武器装备。<sup>⑥</sup>

此外,美国多次派飞机空投武器和物资。如山南“卫教志愿

① [美]N. C. 霍尔著,成军译:《美国、西藏与中国》,张植荣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② A Correspondent, 'Diplomacy and the Dalai Lam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11, March 18, 1974, p. 22; Chris Mullin, 'We Tibetans Have Nothing to Hid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36, September 5, 1975, p. 33.

③ 1993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迪娅·德雷菲斯对达赖的采访谈话,转引自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西藏历史地位辩——评夏格巴〈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④ Chris Mullin, 'Tibetan Conspirac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36, September 5, 1975, pp. 31-32.

⑤ FRUS, 1961-1963, Vol. 22, China, GPO, Washington, 1996, p. 170.

⑥ 《西藏历史地位辩》,第599页。

军”成立后,1958年11月4日,美国首次对他们进行空投支援。美机在边坝地区空投过3次共8个架次的武器弹药。<sup>②</sup>从1959年11月开始,美国又在恩达、丁青、嘉黎、硕般多之间的地区空投6批9架次,包括特务17名和大批武器弹药,并在美特指挥下成立“康区四水六岗军队总部”。<sup>③</sup>又如在陆路运输方面,1959年1月11日,美国经尼泊尔运入定日40驮武器弹药,后经协噶尔运送到山南地区。<sup>④</sup>

除空投特工、武器外,美国空军还出动U-2高空侦察机,从巴基斯坦的基地起飞,进入西藏进行间谍侦察。直到1960年,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的1架U-2被击落,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停止所有U-2飞行,西藏上空的间谍侦察活动才停止。<sup>⑤</sup>

## 二、西藏全面武装叛乱,美国支持达赖出逃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驻藏解放军于3月20日10时零5分奉命反击,平息叛乱。3月22日拉萨市叛乱全部平息。3月17日夜,达赖及其亲属、随从、官员、藏军等600余人从拉萨出逃。

虽然美国对达赖出逃中其行为严格保密,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支持了出逃事件,并不时向国务院汇报。美国的飞机飞入西藏数百英里对达赖集团进行空中掩护,侦察解放军

① ‘Tibetan Conspiracy’, p. 32.

② 顿堆典英:《从宗秘书到边坝地区叛军司令》,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③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平息西藏叛乱》,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5页。

④ 《平息西藏叛乱》,第219页。

⑤ I. Fletcher Prouty,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nglewood Cliffs, 1973, p. 82.

的动向,空投食物、地图、收音机和金钱。他们给这次行动拍了彩色录像(一个由美国训练的康巴摄影师一直陪同达赖),后来在美国许多人观看过这些录像,有人便说:“毫无疑问的是,不是中国人要废黜达赖喇嘛,而正是美国人要使他倒台。”<sup>①</sup>

3月24日,达赖集团抵达山南邛多江。此时世界各国正在纷纷猜测达赖下落,美国却胸有成竹。达赖接见了1957年8月空降到山南的两名报务员特工,并把他们一齐带到了隆子宗。中央情报局在东巴基斯坦的联络站随时与这两名报务员保持联络,向美国国内报告。实际上,3月11日毛泽东已指示西藏工委:“他们(指达赖等人)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sup>②</sup>这使得在达赖长达两周的外逃途中,解放军并没有阻截、追击达赖一行。但是正如参与这一计划的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德·皮塞尔(Richard Bisell)后来透露:如果没有中央情报局策划,达赖不可能如此“顺利出走”。<sup>③</sup>

### 三、印度态度变化,美国大造反共舆论

1959年3月31日,达赖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境内。在外国势力支持下,4月18日发表提斯普尔声明,公开反对和平协议,鼓吹西藏独立。<sup>④</sup>

对于西藏叛乱、达赖出逃和解放军平叛,美国反应“积极”。印

<sup>①</sup> T. D. Allman, 'A Half-forgotten Conflic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6, February 11, 1974, p. 27;《平息西藏叛乱》,第202页。

<sup>②</sup> 《平息西藏叛乱》,第82页。

<sup>③</sup> [加拿大]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sup>④</sup> 《关于西藏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一五月的文件、资料)》,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5—178页。

度对西藏叛乱的支持态度也“鼓励”了美国的“热情”。

印度认为,西藏是中印之间的一个缓冲带。1951年解放军入藏,这个缓冲带的消失使印度大为恐慌,于是也就有了当时印度的三次外交照会。但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和巴基斯坦结盟、中苏同盟),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印度的国家安全,以尼赫鲁为首的文职当权派决定,在国家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巴基斯坦”,“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sup>①</sup>他明白,既然干涉西藏的企图不会成功,不如努力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印度对美国向南亚渗透、把南亚拉入反共集团的企图也怀有戒心。1954年5月,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共同防御协定”,不久巴基斯坦又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印度认为这是对其安全的威胁,批评美国的做法。所以,印度在中国进军西藏、西藏和平解放问题上基本多采取中立政策,对美国干涉西藏的“热情”不加理睬。印度的态度成为影响美国对藏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同时,尼赫鲁一直没有放弃建立“大印度联邦”、树立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的努力。从此意义上讲,中国又是它的劲敌。在印度政府内部,早在1950年,一些强硬派和右派人士就主张对藏采取军事行动,并开始在中印边境线上暗中蚕食中国领土,以图造成既定事实,迫使中国政府承认。西藏发生叛乱后,印度国内右派势力上升,干涉西藏的舆论占了上风。尼赫鲁本人也发生变化。1959年,他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西藏武装叛乱。

既然印度态度有了转变,美国也就少了一层顾忌。3月24日,国务院发言人还称:“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来支持西藏的反叛”,在表面上继续做出美国不

<sup>①</sup>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干涉西藏事务的姿态。<sup>①</sup>但在26日,国务院发言人却说:“美国的立场是清楚的,美国从未承认或者宽恕这项所谓的协定(指《十七条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共产党剥夺了西藏人民长期享受的政治自治权。”<sup>②</sup>实际上等于用典型的外交语言鼓动西藏否认协议,发动叛乱。28日,国务院又发布官方声明,声称,“美国深切同情西藏人民面对中国共产帝国主义的野蛮干涉,他们剥夺一个自豪和勇敢的民族所珍爱的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并为了共产主义目的毁坏他们的制度。”<sup>③</sup>美国新闻舆论在政府的鼓励下,更是大肆叫嚷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

美国还认为,解放军平叛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印度等南亚国家更好地认识“共产党中国威胁”的机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利用这种形势,促使印中关系恶化,使印度投入美国怀抱。美国由此制定了“谨慎地利用西藏的反抗斗争来提高美国在南亚的地位”的所谓南亚政策。艾森豪威尔也认为,“目前形势下,尤其是印度与共产党中国关系因西藏的反抗斗争而恶化,美国应特别努力促进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更多的理解合作”,促使两国一起来对抗共产主义。<sup>④</sup>在远东政策上,美国也希望“中共对西藏的平叛会使亚洲国家失去对其的尊敬和同情”,从而有利于美国在亚洲的行动。<sup>⑤</sup>在1959年4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上,国务院就企图使会议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在西藏的行

---

① 《参考资料》,1959年3月27日上午版。

② 《参考资料》,1959年3月27日下午版。

③ 《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第40期,第515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第357页。

④ FRUS, 1958—1960, Vol. 15,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GPO, Washington 1992, p. 1, 31, 166, 713, 752.

⑤ FRUS, 1958—1960, Vol. 16,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Cambodia; Laos, GPO, Washington 1992, p. 134.

为”。<sup>①</sup>

#### 四、确立避免直接干预、只有 “反共”不提“藏独”的立场

1959年3月28日，中国新华社发布《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人民日报》在3月31日发表《彻底平定西藏叛乱》的社论，对美国的污蔑进行抨击，指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叛乱事件。甚至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不能不说，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sup>②</sup>

确实，在美国的官方声明中，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承认西藏独立。对于美国来说，公开承认西藏独立与暗中支持西藏叛乱力量是两回事。即使在达赖组成流亡政府以后，美国也是根据外国代表注册法，批准设在纽约的“西藏办事处”注册作为达赖的代理机构，并没有承认西藏流亡政府。<sup>③</sup>所以，虽然美国舆论极力鼓吹，美国政府仍然不想公开承认西藏独立，极力避免扩大可能由此而引发的冷战和热战。秘密行动也是小心谨慎。特务空降前，衣服和装备上任何可以把他们与美国联系起来标记都被销毁，甚至发给他们的毒水瓶上的标签也被撕下。

西藏全面武装叛乱后，美国在3月26日和4月23日、30日连续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商量对策。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不断报告西藏情况。他建议美国以国际志愿救济机构、国际红十字会为中介或以给印度政府现金的方式援助西藏，“应注意避免任

<sup>①</sup> Ibid. p. 86 footnote 2,3.

<sup>②</sup>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第5、54—55页。

<sup>③</sup> George N. Patterson, *Requiem for Tibet*, London: Collins, 1974, p. 185.

何直接援助,以免使美国给人以政治上的兴趣强于人道上的兴趣的印象”。<sup>①</sup>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 Herter)也赞同这种主张。<sup>②</sup>

5月1日,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西藏问题。空军总参谋长怀特将军(Thomas D. White)汇报了“空军再次供应西藏反叛者给养的能力,和使用空军力量来阻止中共控制西藏的地理上的可能性。”<sup>③</sup>5月8日,国务院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西藏行动方案。在6月4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格雷(Gordon Gray)也提到,防卫部门中有一种意见主张,美国需要再检讨目前在西藏问题上的“推脱政策”。<sup>④</sup>不过,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墨菲(Robert D. Murphy)认为:因尼赫鲁不愿把西藏问题放到冷战背景下,故印度可能在此事上“洗手不干”,美国把自己作为“西藏保护者”就会有許多麻烦。<sup>⑤</sup>所以,总统和国务院还是决定,目前不能采取积极的干预行动。

## 五、美国与台湾的会谈

西藏叛乱也刺激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反共热情”。据美国和西藏联系的中间人帕特逊(George N. Patterson, 苏格兰人)证实,早在1949年,美国、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分裂势力之间的联系就一直未曾中断过。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与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结婚。美国利用这个关系,通过他和台湾当局、西藏政府保持联系。达

---

①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GPO, Washington, 1996, p. 753.

② Ibid. p. 756.

③ Ibid. p. 561.

④ Ibid. p. 770.

⑤ Ibid. p. 769.

赖大哥当采也在 1953 年通过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政府接触。<sup>①</sup>蒋介石也一直与美国互通西藏叛乱的情报。<sup>②</sup>

3 月 26 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所谓“告西藏同胞书”,鼓励西藏叛乱分子说,他们“不是孤立的”,答应“集中一切力量”给他们以“继续有效的援助”,并许诺“光复大陆”后,在西藏实行“民族自决”。<sup>③</sup>

但是,虽然美台在西藏情报搜集和训练叛乱武装上合作密切,美国却不希望台湾过分行动。美国很清楚,无论是其对西藏的暗中支援,还是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和空投物资,对西藏叛乱武装只是杯水车薪,不会有实质进展。美国不希望台湾走得太远,把其拖下水,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它不断对台湾施加压力不让其过多插手。美国的如意算盘是:最好由台湾出面声明允许西藏独立,美国就不会背上分裂他国的罪名,还可以以民主卫士的身分出面援藏。

但是,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在 1958 年下半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国民党就反对美国提出的“划峡而治”。在西藏问题上也是如此。蒋介石只是把西藏叛乱武装作为反共、“光复大陆”力量之一加以利用,对于西藏的地位问题,他与中国共产党一样,都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④</sup>

在 3 月 26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艾伦·杜勒斯就特别建议

---

①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0 页;George 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0, pp. 92-94.

② FRUS, 1955-1957, Vol. 3, China, GPO, Washington, 1986, p. 603.

③ 师博主编,《西藏风雨纪实》,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2 页;U. S. Department of Stat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56-1953*, New York, Arno Pr., 1971, p. 1162.

④ An American Research Scholar, 'Tawan and Tibet', *Tibet Review*, Vol. XI, Nos. 1&2, January-February, 1976, p. 18.



缓和一下蒋介石的态度,使其不至于太急进而影响美国的总体利益。<sup>①</sup>4月2日,国务院致电美驻台湾大使,说国务院已注意到蒋介石在3月26日的声明,还是认为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要慎重。<sup>②</sup>

4月23日,台湾驻美国大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 Roberson)、中国科副科长路特肯斯(Larue R. Lutkins)举行会谈。罗伯逊表示,希望台湾能公开正式宣布放弃对西藏的主权、承认西藏独立地位。叶公超对此断然拒绝,指出国民党宪法没有规定西藏独立地位。<sup>③</sup>4月29日,罗伯逊、中国科科长马丁(Edwin W. Martin)和叶公超再次会谈。叶公超通报了台湾对罗伯逊意见的答复:“国民党支持西藏反对中共的斗争,会继续鼓励西藏追求自决的目标。如果达赖组成临时政府,台湾会按宪法第120条款承认其为合法的西藏政府(指西藏地方政府)”。但再次以宪法上的困难为由反对西藏独立。<sup>④</sup>

## 六、确立对达赖流亡政府和联合国西藏提案的原则

1959年4月23日,当采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表示西藏并不满足于自治要求,希望美国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并影响其他国家承认。国务院在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见后决定:美国在西藏事务中要保持背后作用而不是公开行动,“应努力避免给世界以美国正在极力利用西藏形势为冷战服务的印象”;现在其他国家态度尚不明确,美不应率先承认流亡政府,还应避免采取可能会激励达赖寻

① FRUS, 1958—1960, Vol. 19, pp. 751—752.

② Ibid. p. 370.

③ FRUS, 1958—1960, Vol. 19, p. 757.

④ Ibid. p. 761.

求国际承认的立场,不做明确承诺;对于在联合国举行西藏问题听证会,美国不宜直接插手。这样,国务院要驻印大使口头转达达赖,目前达赖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流亡政府可能是不明智的。<sup>①</sup>

但在5月初,美国得到情报:达赖可能会马上宣布成立流亡政府,要求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认并向联合国呼吁。为此,国务院远东司、国际组织事务司、法律顾问局和近东、南亚、非洲事务司四个部门联合讨论了美国“积极行动的潜在利益和不利因素”,起草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承认西藏流亡政府问题上,除非能确定其他国家会承认,否则就不应鼓励达赖提出此要求;但若达赖公开呼吁,美国应立即向西藏保证会考虑此事,与其他国家紧急商谈,努力说服他们同意,若不行再根据形势发展决定如何做;如果达赖不得不离印,应努力帮助他在美国或其他自由国家获得避难;应劝说国民党政府同意或至少不反对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向联合国呼吁问题上,应与其他国家协商,尽可能获得广泛支持;根据形势发展邀请达赖在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上呼吁;若印度和其他亚洲不结盟国家反对联合国采取行动,则美国应充分考虑反对原因;如果西藏自己不向联合国呼吁,美国就不应首先提出,要尽可能保持与西藏的联系;若以后有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愿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美国应谨慎地鼓励它去做;若估计在联合国可以获得足够支持,可以促使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出西藏议案。这份报告一出台,马上就成为美国对藏行动的现实方针。<sup>②</sup>

---

① Ibid. pp. 763—765.

② FRUS, 1958—1960, Vol. 19, pp. 766—767.

## 七、美国为联合国西藏提案出谋划策

1959年8月30日,在美国支持下,达赖发表声明,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9月9日,他又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 Skjold),诬蔑中国“侵略”西藏,要求“联合国对西藏问题立即给予考虑和辩论”。<sup>①</sup>9月4日达赖又与美驻印使馆联系。驻印使馆顾问布朗(Winthrop G. Brown)替达赖出谋划策,以“中共侵犯人权”为基础提出“西藏问题”,就会获得广泛支持;而若以“侵犯主权”提出,因为对西藏的地位尚有争论,效果会差些。他还建议国务院把此事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一事分开对待,以免被认为是“冷战提案”。<sup>②</sup>在10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艾伦·杜勒斯也认为提案不应强调“中国侵略”,他的理由值得注意:“因为西藏许多年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故提案应以“人权”为基础。<sup>③</sup>

在提案具体操作上,美国可谓“一番苦心”。9月5日,布朗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杜特(Subimal Dutt)会谈。杜特表示,印度认为把西藏问题带到联合国并不合适,更不希望提案采取强烈措辞。<sup>④</sup>18日,国务卿赫脱特意会晤英、法两国外长,向他们转告:因为亚洲国家都不愿带头提出提案,故美国想促使爱尔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联合提案,而且要“提人权不提独立”。但是英国因害怕这会对香港问题造成先例、法国因担心这会给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造成不利而都表示反对。虽然印、英、法态度如此,9月19日,赫脱还是会

---

① 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20页;《平息西藏叛乱》,第231页。

② FRUS,1958-1960,Vol. 19,p. 782.

③ Ibid. p. 784.

④ Ibid. pp. 777-781.

见爱尔兰外交大臣艾肯(Frank Aiken),给爱尔兰打气。两人还研究了提案草案的措辞。<sup>①</sup>

10月5日,达赖派嘉乐顿珠、鲁康娃和桑多仓·仁青到纽约,前往联合国寻求支持。他们聘请美国人、前国务院法律顾问格罗斯(Ernest A. Gross)为律师,并通过他拜访了美驻联合国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强调西藏还是希望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独立问题”。<sup>②</sup>洛奇马上表示:“提出独立问题是不慎重的”,西藏必须注意其他国家的态度。10月7日,在接到洛奇报告后,赫脱指示洛奇:美国还是不能主张提出举行达赖听证会,而应由西藏自己提出。美国应该有策略地促使其他国家来建议西藏向联合国提出举行达赖听证会。

为确定美国对西藏地位问题的看法,国务院远东司进行过一项专门研究,包括关于美国在不承认西藏独立上的理由和细节问题。研究表明:在目前情况下,反对承认西藏独立的意见占上风;美国不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否则会使世界认为达赖是为取得政治支持而投靠美国,从而破坏其在亚洲的宗教领袖声望,“妨碍以后的反共行动”;但美国也不应忽视达赖的呼吁,否则就会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国际道义主持者”的形象受损,也会打击西藏的积极性。所以远东司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Howard J. Parsons)向赫脱建议:以支持西藏“民族自决权”的方式来避免明确表达西藏的法律地位,只承认“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在清朝灭亡后尤其是在西姆拉会议后所享有的事实上的自治地位”,尽管西藏会对此不高兴,但也没有其他办法。<sup>③</sup>赫脱批准了这个建议。

---

① Ibid. pp. 785—787.

② FRUS, 1958—1960, Vol. 19, p. 792, footnote 1.

③ Ibid. pp. 792—795.

## 八、两次联大决议

1959年10月20日和21日,联合国第14届大会就西藏问题举行辩论,通过了爱尔兰、马来西亚的提案(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英国、印度和尼泊尔投了弃权票)和所谓的决议,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他们独特的宗教、文化形态”。但是,正如美国所希望的,决议并没有提到“西藏独立”问题,也没有直接指名“中国”。<sup>①</sup>美国由此极为“庆幸”,认为这表明美国的“让爱尔兰和马来西亚带头的政策是明智的”。<sup>②</sup>

10月29日,美国副国务卿墨菲、中国科科长马丁与嘉乐顿珠举行会谈。嘉乐顿珠再次提出,“独立是西藏的根本目标”。对此,墨菲和马丁又以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利”进行搪塞。但在10月30日嘉乐顿珠拜访国民党驻美大使叶公超时,却向叶公超声明,墨菲已在原则上同意支持“西藏独立”,以此来要求台湾宣布赞成西藏独立。在叶公超11月3日向马丁、助理国务卿帕森斯询问此事时,帕森斯马上予以否定,表示这仅指西藏自决原则,他和马丁在与嘉乐顿珠会谈时从未使用过“西藏独立”一词。在31日帕森斯与嘉乐顿珠会面时,他更为详细地向嘉乐顿珠解释了美国的主张。<sup>③</sup>而且,国务院还向英、印通报了美国态度。<sup>④</sup>

1960年8月19日,泰国和马来西亚要求联合国大会进一步考虑西藏问题。9月13日和16日,达赖两次写信给赫脱请求支

---

① 《藏区政治史》,第321页; Alfred P. Rubin, 'The Position of Tibet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5, July—September, 1968, p. 15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56—1963*, p. 1187.

② FRUS, 1958—1960, Vol. 19, p. 796.

③ FRUS, 1958—1960, Vol. 19, pp. 800—802.

④ *Ibid.* p. 806 footnote 1.

持。10月27日,赫脱、马丁与嘉乐顿珠会谈。赫脱保证,美国会与泰国和马来西亚“密切协商,尽可能通过一切办法帮助西藏”;希望联合国决议中包括西藏的“民族自决原则”,因为只有这样的决议才会“赢得更广泛的支持”。<sup>①</sup>1961年12月20日,联合国第16届大会在美国支持下,以56票赞成、29票弃权、11票反对,通过所谓“要求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他们的自决权”的决议。<sup>②</sup>但是决议仍然没有提及“西藏独立”。

## 九、美国失去兴趣

1960年2月4日,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官员参加的会议上,艾伦·杜勒斯介绍了中央情报局支持西藏抵抗力量的行动及组织情况,以及秘密行动计划(未公开),要求总统批准继续该计划。艾森豪威尔和赫脱都同意,批准了艾伦·杜勒斯的报告。但该计划还将时刻接受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12/2号文件所组成的代表团的检查,无疑对秘密行动增加了限制。<sup>③</sup>

1960年前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西藏叛乱武装的根据地转到了尼泊尔的木斯塘。叛乱分子以此为基地,不断越境进入西藏袭击解放军。但是,这种秘密行动的袭扰作用却日益减弱,甚至成为美国的负担。在政府内部,反对美国在西藏的秘密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驻印大使班克(Ellsworth Bunker)及其继任者加尔布莱斯就曾强烈反对美国训练西藏特工。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藏

---

① Ibid. p. 812.

②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56—1963, pp. 1641—1642; 'The Position of Tibet in International Law', p. 153.

③ FRUS, 1958—1960, Vol. 19, pp. 808—809. 在1955年12月28日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决定由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代表组成代表团,任何重大的秘密行动都必须向该代表团汇报。

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德·皮塞尔把这种行动称为“边际收益”(指收获极小)。在国务院内部,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即前美驻苏大使)和远东司中国科科长马丁等人也反对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动。<sup>①</sup>

虽然,中央情报局还是希望继续这些行动。如艾伦·杜勒斯的继任者麦康(John A. McCone)认为,除非在西藏问题上改变支持叛乱武装的政策,否则应该继续在西藏的秘密活动。<sup>②</sup>但是,面对西藏叛乱武装不断失败(到1961年底,人民解放军已全部肃清了西藏境内的叛乱残余分子,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完全胜利),叛乱分子内部斗争加剧,解放军也加强了边界控制,边界袭击越来越难,中央情报局终于失去了兴趣。1963年9月19日,在一次会议中,中央情报局官员科尔比(William Colby)作了关于在西藏开展秘密行动的详细回顾,最后他承认:“这些行动并不是特别有效的”。所以,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行动的人都认为,已经到了改变策略、手段的时候了,中央情报局只能把目标限制在“那些真正重要的行动上”。<sup>③</sup>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央情报局彻底放弃了对西藏叛乱力量的支持,西藏叛乱武装也随即土崩瓦解。

## 十、结 论

1959—1961年尤其是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后,美国对西藏插手,是想利用西藏叛乱活动,来打击、遏制中国,实现冷战的总体目标。它一方面对西藏表示“同情与关注”,怂恿西藏叛乱;另一方面它也清楚,由于冷战重心不在远东,美藏相距遥远,美国不可能

---

① Ibid. p. 321.

② FRUS, 1961—1963, Vol. 22, p. 321.

③ Ibid. p. 397.

出兵干涉和公开提供军援,而且即使有外国暗中支持,西藏某些上层分裂势力也不可能成功地反抗中央,取得独立。美国不想承担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罪名,但又想通过插手西藏获得利益,于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来援助西藏叛乱力量,以打击中国,赢得国际支持。

但是,美国不得不暗自承认,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讲都无法成立。1961年8月5日,总统肯尼迪、助理国务卿克里夫兰(Harlan Cleveland)、总统特别助理史乐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和美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讨论关于美国在第16届联大上的策略时,史蒂文森认为,“反对中国接管西藏行政权的法律依据是非常薄弱的”。<sup>①</sup>所以,在公开操作中,从主权概念上美国采用了回避中国对藏主权的方法,或用迂回替代(如以“自治”、“民族自决”、“人权”等概念)的方式避免向中国的主权提出直接挑战。美国从未明确承诺支持“西藏独立”,满足达赖和叛乱分子的全部要求,它所给的援助也远远没有达到能支持“西藏独立”的程度。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打破坚冰后,美国调整了政策,放弃了对西藏叛乱武装的支持,使其迅速瓦解。这表明,“中美关系比西藏问题更为重要”。即使在70年代以后,美国不断以“人权外交”干涉中国内部事务,邀请达赖发表反华政治演说,国会也不断抛出“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提案,资助达赖集团。但是,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从未承认过达赖流亡政府,美国政府对此态度明确。1998年6月27日,克林顿总统访华,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见中外记者时,再次表示,“美国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社会,鼓吹西藏独立或“高度自

---

<sup>①</sup> FRUS, 1961—1963, Vol. 22, p. 113.



治”的声音还很响亮。数十个国家都有西藏流亡藏人和西藏分离主义者的运动；达赖喇嘛成为“国际政治明星”，美国总统和政要不断会晤达赖……这一切都警示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注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安定，谨慎地做好西藏工作。

# 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雷 厉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被周总理称为“一个比较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由余秋里负责的“小计委”编制的。

## 一、毛泽东提出要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

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编制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对此,毛泽东总觉得不大满意。

1964年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改变编制计划的方法。他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方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

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sup>①</sup>

在毛泽东提出要改变编制计划的方法以后，陈伯达于8月20日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他对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其中有一条是“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他说：“毛主席在1957年、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sup>②</sup>7天以后，8月27日，陈伯达把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本来已经对计划工作不满，陈伯达的信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毛主席当即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sup>③</sup>

李富春同志接到毛主席的指示以后，立即组织国家计委的干部进行讨论，力求尽快改变计划工作方法。12月初，国家计委拟定了一个《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文件，提出了改进计划工作方法的一些设想，于12月7日报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于12月12日批示：“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肉有皮有毛的东西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sup>④</sup>

毛主席的两次批示，对国家计委的不满情绪，改组国家计委的决心，已跃然纸上。

要改组机构，就要物色人选。毛主席把目光转向了成功地组织领导大庆石油会战的余秋里。

1964年1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一次会议

---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页。

<sup>②③④</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6页。

上,毛主席提出调余秋里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工作。有的同志说:余秋里是一员猛将、闯将。毛主席在12月20日的讲话中说:“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么?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周恩来总理接着说:“去冲破一潭死水。”<sup>①</sup>

周总理见毛主席决心已定,当天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找余秋里谈话。周总理说:中央考虑调你到国家计委工作,任第一副主任。富春同志身体不好,今后计委的工作主要由你主持。余秋里听了以后说:国家计委是个综合部门,工作很复杂,我对全面经济情况也不熟悉,恐怕做不好这项工作。周总理说:调你去计委工作,是毛主席提的名,主席亲自点的将,你就不要推辞了。你不了解情况,可以带点人去。需要调什么人,你提一个名单,报给我。余秋里听说是毛主席定的,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当天下午开会时,毛主席又问大家:“准备叫余秋里搞计委第一副主任,你们看行吗?”周总理说:“已经同他谈了,他很谦虚,说他干不了这个工作,又没有人。我说,他可以带点人去。”毛主席说:“我看这个人行。我们现在有些人只问小事,不问大事。”<sup>②</sup>

1964年12月末,中央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初,李富春同志因病休息,由余秋里主持计委工作。

## 二、组建小计委

余秋里到国家计委工作以后,毛主席为了改进计划工作,更好地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决定由余秋里负责组成一个“计划参谋

---

<sup>①②</sup>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记录,1964年12月20日。

部”，又称“小计委”。“小计委”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原“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的日常事务。毛主席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sup>①</sup>

周总理向余秋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和他研究了“小计委”的工作。周总理提出，当前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要根据毛主席对计划工作的历次指示，起草一个《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初步设想》，二是要提出一个“小计委”组成人员的名单。“小计委”中要有懂得工业的，懂得农业的，懂得国防的，人员可以从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选。余秋里提出，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我考虑还要从国家计委选几个人。总理说：你可以先提一个名单。

余秋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写出了《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报送周总理。周总理收到文件后，于1965年1月13日、15日、16日约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等人进行讨论，边讨论边修改。<sup>②</sup>

1月19日，周总理将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报送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阅。并在附信中说：“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草案说：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繁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20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7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01页。

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sup>①</sup>

草案中提出的“计划参谋部”的名单有 12 人：余秋里（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人俊（建筑工程部部长）、林乎加（浙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朱理治（华北区计委主任）、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张有萱（国家科委副主任）、杨煜（国务院农办副主任）、贾步彬（中央办公厅工业组长）、安志文（国家计委副主任）、王耕今（国家计委委员）、马仪（国家计委机械工业局局长）、白杨（国家计委国防工业局局长）。

20 日，周总理就草案的最后一稿致信毛主席，再次要求政治局常委听一次余秋里的口头汇报。信中说：“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sup>②</sup>

1 月 23 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的口头汇报。

余秋里、谷牧坐下以后，毛主席问他们多大年龄，他们俩人同时回答：50 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以后国家的事情就靠你们了。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参谋、顾问，办事情靠你们了，……你们是小将，……也不算小将，算中將了。”

余秋里汇报了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些初步设想。在汇报时，毛主席不断插话。余秋里汇报说：编制“三五”计划时，要考虑积极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我很欣赏孙中山的那篇文章。孙中山

<sup>①</sup>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 702—703 页。

<sup>②</sup>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 703 页。

把一片邪说通通驳了，把欧洲人、日本人通通驳了。梁启超驳孙中山的文章，骂孙中山是目无孺子，欺人太甚。就是要目无孺子嘛！

余秋里说：应该鼓励干部群众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

毛主席可能是想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闹出的许多笑话，严肃地说：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

余秋里说：这两年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人心思上。

毛主席说：人心思上很好。

余秋里说：搞经济工作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庆油田是靠“两论”起家的。

毛主席问：哪“两论”？

余秋里回答：就是《实践论》、《矛盾论》。

毛主席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只有一篇是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余秋里说，要搞好经济工作，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1958年广大群众的那股干劲还是很可贵的。

毛主席说：干劲很足，浮夸不少。

余秋里汇报说：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现在的基础已经比较好。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今后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

毛主席很赞赏这个观点。他讲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情况，说：敌人那么多，武器那么好，而我们人那么少，我们一支枪只有几十发子弹，还不是打了胜仗？！现在为什么不成？！

余秋里说：“三五”计划还是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农业不能放松。

毛主席说：人要吃饭，要穿衣服，可麻烦啦！接着，他讲了大跃

进时浮夸的情况。

余秋里说：现在大家有了经验教训，不会再浮夸和瞎指挥了。

毛主席说：现在三线修铁路是不是瞎指挥，是不是有压力呀？有的压一下还是需要的。

余秋里汇报说：1965年的经济形势很好，各项计划都有可能超额完成，今年钢的产量，可以搞到1100万吨。

毛主席说：要搞质量、搞品种、搞规格。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

余秋里说：三线建设，要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

毛主席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

余秋里回答：肯定有。石油部今年准备在四川搞会战。

毛主席说：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余秋里说：找不到油，还可找到气；找不到气，还可以找到卤；找不到卤，还可以找到水。卤可以熬盐，水可以浇田。

余秋里汇报说：建设三线，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

毛主席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

毛主席还说：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

余秋里说：三线建设要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开始时要少搞一些非生产性的建筑。

毛主席说：那些东西可以不搞。郑洞国守长春时，他的房子不好吗？萧劲光在城外就没有好房子。范汉杰守锦州也住好房子，我们部队都没有好房子住。还不是没有好房子住的打垮了有好房子住的！



毛主席问：西南搞不搞汽车厂？

余秋里回答：准备建一个重型汽车厂。

毛主席说：一定要搞个汽车厂。

1月24日下午，毛主席继续听取余秋里汇报。

余秋里说：“小计委”成立以后，我们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主席的指示，我们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编制“三五”计划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毛主席说：不一定都正确，要有分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十五年，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

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58年、59年、60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

余秋里深知毛主席当时最关心的是三线建设，他说：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三线建设一定能够搞好。

毛主席说：也是两个可能，一个好，一个不好。完全同以前一样，不会的，总会好些。但困难要估计到，问题会出一些。

余秋里说：在建设中，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毛主席表示赞同。他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是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文章，有的设计经过一次、二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余秋里说：各个项目一定要成龙配套，这样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毛主席说：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是要抓个成套，譬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计委、军委、外交、公安、各口、各部也要成套。党政军民如果能成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

力、节省劳动力。

余秋里说：在工业建设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

毛主席表示赞成，并对过去不注意综合利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煤焦可以出很多东西。采掘工业也是这样，采钨的只要钨，别的统统丢掉。水利工程，管水利的只管水利，修了坝以后船也不通了，木材也不通了。

余秋里接着说：这方面确实有经验教训，某些水利工程在修建时，未照顾到航运方面的需要。

毛主席说：是啊！船也不能通，鱼也不能通，木材也不能通，那怎么办？是个大浪费。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过去综合利用规划不好的，现在要治病，治病救人也好嘛！救鱼、救船、救木材。

毛主席还说：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

在汇报结束时，毛主席表示比较满意，说：怎么样？可以。赞成他的，大体上。<sup>①</sup>

1月30日，周总理约余秋里等谈话，进一步研究国家计委和“小计委”的工作。周总理指出，毛主席在听取秋里同志汇报时，对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作了重要指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现在即可着手编制“三五”计划。具体如何做？可由秋里同志约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一个具体意见。关于“小计委”的组成人员，最后商定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组成，并从国家计委选调几位局长和一些工作人员，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

1月30日晚，余秋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召集谷牧、李人俊、

---

<sup>①</sup> 余秋里向毛主席汇报的记录，1965年1月23日、24日。

贾庭三等开会，研究如何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问题。经过研究，初步商定了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步骤。

1月31日，余秋里给周总理写报告，谈了编制“三五”计划的初步安排。他说：编制“三五”计划“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把主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要做到计划既有雄心壮志，又要有科学依据。”为此，准备采取三个步骤：一是与中央有关部门议论；二是与六个大区及有关省市讨论、修改；三是在以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平衡，拟定出初步方案。

周总理完全赞同余秋里报告中所提出的安排，2月1日批示：“拟予同意，送请主席批示可否，再复秋里，并报常委、书记处。”<sup>①</sup>

毛主席接到报告后，批示：“同意，照此办理。”当天将报告退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又在文件上批了几句话：“余秋里同志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初步议定的报告。此件主席已阅，并批同意照此办理。请中机印送常委、书记处各同志，谢富治、陈伯达、余秋里、谷牧、李人俊、贾庭三、林乎加七同志。”<sup>②</sup>

### 三、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

“小计委”接着中央批准的工作安排，从2月6日开始，以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把经济部门的同志请来，请他们谈现在的经济基础，今后发展的设想，第三个五年的生产指标，建设项目和需要的投资。一个部一个部地谈，谈完一个部再谈下一个部。余秋里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问，对一些数据抠得很细，比如炼一吨铁需要多少矿石，炼一吨钢需要多少焦炭，发一度电需要多少煤，等等。通

<sup>①</sup>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705页。

<sup>②</sup> 杨明伟：《周恩来与难产的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人物》1998年第10期，第110页。

过座谈,不仅熟悉了情况,而且学到了很多经济方面的知识。

每天晚上,余秋里把“小计委”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对白天讨论的情况进行总结,通过深入的讨论研究,归纳出带规律性的问题和认识,以指导第二天的讨论。

为了便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了解编制“三五”计划的情况,“小计委”采取了下毛毛雨的方法,谈完一个部,就写一期简报,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主席对小计委在编制计划过程中报送中央的简报,都一一审阅。”<sup>①</sup>

在各部汇报以后,周总理于5月18日、19日,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周总理指示,要在各部汇报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平衡,编制一个“三五”计划的轮廓和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提纲。

5月27日,余秋里向周总理汇报了关于长期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5月31日,又在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了汇报。会议决定,由“小计委”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主席汇报一次。

6月16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小计委”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周总理、彭真、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小计委”参加汇报的有余秋里、李入俊、林乎加、贾庭三。

会议开始时,毛主席说:昨天晚上,你们的文件我通通看了:计划问题,三线建设问题,国际斗争问题。

毛主席问余秋里:已经有了文件,还要谈吗?

余秋里回答: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向主席请示汇报。

余秋里汇报说:长期规划的奋斗目标就是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在十五年内建立一个

---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07页。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三个五年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关键时期。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我们认为,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要大力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重点是抓粮、棉、猪、油、盐,争取三年左右做到粮食进出口平衡。

毛主席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得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会搞得好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周总理说:我们几个人去看了一下,就是大寨,也还大有潜力。

余秋里汇报说:“三五”期间,要立足于打仗,争取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首先是国防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和同国防工业有关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和小三线建设)。过去编计划,安排投资的次序是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这次编制计划的次序是国防、吃穿用、基础工业,我们把它倒过来了。在议论中,有一种说法,这样安排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毛主席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怎么成?是倒过来了。违反一下,农业还搞得好些。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那三年搞瞎指挥,现在搞大寨。

毛主席接着说: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过去农业方面花了些冤枉钱。

余秋里说:主席讲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现在有一种议论,说国防工业这个拳头是“戴钢盔”的,是硬的,农业这个拳头是软的,这样会不会挤了农业?

毛主席说:你们没有答复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要答复。

余秋里回答:我们理解主席讲的方针是管长期的,在一定时期

要具体化,要有所侧重。

毛主席对余秋里的回答比较满意,说:对嘛!

余秋里汇报说:在讨论“三五”计划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基础工业这个“屁股”坐得还不够稳。我们设想,加快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建设,把屁股坐稳,做到既支援农业和国防,又能为第四个五年更大的发展做好准备。

毛主席说:基础工业,有一、二、三线之分,在一、二线也有,工厂可以搬,矿山就搬不走。

余秋里说:加快三线建设,是中央既定的方针,也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无论如何要把三线的主要项目搞起来。三线的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线应当为三线建设出人、出钱、出技术、出材料、出设备。

毛主席说: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起来,一个是搞不起来。搞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打日本,打蒋介石,抗美援朝,我们不是也打胜了吗?

余秋里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总投资 1080 亿元。

毛主席说:我看,1080 亿元的规模大了,五年搞那么多,刮老百姓那么多,太多了不好。(有的同志插话:1080 亿元,留余地少了。)就是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小了能歼灭,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 1000 亿元,搞个 800 亿、900 亿元。

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成,一个是搞不成。搞不成,无非是时间拖长一点,不是三年半、四年,搞个六、七年,五年搞不成,十年、八年搞成。鉴于过去经验,是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小一点,慢一点,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说:第三个五年各部门提出要求的钢材、木材在供需之间存在不少差距。

毛主席说:你哪里来那么多钢材、木材?打起仗来,修正主义给

你?! 帝国主义给你?! 有些项目,搞得成就搞成,搞不成拉倒。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接着又说: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你们是被各地、各部抬起来了,你们也想多快,不要被片面多快害了你们! 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不要过分紧张。

毛主席还说:你们不是在北京作过决定,多快好省,好字当头吗? 指标何必搞得那么紧张?

余秋里汇报了“三五”期间的铁路建设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铁路干、支线合计7千到1万公里。分批修通:川黔、滇黔、成昆、川汉、北京——原平、张家口——白城子、兰青——柯柯盐池、阳平关——汉中、新喻——韶关等主要干线。

毛主席说:你又要修西南三条线,又要修(北)京原(平)线,又要修平顶山到鄂西线,又要修张家口到白城子线,铁路是否搞多了?

余秋里汇报说:三线建设基本建设投资,各部初步设想“三五”期间需要550亿元,我们初步设想安排430亿元,还是感到多了。

毛主席说:下到330亿元嘛! 不要多了。

余秋里说:这次搞长期计划,一般地都注意了总结经验,注意了正确处理多快与好省的关系、积极与可靠的关系、工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数量与质量、品种的关系,以及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批判了计划、经济工作中的形而上学。

我们认为,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恐怕要根据各行业的情况,结合起来布点。

毛主席说:这个对。

余秋里提出:“三五”期间要猛攻科学技术关,有目标、有重点地掌握六十年代的新技术,保证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快前进。

最后，余秋里汇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1970年，粮食要达到4800亿斤，钢2000万吨。

毛主席说：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到来个大灾荒，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的指标，1600万吨就行了。

毛主席又说：要留点余地 in 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这是个原则问题。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sup>①</sup>

7月22日至26日，周总理连续五个上午听取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汇报第三个五年和1966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方案。

余秋里在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重点谈了三线建设规划，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在国防工业方面，首先把常规武器中最基本的东西搞起来，同时保证尖端方面一些最急需和周期长的工程项目的建设。到1970年，主要装备的生产能力，除造船以外，三线地区占到一半左右。经过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的建设，三线地区将成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新的工业基地。在交通运输方面，重点是建设西南的三条铁路干线，贵昆线1966年通车，成昆线1969年通车，在成昆线施工高峰过后再转移力量建设川汉线（即襄渝线）。还要整治开发金沙江、嘉陵江、赣江，发展水路运输。

余秋里还汇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指标的调整情况。

---

<sup>①</sup> 余秋里向毛主席汇报的记录，1965年6月16日。



周总理指出：在安排第三个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时，总的可以按照 900 亿来考虑，要留 50 亿的机动，照 850 亿列项目，50 亿不列项目，如果能够多留些余地更好。无论是长期计划还是年度计划，都要分析项目，注意布局、规模、进展和协作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要考虑计划的执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起仗来，完不成计划，另一种是打不起仗来，就可能完成。

周总理要求余秋里、谷牧到西南、西北摸一下究竟大三线上哪些项目，于 8 月 20 日拿出修改方案，讨论 10 天后再报中央。<sup>①</sup>

8 月中旬，“小计委”的同志分赴各大区、征求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对“三五”计划的意见。随后，对“三五”计划方案作了进一步修改，上报国务院。

8 月 23 日，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经过讨论，同意了“小计委”的安排。

周总理在讲话中把毛主席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sup>②</sup>

从此，“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

9 月份，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指示，将“三五”计划的具体安排方案提交会议讨论。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国家计委向中央工作会议提交了《关于第

<sup>①</sup>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 745—746 页。

<sup>②</sup>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 751 页。

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及三个附件。汇报提纲的内容包括：(1)方针、任务；(2)基本建设；(3)农业、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4)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文化、教育、卫生事业；(6)人民生活；(7)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援助；(8)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9)15年远景的设想；(10)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三个附件是：(1)第三个五年农业、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和财政收支的设想；(2)第三个五年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设想；(3)第三个五年基本建设投资 and 新增生产能力的设想。

《汇报提纲》关于方针任务的提法是：第三个五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700亿至2750亿元，比1965年增长55%至58%，平均每年递增9%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约700亿至750亿元，比1965年增长26%至35%，平均每年递增5%至6%；工业总产值约为2000亿元，比1965年增长69%，平均每年递增11%。

1970年，农业和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指标是：粮食4400亿至4800亿斤；棉花4400万至4800万担；棉纱900万件；棉布75亿米；钢1600万吨；原煤2.8亿至2.9亿吨；发电量1100亿度；原油1850万吨；化肥1800万吨；农药36万吨；机床6.5万台；汽车8万至9万辆；拖拉机2.36万台。

上述计划安排，国家计委事先同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过充分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时，

大家都表示赞同。但也提了不少意见和要求。

国家计委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向中央写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及1966年计划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0月10日，周总理看过报告后，向毛主席提议：“约各大区书记一议，并当场定案”<sup>①</sup>。

当天下午，毛主席约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余秋里开会。他在讲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历史以后说：现在，你们又这么搞大三线，又搞小三线，好得很，我看比较主动，打起仗来比较稳当。小三线小边区，大三线大边区。

毛主席问余秋里：总理说你要找我谈，是以后谈，现在谈？

余秋里说：我想向主席汇报一下这次会议对“三五”计划的意见和要求。大家普遍要求多修一些路。铁路，除了我们在“三五”计划中安排的3600公里以外，大家提出要求再增加5400公里。我们考虑，还是先集中力量把成昆线建成，以后再搞平顶山到宜都的铁路。

毛主席说：公路好搞，铁路花钱太多。河南到四川的铁路花钱太多，暂时不搞。成昆路先集中力量搞起来，再搞川汉路。除大小三线外，我看平顶山到宜都、张家口到白城子这两条路要考虑。

毛主席又说：宜都到平顶山路要修，要列入计划。宜都有大铁矿，说有10亿吨。

余秋里说：已查明的有8亿吨。

毛主席说：8亿吨就是8个大冶。铁路修太多不行，公路还要多修一点。

余秋里说：大家对小化肥厂、小钢铁厂很积极，提了不少意见。小化肥厂安排得不少了，再多，有问题，没有材料，设备也制造不出

---

<sup>①</sup>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759页。

来。

毛主席说：大家提出“五小”，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是靠养猪、养羊，搞绿肥。这样，肥料就多了，是有机肥料。湖北搞苔子，很有作用。东北可以搞紫穗槐。养猪、养羊、沤绿肥，每省、每县、每社，都可以搞。当然，不是不要化肥，大家讨论大打、早打，打起仗来上哪搞化肥。

毛主席又说：我看还是多养猪、养羊，又有肉吃，又有皮毛。化肥没有肉，又没有皮毛。

余秋里说：小钢铁厂，各地提了45个。为了战备和支援农业，可以根据资源条件有步骤地逐步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赞成各省搞点小钢铁厂。

毛主席说：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各省除了有大钢铁厂的四川、山西以外都搞。

毛主席又说：一个省没有点钢，总有点不放心。今年不行，明年、后年各个省搞个几万吨的小钢铁厂，最好一个省搞一个，小三线没有钢不行。有大钢铁厂的地方就不要搞。

余秋里说：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大家都希望1966年的计划要定下来，长期计划最好也基本定下来。

毛主席说：66年计划可以定下来，今年基本建设150亿元，明年155.7亿元，只比今年增加几个亿，怕什么？不会搞乱。大体定下来也可以。

有的同志说：“三五”计划，投资规模按850亿元也可以定下来。

毛主席说：这个计划不那么凶，不那么冒嘛！是稳当的嘛！大家开过会，议过了，定下来可以，有个章程。<sup>①</sup>

<sup>①</sup> 余秋里向毛主席汇报的记录，1965年12月10日。

余秋里看毛主席点了头，很高兴地说：年度计划定下来，长期计划大体定下来。

毛主席又问：他们（指参加会议的大区负责同志）赞成吗？

参加会议的同志说：都赞成。

这样，第三个五年计划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 四、“三五”计划的执行受到严重的干扰破坏

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一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4%。大大超过了编制“三五”计划时的预计。1966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高涨，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市场繁荣，财政收大于支，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春，余秋里随邓小平总书记去西南、西北视察三线建设。3月，在甘肃兰州，余秋里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线建设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他说：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三线建设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可以大大提前实现。

就三线建设来说：成昆铁路，1968年可以通车，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大小三线的其他重大项目，也可以提前一年或者两年建成。

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钢，今年预计生产1450万吨，明年肯定能超过原计划1970年生产1600万吨的指标。

棉纱，今年预计生产810万件，原计划1970年生产900万件，明年就可能完成计划。

石油，今年预计生产1400万吨，原计划1970年生产1850万吨，明年就可以接近完成计划。

煤炭,今年预计生产 2.5 亿吨,原计划 1970 年生产 2.8 到 2.9 亿吨,1968 年可能完成计划。

电,今年预计发 800 亿度左右,原计划 1970 年发 1100 亿度,1968 年可能达到 1000 亿度以上。

化肥,今年预计生产 1200 万吨左右,原计划 1970 年生产 1800 万吨,1968 年可能完成计划。

余秋里提出,为了适应生产快速增长的形势,我们准备搞一个“三五”计划的补充计划。当前,钢铁上不去,其他也很难上去。钢铁工业发展得快慢,不仅关系到备战,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们设想,“三五”期间每年增加 200 万吨钢,1970 年达到 2200 万吨,比原计划的 1600 万吨增加 600 万吨。其他工业产品计划指标亦作相应调整。为了实现这个补充计划,第三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约需增加 150 亿元。

邓小平同志听了余秋里的汇报,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有干劲的计划,不是个没有干劲的计划。”<sup>①</sup>4 月中旬,在北京,余秋里又向周总理汇报了制订“三五”计划补充计划的设想,得到了总理的肯定和支持。

正当国家计委准备编制“三五”计划的补充计划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严重打乱了生产、流通、分配秩序,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三五”计划没有提交人代会批准。但是,在“三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计划的要求进行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度计划无法下达时,“三五”计划确定的任务和目标,曾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

在社会动乱的形势下,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余秋里积极协助

---

<sup>①</sup> 余秋里向邓小平同志汇报的记录,1966 年 3 月。

国务院领导同志，按照“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组织生产建设。他全力支持国家计委值班室的同志进行生产调度，鼓励他们胆子大一些，态度坚决一些，在困难面前，一定要挺起腰杆。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就亲自给地方负责人打电话，协调各方面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冲击和破坏。由于周总理紧紧地掌握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业务班子的领导实权，并且保护了中央各部委一批领导干部，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的岗位上坚持生产建设工作；广大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迫切希望把生产建设搞上去，忍辱负重，努力工作，再加上“三五”计划的主要指标留有比较大的余地，到1970年，“三五”计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大都完成了。

“三五”计划安排的三线建设和其他重点建设项目，也大部分完成了计划，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三线地区初步建起了军事工业基地、钢铁工业基地、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燃料、动力工业基地、机械工业基地、化学工业基地。建成了成昆线、贵昆线、焦枝线、阳平关到汉中等主要干线铁路。“三五”期间，我国国防建设也取得了重要成就，1967年6月16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总的来说，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适应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对生产力布局做了全面的调整，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比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出了加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措施。1965年11月13日，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1966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屡次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更落实一些，更实际一点。同时，也把过

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sup>①</sup>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也有一些经验教训,主要是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导致在三线建设的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另外,林彪提出,军事企业的建设要“山、散、洞”,极力主张重要的军事企业不仅越分散越好,而且要进山洞,造成了不少的损失和浪费。

---

<sup>①</sup>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763页。



# 关于“文革”中北京的“天派”和“地派”

卜 伟 华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有始终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天派”和“地派”。这两大派组织基本上包括了北京高校中所有最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全国各部门、各地区也有较大的影响。要研究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就不能不对北京的“天派”和“地派”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 一、“夺权”引发造反派内部诸多矛盾

1967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运动。毛泽东大力倡导这种“全面夺权”，把它作为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在“全面夺权”造成的大动乱中，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揪斗迫害，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纪国法被弃置不顾，国家的司法公安机关无法行使职权。在夺权者同倾向于支持原来的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在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北京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纷纷卷入了这场“全面夺权”。在“夺权”这场闹剧中，各种组织和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竞相表

演,同时也将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的种种矛盾暴露无遗。有不少单位出现了多个造反派组织争相“夺权”,打的不亦乐乎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已经显露出日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裂的端倪。

1月中旬,北大“红旗兵团”、清华“井冈山”<sup>①</sup>、北航“红旗”<sup>②</sup>、师大“井冈山”<sup>③</sup>等许多组织到北京日报社串连,酝酿夺权。1月18日,师大“井冈山”支持北京日报社“星火燎原”等组织宣布夺了报社的权,成立了“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并于1月21日发表《夺权宣言》,引起其他30多个组织的不满。1月19日,以北航“红旗”驻北京日报联络站为首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创立新北京日报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调集千余人,对北京日报社进行“二次夺权”,并发出通告,宣布北京日报社的“一切大权归联委会”。这又引起了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反对。1月22日晚至23日晨,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时,师大“井冈山”代表就明确提出:现在我们内部问题很大,在《北京日报》问题上,我们和北航红旗是有严重分歧的,我们认为《北京日报》新一期第三版是“大毒草”。1月23日,地质“东方红”<sup>④</sup>驻北京日报新联络站发表声明称:一、联委会是虚假的大联合,原地质驻北京日报联络站不能代表地质东方红,声明退出此联合委员会,并勒令其立即

---

① 清华“井冈山”,全称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6年12月19日,由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联合组成,主要领导人为蒯大富。

② 北航“红旗”,全称为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1966年8月20日成立。因在1966年8月25日至9月23日到国防科委造反、静坐示威,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出名,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

③ 师大“井冈山”,全称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1966年12月26日,由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等多个组织联合组成,主要领导人为谭厚兰。

④ 地质“东方红”,全称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6年8月17日,由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等组织联合组成。因在1966年8月至10月4次到地质部造反,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出名,主要领导人为王大宾。

解散。二、目前北京日报实权已被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少数人操纵，新生的北京日报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新生的北京日报必须停刊，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1月29日，财金“八八战斗队”也声明退出联委会，并要求联委会立即解散。两派争执不休，直到3月12日，北京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

1月19日，教育部“北京公社”在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的支持下夺了教育部的权。20日，教育部“延安公社”在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支持下又搞了反夺权。2月1日夜至2日凌晨，两派在教育部发生武斗，数百人受伤。

1月30日，北京矿业学院（简称矿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组织与北京石景山区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公安分局造反，要接管分局，与早就参与公检法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发生冲突，“政法公社”与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动了100多名警察，抓了100多名矿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的造反派。

1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几次鼓动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夺北京市的权。1月24日，陈伯达接见北大、北航等校造反派，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我建议，工农兵学商开一个临时政协会议，再筹备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1月26日，陈伯达、江青在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时，陈伯达又提出：“跟同志商量一下，搞一个工农代表大会……你们看条件成熟不成熟？”早就跃跃欲试的高校造反派齐声高喊：“成熟！”他们早就想动手在北京市“夺权”了，但谁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而且一直也未得到中央关于北京市“夺权”的具体指示。其实在1月18日晚上，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兵团”等组织与30多个单位的工厂、学校的造反派曾到北京市委“夺权”，占领了市委大楼，并宣布夺了市委的大权。但这

一“夺权”事后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承认。江青在那次接见时的讲话中说：“大联合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是为夺权而联合……我说还是在三个司令部的左派队伍基础上联合，不要让别人以为三个司令部不起作用了。”江青所说的“三个司令部”指的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于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成立于1966年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成立于1966年9月6日。三个司令部中最受中央文革小组重视与支持的是“三司”。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和支持下，师大“井冈山”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红卫兵联队”等组织在民族文化宫开会，策划北京市的“夺权”事宜。会后，以师大“井冈山”和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总指挥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由地质“东方红”的朱成昭主持，在政法学院召开了造反派组织头头会议，商讨成立“北京工农兵联合夺权指挥部”，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也参加了会议<sup>①</sup>。

1月25日，“三司”发出关于迅速成立“工农兵联络站”的倡议，发表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告北京市革命造反派书》。1月27日，由北京第一机床厂“红色造反联络站”、北京第二机床厂“革命造反总部”、石景山发电厂“毛泽东思想东方红兵团”、北大“北京公社”、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30多个组织发起，包括北京市大中学校、工矿企业共200多个单位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并发出紧急倡议，提出：“迅速召

---

<sup>①</sup> 据谭厚兰1971年所写的一份材料。

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分歧，各造反派之间矛盾重重。2月6日，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简称农机）“东方红”、北京林学院（简称林院）“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师院）“革造”等一些组织宣布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自己另行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夺权”联合组织——“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当时北京全市性的“夺权”组织很多，其中最大的组织除“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和“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外，还有北航“红旗”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另外还有“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首都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农兵联络站”、“首都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总部”。有许多造反派组织是同时参加了几个全市性的“夺权”联合组织。

作为首都重地，北京市的“夺权”如何搞，将对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对此似早有考虑。他没有让在造反派中呼声很高的戚本禹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而是点名叫谢富治、傅崇碧<sup>①</sup>主持筹备北京市的“夺权”。2月1日，戚本禹在与北京高校造反派谈话时说：“现在要成立北京人民公社，这是毛主席提到的，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北京公社<sup>②</sup>的宣言，筹备工作由谢副总理和傅崇碧同志来管”。

2月中旬，根据谢富治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要按系统进行联合，然后再搞“夺权”。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律从

---

<sup>①</sup> 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sup>②</sup> 毛泽东曾认为，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新的政权采用巴黎公社的形式。但不久后，毛泽东重新作了考虑。2月12日，他对张春桥、姚文元说，建立北京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就发生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他主张还是不要改名字，不要叫公社。他认为，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现在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等全市性夺权组织中撤出来，成立“首都革命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处”。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北京市要先分别召开大专院校、中等学校红卫兵的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然后再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在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参加“夺权”的过程中，把毛泽东当年的名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sup>①</sup>作为口头禅。尽管1967年1、2月的大规模“夺权”后来绝大多数并未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承认；但初次尝到了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新鲜感和满足感，造反派们兴奋不已。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存在的一些缺点和局限性也充分暴露出来，在“夺权”中，竞相争夺，派别林立，派同伐异，派仗不休，武斗升级，都想“以我为核心”。在派性斗争中，互相攻击，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把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当儿戏。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纪律废弛，目无法纪，完全以一己或一派的利益高于一切。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也不断发展。

起初，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多是从运动初期的造反和保守的矛盾转化而来，同时也存在着各组织之间在名誉、地位等问题上的纠纷。“夺权”进一步引发了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分歧，这些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和激化。不但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在造反派内部，各种矛盾和斗争也不断出现。

从1967年1月下旬“三司”连续发出的几份通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在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各种各样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1月21

---

<sup>①</sup>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载于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第四号。

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一号通告称：“自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来，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井冈山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本司令部决定将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开除出我司令部。”<sup>①</sup> 1月23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二号通告称：“北外<sup>②</sup>六一六红卫兵在元月五日写了一篇《周恩来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1月17日又去捣毁周总理即将去参观的红旗大队的展览会等等。……决定开除北外六一六红卫兵。”1月23日，“三司”发出总字第三号通告称：“我司令部所谓‘文艺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干了许多坏事……现开除刘利吉、艾国成、陈志国出司令部。”1月24日，“三司”发出第四号通告称：“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兵团负责人刘富元、顾家桂……于（1966年）10月下旬公然抢了三司的大印，长期不予归还，最近又炮打周总理、康生同志等。我们相信政法兵团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因此责成政法兵团开除刘富元、顾家桂，彻底整顿革命组织。”这时候的造反派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了，它的分化和分裂已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了。

## 二、造反派红卫兵的分裂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形式上将全北京市的红卫兵运动统一起来了。3月8日，“红代会”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红代会成立之日起，一司、二司、三司都已经光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再存在了。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再以三个司令部的名义进行活动，三个司令部的一

---

<sup>①</sup> 这个通告是在江青对北大“井冈山”明确表态后作出的。

<sup>②</sup> 即北京外国语学院。

切公章一律宣布无效。”<sup>①</sup>但实际上,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红代会”刚成立时的统一假象很快就被新的更为激烈的冲突局面所打破。

1967年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爆发了一场北京当时规模最大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场,数百人受伤,被称为“民族宫事件”。

事情也是从“夺权”引起的。1967年1月,民族文化宫参加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东方红”夺了民族文化宫的权,对立面“二七兵团”对自己被排斥在外,一直耿耿于怀。4月4日,“二七兵团”联合“新北大公社”<sup>②</sup>“红一团”、北京石油学院(简称北石)“大庆公社”、北外“红旗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简称人大“三红”)等19个单位成立了“批展联委会”<sup>③</sup>,并于4月5日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大会遭到民族宫“东方红”的强烈抵制,大会横幅被剪掉,麦克风被抢走。”4月8日,民族宫“东方红”联合地质“东方红”、中央民族学院(简称民院)“东方红”等数百人将“二七兵团”和“新北大公社红一团”、民院“抗大”等强行驱出民族宫。接着,双方都向民族宫调人增援。支持民族宫“东方红”的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教育部“延安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农机“红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来了约3000人,支持民族宫“二七兵团”的民院“抗大”、北石“大庆公社”等也来了1000多人。双方混战一场,数百人受轻伤,十余人受重伤。地质“东

---

① 此后,“一司”、“二司”再未见有任何动作,而“三司”后来又有表现,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司”最晚的文件是在1967年8月17日的一份“公告”。

② “新北大公社”,全称为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1967年2月15日,由北大“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组织联合组成,主要领导人为聂元梓。

③ 即批判原来在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民族工作展览”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



方红”和师大“井冈山”这一边人多势众，武斗中占据优势。据4月11日的地质《东方红》报称：“四月八号，我东方红战士与民族文化宫东方红、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等单位的亲密战友在民族文化宫共同战斗，狠狠地痛击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衅，争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胜利。”

当天下午，由“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和副组长蒯大富签发了“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两项命令”：“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准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尽管这两项命令冠有“经戚本禹同志同意”的字样，但还是没有什么权威性，况且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斗事件的参与者。地质“东方红”当即发表“严正声明”：“一、红代会委员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点，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责。”

至4月8日深夜，武斗尚未平息，事态继续扩大，民族宫警卫排的解放军战士向武斗双方宣读军委《八条命令》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款，学生们则回以“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凌晨2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的秘书为代表，和吴德、聂元梓到民族宫召集双方开会，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双方“马上撤出民族宫、民委”。4月9日上午，双方陆续撤离民族宫。“民族宫事

件”将北京高校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了,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

4月11日下午,地质“东方红”、北京邮电学院(简称北邮)“东方红”、北京工业大学(简称工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简称农大)“东方红”等派出6辆广播车,开进北大校园。地质“东方红”等指责民院“抗大”在“民族宫事件”中从展览会抢走部分材料,后转给了“新北大公社”,他们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这些材料,并要求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进行辩论。双方在北大校园内发生冲突。当天夜里,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等又派出数千人涌进北大校园,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夜里1点,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闻讯后,打电话传达三点指示,要求双方停止武斗,脱离接触,但未能奏效。12日凌晨,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数千人在北大校园里斗争了北大两名学生,后又将两人抓到地质学院。“新北大公社”以当天要在北大校园里开斗争王光英的大会为由,将所有外校人员驱逐出校,这期间,又发生一些冲突。下午,双方再次发生武斗。

4月12日晚,北京大学校文革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大会上说:(今天)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所谓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对待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

人大“三红”、民院“红卫兵总部”和“抗大公社”、矿院“东方红反到底兵团”、北京医学院(简称北医)“八一八”、北京体育学院(简称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和“追穷寇第四野战军”、中央统战部“11·4红旗战斗队”、中央民委“工农兵革命造反大军”、高教出版社“鲁迅战斗队”和“前进战斗队”,中央民族歌舞团“32111造反战斗组”、民族宫“二七兵团”等单位,以及天

津、郑州、洛阳等地来京的一些群众组织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行动”。

同时，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发表了支持地质“东方红”的声明，如林院“东方红”在4月12日发表的“严正声明”中说，“我东方红公社坚决支持地质东方红等兄弟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混蛋在4月11号晚公开分裂红代会，挑起大规模武斗，打伤许多我东方红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邮电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并砸坏许多广播车，新北大公社总部一小撮坏蛋罪责难逃，绝没有好下场。”地质“东方红”还和工大“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农大“东方红”等15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战友的公开信”，题为《愤怒控诉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划的法西斯暴行——记四·一一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4月14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关于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批判“新北大公社”，公开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诸于世。《严正声明》中说：“最近在新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股反对谢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击兄弟组织的歪风”。北大这边寸步不让，当天就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发出针锋相对的《严正声明》，说：以“红代会”名义发出的声明“是在没有得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校驻红代会代表聂元梓同志最后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这个所谓‘严正声明’对我校完全没有约束力。”“新北大公社”称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声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并为此向对方提出“最强烈抗议”。

4月14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代会”代表。江青在讲话中首先批评北大有人给谢富治贴大字报是错误的，要求北大将给谢富治贴的大字报覆盖掉，同时肯定了北大斗王光英是对的。江青也批评了地质“东方红”等组织，说他们开广播车到北大去是不对的。江青要求两派不要把这件事登在小报上，防止“出现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从4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红卫兵中的矛盾逐步表面化、尖锐化，其间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武斗。4月3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与“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会”发生武斗。4月4日，北石院内“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胜利公社”发生武斗。4月10日，北石“大庆公社”与“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4月11日，北京铁道学院“红旗”与“革联”，因争用礼堂引起武斗。4月12日，中央财经学院内发生了“文革”以来第一次武斗，该院“八八战斗队”一分为二，一方开会，另一方去冲，造成武斗，打伤十余人，有一人脑震荡。4月13日，北京第二医学院发生武斗，据统计被打伤较重的有29人。同日，北京化纤学院“红旗”等组织与“燎原井冈山”、“东方红”等发生武斗。4月19日，北外“红旗大队”与“红旗造反团”发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双方的分野也逐渐明确。1967年8月25日，地质《东方红》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4月上旬民族宫事件的爆发，终于使得原来各个局部性的摩擦，汇集转化为全面性的冲突。对这场冲突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在当时北京各个群众组织，不约而同地以出人意外的速度纷纷表态，各自选择自己的队列。”事实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种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大多都显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四·一一”武斗中，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红”、北外“红旗大队”、北石“大庆公社”、民院“抗大公社”、政法学

院“政法兵团”、化工学院“按 16 条革命造反派”、北邮“古田造反团”、工商专科学校“卫东彪兵团”、“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林院“鲁迅公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矿院“东方红”、中央美术学院“红旗兵团”、语言学院“红旗”、中国医科大学“向阳”、“从头越战斗队”等组织；倾向地质“东方红”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北石“北京公社”、民院“东方红”、北邮“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工商专科学校“革联”、林院“东方红”、矿院“北京红卫兵”、工大“东方红”、语言学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东方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简称建工）“八一红卫兵总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财金“八八战斗队”、经济学院“红旗公社”、北京钢铁学院（简称钢院）“革造”、轻工“七二九兵团”、机械学院“红旗”、北医“长征红卫兵”、“燎原公社”等。在倾向地质“东方红”的阵营中，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组织。双方阵容以后还不断有些变动，但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

最初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1967 年 4 月 12 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发表的关于北大、地质武斗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话，只说：“我们坚决拥护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对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应从革命大局出发，在红代会的主持下解决”。在北大发生武斗时，清华、北航都派人去凑热闹，并发生了人员在北大被打、被扣，宣传车被砸的情况。4 月 14 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时，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状。但在后来的许多重大活动和事件中，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都是站在了

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场上。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为首的所谓“天派”和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所谓“地派”两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

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逐渐形成两大派的同时，各个高校内部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分裂，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4月14日，清华“井冈山”中一部分人分裂出来，成立了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从此，清华园内开始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从文斗到武斗，从小打到大打，一直打到1968年7月27日工人宣传队进清华。

北大校园中始终存在着反对聂元梓、反对北大校“文革”的力量；起初是所谓“井、红、飘、0、团”五大组织<sup>①</sup>，后来五大组织于1967年8月17日联合组成为与“新北大公社”相对抗的“井冈山兵团”。

在北京的60所高校中，绝大多数都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有些学校是在两大对立的组织之外还存在一些小组织，但这些小组织基本上也是分别倾向或依附于两大对立组织的。有少数学校情况比较特殊，如北航、体院、矿院、农大、地质、师大、北邮等，虽然也有反对派的存在，但力量对比悬殊，在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一派的天下。

### 三、“天派”和“地派”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形成

“天派”和“地派”始终是对立的，其在政治倾向上、具体做法上

---

<sup>①</sup> 即“井冈山”、“红联军”、“红旗飘”、“0363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造反团”。

有许多差别,但总的来说,它们都还是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活动。从维护各自的派别利益出发,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各不相让,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屡屡酿成大规模的武斗,有的学校的武斗甚至动用了枪炮。

“天派”和“地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是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在各地的群众派别组织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南京的“八二七”和“红总”;重庆的“八一五”和“反到底”;成都的“八二六”和“红成”;安徽的“P派”和“G派”;武汉的“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河南的“二七公社”和“河造总”;云南的“八二三”和“炮兵团”;广西的“联指”和“四二二”;湖南的“湘江风雷”和“高司”等。这些派别组织一般都建立有全省或全市、全自治区的统一组织。北京的“天派”和“地派”,与其他一些有两大派对立组织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所谓“派”,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的不很紧密的联合体。

1967年4月,在“民族宫事件”和北大校园武斗事件后,北京高校的两大派初步形成,不过当时尚未使用“天派”、“地派”的名称,一般称为北大派、师大派。1967年6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中宣部的讲话中说:我不希望你们卷入到北京市最近说是将要爆炸的大内战中去,不希望你们卷入师大、北大这两派斗争中去。

5月中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十几个组织在清华开会,分析北京高校两派斗争形势。北大提出北京两大派的主要分歧在学部,焦点在学部潘梓年、吴传启两人身上。“新北大公社”于5月底,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于6月2日,先后发出关于通缉潘梓年的

“通缉令”，以后，关于学部潘、吴问题成为“天派”、“地派”的一个主要分歧点。

6月4日，“红代会”中倾向师大“井冈山”的部分组织以“红代会组织组”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关于吸收民院“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等18个组织加入“红代会”的公告，这18个组织都是倾向师大“井冈山”的，并且于当天下午在北京地质学院操场召开了庆祝大会。民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组织还示威性地到清华大学进行了游行。这些行动引起倾向北大的一批组织的不满和抗议，于是他们也以“红代会组织组”的名义发表一个“严正声明”，称对立面“盗用组织组的名义，策划了所谓吸收18个组织加入红代会的阴谋，是完全非法的，立即宣布作废！”6月5日夜至6日凌晨，陈伯达、谢富治等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会上两派吵得不可开交，把陈伯达气得大叫：“你们把我打死得了，使你们觉悟！”

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分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6月16日，谢富治、吴德<sup>①</sup>接见北京高校学生代表，吴德在讲话中说：“今天把同志们找来，商量北京市存在的问题，怎样解决大专院校的分裂状态。当前高校存在两大派，红代会也分裂了，报纸出了两个。这种现象发展下去不好，因为基本上是革命派分裂……”

7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和支持下，北京大中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大批造反派组织组成所谓“揪刘（少奇）火线”<sup>②</sup>，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出现了两个全

---

<sup>①</sup> 谢富治这时已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北京市核心小组组长。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核心小组副组长。

<sup>②</sup> 从1967年7月初开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1个月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一线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市性的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的一些群众组织于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连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作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看谁人多势众，看谁声势浩大，两大派都想借此显示自己这一派更革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得更紧。8月4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2500多个群众组织共73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的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

也就在7月底、8月初，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航“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地质“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

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地派”的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与红旗杂志社负责人林杰关系密切，林杰这次跟随王、关垮台。9月1日，“天派”的北航“红旗”、北石“大庆公社”等组织在师大校园里贴出“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9月2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矿院开会，听师大“造反兵团”介绍

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和师大革委会。9月6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于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成立大会<sup>①</sup>，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9月6日，师大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9月7日早晨8点左右，“专政委员会”召开了批斗谭厚兰大会，谭厚兰的秘书等人上台对谭进行了揭发、批判。樊立跃在大会上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大约在10点左右，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40余个组织的大批人马约15000人开始陆续涌进师大校园，参加“打倒林杰，彻底摧毁516兵团誓师大会”和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庆祝大会。会上，师大“井冈山”中有几十个战斗队宣布加入“造反兵团”。当天下午形势发生逆转，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1. 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sup>②</sup>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 樊立跃

① 师大“造反兵团”于1967年2月成立，3月自动解散。这次是再次成立。

②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6月6日发布的关于制止“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

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 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sup>①</sup> 此后，师大“井冈山”和“地派”组织又发起反攻，称“造反兵团”和“天派”是“妄想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的老保”。

这时，“天派”、“地派”两大派对立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两大派的活动也比较频繁。同一派别内各组织的联系和往来更为密切，一家有事，大家帮忙，尤其是在有武斗发生的情况下。例如，1967年8月7日，民院“东方红”与“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就有不少外校人员参预其中。“抗大”损失惨重，据说被打伤者达200多人，其中重伤者56人。事后，“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等20多个“天派”组织向“抗大”发了慰问信。社会上关于“天派”、“地派”的各种传言满天飞，有的说周恩来和陈伯达是支持“天派”的，也有的说康生是“地派”的后台。9月16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了北京高校“天派”的代表，17日，又接见了“地派”的代表。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周恩来还批评他们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对干部搞体罚等错误做法，指出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要联合，北京两派的派性观点应该批判。他说：“‘天派’要掉下地来，‘地派’要从地下冒出来，不要‘天派’、‘地派’的。”

1968年初，北京市革委会为了解决北京高校派性严重、武斗蔓延的问题，决定分期分批开办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第一期学习班原定20所院校各派组织头头200多人参加，后增加为36所院校包括干部和群众共1400多人参加。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高校造反派红

---

<sup>①</sup> 北师大“九·七”事件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参与此事的一些人受到关押迫害。1979年8月，北京市革委会发出为北京师范大学“九·七”事件平反的批复。

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成为学习班的学员。

学习班开办之初，受社会上整体舆论导向的影响，在消除派性方面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那些原来两派对立情绪就不甚严重的院校。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水电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革委会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对于大多数院校来说，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是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天派”组织提出了“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揭发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师大“造反兵团”首先发难。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坚决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批评指责。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传来，师大“造反兵团”立即在学习班以及在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由于目的没有达到，师大“造反兵团”于2月22日宣布退出学习班。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得到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支持和响应。

3月13日和15日，由人大“三红”、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天派”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新北大公社”负责人聂元梓出席了串连会。两次串连会的矛头都是指向学习班的，在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

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sup>①</sup>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大队”的代表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威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

一些红卫兵组织从戚本禹的垮台，联想到与之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谢富治。于是他们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的材料，掀起“倒谢”活动。3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大标语，人大“三红”的“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继人大“三红”之后，3月5日，地质学院“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3月9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3月11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了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铺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

---

<sup>①</sup> 丁国钰时任中共北京市核心组成员、北京高校学习班临时党委副书记。

3月16日上午,师大“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sup>①</sup>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这些大字报和许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3月17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8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3月18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标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四一四”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中央文革小组对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一方面是因为谢富治始终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维护自己由于王、关、戚的相继垮台而遭到损害的形象。中央文革小组先是让谢富治在3月18日的新闻中露面,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3月19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

---

① 指被戚本禹、谢富治等人称为早在1957年就反对刘少奇的陈里宁。

3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这是反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上街头,开展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

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明确地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削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3月23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不依不饶,揪住不放,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

3月25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通过这一系列的作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1967年冬到1968年春,全国形势相对趋于缓和。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一些领导干部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这种局面使依靠造反起家的中央文革小组及一些造反派红卫兵骨干分子不满。同时,这种局面又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积郁已久的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不断增长,并公开发

露。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言论。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这种动向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警觉，于是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968年3月15日，在中央接见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时，江青在讲话中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3月18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江青又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

这些讲话传出后，各派红卫兵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为维护本派利益和搞垮对方而大肆活动。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游行队伍不断上街，到市革委会办的高校学习班、到天安门广场、到市革委会游行。他们都打着击退“二月逆流”翻案风的旗号，向对立派组织施加压力。“地派”组织在游行中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天派”组织的口号有：“坚决镇压二月逆流怪胎老保翻天！”“不许极左派翻案！”

3月23日，在游行中，北外“红旗大队”与民院“东方红”发生冲突，一番打斗之后，双方各伤二三人。3月24日，地质“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造反团”等组织2000多人到北大游行示威，高呼“砸烂反动组织新北大公社”的口号。地质“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的宣传车还开到人民大学，与人大“三红”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3月25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表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打倒聂元梓是错误的”，“学习班要做检查”。这样一来，又给激烈反对学习班的



“天派”添了一把火。3月26日,“政法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简称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3月25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稿。3月26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3月30日,李钟奇<sup>①</sup>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搞了几个月的“斗私批修”、反派性,好不容易才把形势稳定下来,终于使北京各高校一度出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尽管这个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假象。但经3月份的炮打谢富治、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的冲击,好景全部化为乌有,许多已经联合的院校都出现了反复,派性斗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学习班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并且难以继续维持。

4月10日,各大报刊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sup>②</sup>这条语录一出,无异于给原来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大火上浇了一瓢油。过去两派对骂,不过是骂对方为保皇派、极左派、“大杂烩”等等,现在都上纲为阶级斗争,都将对方骂为国民党反动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斗。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

<sup>①</sup> 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北京高校学习班临时党委书记。

<sup>②</sup>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庆祝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4月10日。

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公然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等谬论。4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一期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对这个谬论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此后,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更加猖獗起来。

4月19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就这样,北京高校学习班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结束。这一场大规模围剿派性、促进联合的努力完全失败。在此之后,北京各高校内派性斗争有增无减,越演越烈,进入了一个矛盾普遍激化,武斗之风盛行的新阶段。

在1968年春天到7月底的几个里,北京许多高校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其中以清华大学内的武斗最为激烈,死伤也最为严重;北京大学的武斗时打时停,持续的时间比清华还要长。在这一阶段,“天派”、“地派”的各个组织大多忙于自己学校内的武斗,很少有全市性的派别活动。不过,在同一派的各个组织相互之间还经常有一些粮草接济和弹药支援。据后来进驻各院校的工宣队报告,在人民大学武斗期间,“三红”曾从体院借粮4万斤、现金2200元;从北大借粮票3万斤、现金3万元;从矿院借1万斤。在工业学院武斗期间,北工大“东方红”曾支持工院“东方红”进行武斗,并支援粮食2万斤、现金1000余元、肉1000余斤。在清华大学武斗期间,北航“红旗”曾向清华“井冈山”支援了部分枪支弹药。

北京的“天派”和“地派”在其存在的1年多时间里,始终在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和较量,最后也没有分出个胜负输赢来。在他们

校内校外、文斗武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就是在派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一声令下,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了各大学校园,断然制止了大学生们的武斗,并在北京高校中开展“揪坏人”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较快地结束了长期存在的极度混乱局面。此后,很快开始进行毕业分配,大学生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陆续离开校园奔赴四面八方<sup>①</sup>,北京市的两大派斗争也就到此基本结束。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一些资料主要来源于“文革”中发行的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出版物及本人当时的一些记录)

---

<sup>①</sup> “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农村。1968年8月,北京市即有部分大学生进行了毕业分配,并要求很快到达分配地点报到,开始工作。

# 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和郭沫若

穆 欣

## 情同手足的诤友

周恩来和郭沫若是真挚的朋友，他是郭沫若的革命领路人，也是关怀备至的诤友。郭沫若对他情挚谊深，十分敬重。1978年5月27日，郭沫若在生命垂危之际写给全国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里，曾经深情缅怀周恩来，字里行间洋溢着无限倾慕和感激的情愫，倾诉着他们天长地久、终生不渝的友谊。他说：“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50多年来，周总理在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曾经给予我许多难以忘怀的指示和帮助。我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剧本，差不多都得到过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他在日理万机之中挤时间读剧本，看演出、提意见，使我深受感动和激励。”这是郭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仅仅过了15天，即6月12日，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们两人长久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26年在广州相识时。这年3月，郭沫若从上海到达广州，经过李一氓、阳翰笙认识了周恩来。他们在那里共同度过一段革命岁月，结成了深厚的战斗的革命友谊。从那时直到周恩来于1976年逝世，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郭沫若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每到关键时刻，他的去向都由周恩来代表党组织作出安排。1926年3

月郭沫若到广州不久，便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周恩来是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在行军作战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部队失利，郭沫若经汕头、香港到达上海后，由周恩来安排前去日本。经中共中央决定，保留党籍，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举家东渡。抗日军兴，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国后，就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展开工作。郭沫若回到上海，党籍就恢复了，但根据党的指示，他以无党派人士面目展开了公开的抗日民主的革命活动，去带动当时广大的民主人士向中共靠拢。他当时是特别党员，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负责人直线领导。郭沫若有时自己不满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身分的寂寞，向周恩来要求“以公开党员的身分进行痛痛快快的的工作”，周恩来总是以老战友的情谊，慰勉他还是以非党人士的身分忍受内心的“寂寞”。“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内部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sup>①</sup>郭老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对社会宣布重新入党，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他的党龄一直从1927年算到1978年逝世为止，一共51年）。

周恩来和郭沫若不寻常的友谊和各个时期的交往，在郭沫若的许多著作中有所反映。在他所写的自传、日记、散文和回忆录的许多地方记述了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周恩来由衷的景仰之情。如在记述1938年从武汉撤退经历的《洪波曲》中，写道：

“周公的计划很周到，指示非常细密，我这里只能记得一个梗

---

<sup>①</sup> 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概。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浑混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觉。

“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sup>①</sup>

在记述 1946 年国共谈判经历的《南京印象》中,写道:

“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他曾经叹息过,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无益的谈判’里继续不断地消耗了。谈判也不一定真是‘无益’,他所参预的谈判每每是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比较起来,成就究竟是显得那么微末。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的悲哀,这样一位才干出类的人才,却没有更积极性的建设工作给他做。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sup>②</sup>

这年 11 月 15 日,由国民党一手把持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开

① 《沫若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06—207 页。

② 《沫若文集》第九卷,第 517—518 页。

幕。和平谈判的大门最后由国民党关上。周恩来于 11 月 19 日率领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

郭沫若赋诗一首赠周恩来壮行：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迢。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在不同时期，周恩来也曾许多场合谈起郭沫若，代表党中央对郭沫若的贡献做出评价。

1941 年 11 月 16 日，是郭沫若 50 岁生日和从事创作生活 25 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全国范围内为郭沫若祝寿。10 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来到重庆天官府街郭沫若家里，把这一决定告诉他的时候，郭沫若很自谦地说：“我没有什么重大贡献，不必了吧！”周恩来说：“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在周恩来指导下，11 月 16 日在重庆举行了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盛大的庆祝茶会。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并勉励大家向他学习：“在反对旧礼教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也有着他这一支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运动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

同一天，《新华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了周恩来亲自撰写的祝贺郭老生日的代论《我要说的话》。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前半生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评价，并把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

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进而将郭沫若的革命精神概括为三大特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号召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同时“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自1941年至1943年间，郭沫若在重庆接连写了6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些剧作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古喻今，起到了批判蒋介石法西斯暴政的社会效果，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屈原》。

《屈原》是郭沫若在1942年初写的。自庆贺郭沫若50寿辰期间《棠棣之花》演出成功后，许多朋友建议他写屈原的戏，引起了他的强烈创作欲望。周恩来得知后也登门鼓励他写这部戏。周恩来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

郭沫若经过3个星期构思，从1942年1月2日到11日夜半，仅用10天时间完成了《屈原》剧本。从4月3日，《屈原》在重庆市中心区最大的剧场国泰大戏院上演，连演17天21场，场场客满。《屈原》被认为是好比投向反动营垒的一枚重磅炸弹，又是向艰苦抗战中的大后方人民发出的进一步战斗的动员令，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和极端仇视，他们动员一切舆论工具，对这出戏大张挞伐，进行围剿。这个时候，周恩来挺身而出，认真阅读剧本，组织专家座谈，给《屈原》以充分的肯定评价。他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



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同时他还对被攻击最多的《雷电颂》以肯定的评价。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屈原》演出成功而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周恩来对这次斗争作了总结。他高兴地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1962年11月又到郭沫若70寿辰。因11月郭老要外出,10月周恩来对他说:下个月是你70大寿,那你就不能在北京过啦,这样吧,在你离京之前我们就提前给你过吧。郭老又是谦辞,经过总理劝说,他说:那好吧,我来请客。10月10日前后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聚会,当时除毛主席外,在京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基本上都参加了。郭老和夫人于立群都特别感动和兴奋,对总理如此周到的安排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 “天不能死地难埋”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整个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在这场浩劫中,知识界首当其冲。郭沫若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眼看一群凶狠的虎狼陷害忠良,使科学界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祸从天降,无端遭到残暴的凌辱迫害,自己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不免痛楚彻骨,寝食难安。特别是对田汉、翦伯赞的严酷批判(两人在“文革”中都被迫害致死),使他震惊,也感到愤懑。

1966年1月27日,正当这场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入政治

性挞伐，错误的批判汹涌展开的时候，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信，提出“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的要求。他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

这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即席发言否定自己的全部著作，提出要把自己所有著作烧掉。他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接着，他进行了检讨。他说：“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切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他在发言结尾，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又说：“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郭沫若发表这篇演说这天，我正好离开北京前去上海。我是在上海一个会上，听到康生谈起郭老这篇发言的。康生和郭沫若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在上海谈到这篇发言的时候，就说先

由《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其时康生和陈伯达刚在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回到上海。估计毛泽东先已看过这篇发言,决定发表此文未必全是康生的主意。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这篇发言,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事后得知:这篇发言正是由康生送经毛泽东批示发表的)。

虽然郭沫若的“辞呈”谁也不会“照准”,他的著作人们也都不肯烧掉,但是郭沫若的担心并非“杞忧”。冲击、打倒郭沫若原是江青和康生、陈伯达蓄意已久的阴谋。他们并不只是要打倒一个郭沫若。他们是将郭沫若和周恩来绑在一起鞭笞的。

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报》,经常为这家报纸撰写文章。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论文,都是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常有向他请教的机会。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除在大会场合以外,就难见到他。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大约由于经常感到精神压力,饱受惊恐折磨,这时他特显苍老疲惫。

“文革”时期,江青一伙多次对他发难,肆意迫害,主要是依靠周恩来鼎力保护,郭沫若在这场风暴中才得以保全。

从“文革”一开始,为了使一大批党、政、军的老干部和著名人士免遭劫难,周恩来不顾自己处境的极端险恶,殚精竭虑地保护了许多人。1966年8月29日夜,一股红卫兵抄查章士钊的住宅。第二天早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求援。毛泽东在此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那些肇事者,责令立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物,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士钊的住宅。他在当天就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列举的12位知名人士,第2名就是郭沫若(第1名是宋庆龄)。毛泽东批准了这份名单,郭沫若

终未受到被红卫兵揪斗的厄运。

当时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动乱，社会上无政府思潮泛滥，造反派打、砸、抢、抓的暴行时有发生。到了1966年冬天，已经“天下大乱”。周恩来关心郭沫若的安全，派童小鹏前去看望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并且转达他的意见，请他们暂时离开家到外面去住；还叮嘱这件事不要告诉机关，只带秘书和司机，以防泄密。郭沫若偕夫人在位于万寿路的六所住了一个月，形势缓和下来后才回到家里。

转过年来，周恩来常请郭沫若陪同会见外宾，他们几乎每周要见一两次面，郭老参与外事活动的消息和照片经常见报。实际上，这也使得郭老免受冲击。有人统计，整个“文革”期间，郭沫若参与外事活动800多次，其中许多活动是陪同周恩来总理的。自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后，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中国在外交上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郭沫若这时虽已年届八旬，受到大好形势的鼓舞，精力饱满地在外交战线上襄助周恩来。仅在1971年至1973年间，他就参与和主持外事活动500多次。郭沫若比周恩来年长6岁，体质又弱，在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处处对他关照，无微不至。有一次会见外宾，送客时郭老陪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时当黎明，寒风袭人，周恩来回屋后发了脾气，批评警卫工作没有做好，说郭老这么大年纪还让他吹风，随后又劝郭老回去休息。郭老对此异常感动，说：“他自己不是也在吹风吗？他心里只考虑别人，而根本不考虑自己。”从此以后，周恩来再没有让郭沫若和他一起通宵会见过外宾。

尽管这样，“文革”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年轻的生命。先是23岁的郭民英，于1967年4月死于对“文革”不理解；接着是26岁的郭世英，又于1968年4月22日，在北京农业大学被一伙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造反派绑架关押，严刑拷打，折磨致死。

周恩来闻知郭世英被折磨而死去的不幸消息，亲临郭老家里吊慰。他引用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安慰郭沫若夫妇：“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劝慰他们节哀；同时悲愤地说：迫害世英，不仅针对你们，也是针对我的。其后，周恩来两次派联络员到北农大去调查此案。因为当时江青一伙横行，造反派嚣张，两次调查都没有结果。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林彪住处查出了不少宣扬孔孟之道的条幅和材料，毛泽东把林彪与孔孟之道联系起来，开始考虑“批孔”的事。早在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谈到学术界人士时就曾说过：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1973年5月，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间一天，毛泽东正在读《十批判书》，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这是大字排印本。毛泽东随手给了江青一本，还念了这首“顺口溜”。江青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知道，毛泽东对郭沫若这本书不甚满意，幸灾乐祸，心中十分得意，看到有了一个攻击郭沫若的机会。

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到：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

他新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江青自以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立即赶到北京大学，授意“梁效”写作班子，将郭沫若史学著作中尊孔的话加以摘录，准备印发各地，公开批判。这事被毛泽东发觉，加以制止，并且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老。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稍晚一些时候，周恩来曾与张春桥一起前往看望郭沫若，将毛泽东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和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及注释等交给郭沫若。周恩来当着张春桥的面告诉郭沫若不忙检讨。他说：你那些书要清理清理，但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还说不清楚；你们大家都读书，我回去也读你的书，读完后再说，不要急于写批判文章。

江青一伙攻击郭沫若，几乎总是与攻击周恩来同步进行，把两个人捆在一起鞭挞。每当形势发展到关键时刻，一旦发现有机可乘，江青就挥舞起“造反”“夺权”的大棒打将过来，或者明枪暗箭齐发，射向郭沫若和背后的周恩来（江青认为他是郭的“后台”）。

1974年1月25日，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召开驻京部队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出席并主持了这天下午的大会，但他是直到当天上午11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军队的同志（王洪文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在批林问题上先走了一

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sup>①</sup>

这天郭沫若被指定前来参加大会。江青一伙一方面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鼓噪，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同时点名批评郭沫若，暗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江青赤膊上阵，当着事先还不知情的周恩来的面，在会上念了毛泽东的《呈郭老》诗，毫不留情地两次点了 82 岁的郭沫若的名。她说：“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sup>②</sup>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周恩来心里当然明白，江青居心阴险，是要凭借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意向，来批判与郭沫若有深厚友谊的周恩来，她在大会上羞辱郭沫若是冲着自己来的。在江青擅自召开的这次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回到家里，连饭都没吃，就让秘书赵茂峰打电话给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梦夫和高富有，立即去看望郭老。他们来到郭老家中，转达周总理的话：“郭老已是 80 岁的

①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6 页。

② 《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 年 11 月印发。

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同时传达了周恩来的3点指示: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24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二,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要铺上地毯;三,请郭老从小卧房中搬到大办公室住。这些事情由王廷芳同志负责。郭老得知总理的关怀,衷心感激,只是不同意换房间,也不同意铺地毯。后来总理见到郭老向他解释了请他搬到大房间住的原因:人老了,需要充足的氧气,屋子太小,氧气不足,危害身体,并说地面太滑,铺上地毯,防止摔倒。郭老听后愈加感动。

囿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压和对毛泽东的崇敬,尽管内心充满矛盾,郭沫若还是提笔写下了一首自责的七律呈毛泽东,题为《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在当时处境下,郭老不得不表示改变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和痛苦难堪的心情不难想见。因此在1977年后郭沫若手订的《沫若诗词选》中,舍弃了这首诗。

不久,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窜到郭老家中,当面诬蔑郭沫若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著名剧作和史学论著,都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泽东的。张春桥指责郭沫若骂了秦始皇。他不但要郭沫若承认这些恶毒的攻击,还要郭沫若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逼他攻击周恩来。张春桥的骄横无理,郭老十分反感,怒不可遏,当即把张春桥顶回去:“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蒋介石的。”驳得张春桥无言以对。郭老蔑视这伙新贵的狂妄无耻,冷静地对于立群说:“历史是公正的。”



2月10日，江青又打上门来，再次逼迫郭沫若写检查，并以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中国》为名，攻击周恩来。她也诬蔑《屈原》和《十批判书》等著作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同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3个小时，郭沫若决不屈从，又不能反驳，始终以沉默抗拒她的狂言。

郭沫若无愧于人民的企望，无负于他同周恩来半个世纪真挚的革命友谊。为了维护周恩来的英名，面对江青一伙的千钧压力，他坚强不屈，挺身挡住了江青射向周恩来的毒箭。尽管他在别种场合说过某些违心的话，这一人格的光辉，足以抹去那些斑点。

经过江青这番蛮横折磨，郭老悲愤交加，忧心如焚，体温顿时升高，突发肺炎，病情危险，立即住院。经过检查，右肺上叶炎症，略见吸收减少，右肺下部出现片状模糊。周恩来得知郭老病情，深感震惊，不顾自己病情严重，仍旧一天数次过问，还多次派他的保健医生前去探望郭老，对抢救工作相机作出指示。毛泽东闻知郭老病重住院，也派专人前去探视。他对江青的作法十分不满，明确表示不准播放“一·二五”大会江青等人的讲话录音。他还特意向郭沫若索取旧作《读〈随园诗话〉札记》，这一含有深意的举动，自然会给重病中的郭沫若带来很大的慰藉与鼓舞。

郭沫若住院期间，周恩来除了继续派人看望，还注意看北京医院向中央送去的病情报告。不论怎样忙，只要郭老的病情报告一到，他都要放下手里的文件电报抽时间仔细看。有一次看到郭老因打针过敏引起“突发寒战”，即叫他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打电话了解情况；又叫张佐良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大夫说：“周恩来指示：对老年人用新的药，或者用过去没有用过的药，要特别慎重；对一定要用的药，需要做皮肤试验的，都应该做。周总理要把他的意见转告北京医院领导同志。”有一次总理的秘书赵茂峰带着周恩来一封

亲笔信去看郭老,他一看到信就很激动,号啕大哭,说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这反映了郭老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对“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反对周恩来的阴谋看得很清楚的,始终认为“四人帮”反他也是针对总理的,所以他说他“连累了总理”。

郭沫若这场大病一直未愈(其后4年间住了16次院),五一节未能露面,因“四人帮”作祟,一时谣言四起,说“郭沫若有问题”。1974年5月24日,周恩来患癌病情已经恶化,特邀郭沫若陪同会见来华探亲访问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秦惠君夫妇。7天以后,周恩来即于6月1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一起会见外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噩耗传来,郭沫若悲痛欲绝,病情骤然加重,以致双腿站不起来,在病床上写下饱含深情的悼诗:“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还用颤抖的手在日记中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月15日他抱病参加了总理的追悼大会。他是坐着轮椅去的。该站起来致哀时,两人左右扶持都站不起来,他用尽力气,才挣扎着站起来,向最敬爱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令人庆幸的是,郭沫若终于亲眼看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灭亡。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郭沫若怀着无比欣喜的激情,写出国人争相传诵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欢呼党和人民的胜利。

## 五四闯将韩麟符

马熙群

韩麟符，五四时期天津学联代表人物之一。原名韩致祥，字瑞五，笔名小工、岚光等。1899年生于承德府赤峰县（现属内蒙古自治区），17岁时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韩麟符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5月6日，他与于方舟、张太雷、湛志笃、马骏等人组织直隶一中、北洋大学、高等工业学校、南开学校的学生近千人集会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初期，韩麟符就以其激进的思想、雄辩的口才和犀利的文笔在爱国学生中脱颖而出，曾被选举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sup>①</sup>。

1919年6月18日，韩麟符作为学界的代表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这次会议因商界代表未能到会，有的与会者提议暂缓通过联合会章程和选举会长。在韩麟符的力争下，经过61名到会者表决，使联合会章程得以通过，并选举出卞月庭、马千里、刘俊卿为正副会长，韩麟符为联合会评议部成员。<sup>②</sup>

6月下旬，北京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电许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全国各地拒签和约的斗争再度出现了高

---

<sup>①</sup> 据湛志笃：《参加五四运动的几点回忆》；刘家俊：《五四运动中直隶省立第一中学的一些活动》及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长、政协贵州省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惠世如于1985年给本文作者的来信。

<sup>②</sup> 1919年6月19日天津《益世报》。

潮，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代表赴京请愿。25日下午5时，联合会评议部在商会会场开会讨论，由韩麟符作报告：“本日与山东代表在北京请愿团代表接洽，该代表报告在北京请愿之情形，政府亦不过敷衍而已。唯望各省联合会或同等机关先电政府，必须以完满办法答复山东请愿团，否则各省即派代表赴京与山东请愿团一致行动，方有收效之希望……”<sup>①</sup>会议当即决定：“派代表晋京”。次日，评议部议定致北京政府的电文及韩麟符等10人为天津各界联合会赴京代表。27日上午9时，韩麟符等10名代表在天津各界数百人的欢送中由天津老车站登车起行，当日下午4时抵京后，立即奔赴总统府，要求谒见大总统。由于总统徐世昌拒绝接见，天津代表当夜宿于总统府前。次日凌晨，代表们共同商定了对总统之请求的三项条件。直至下午4时，韩麟符等天津10名代表方得督查长李达三于颐年堂接见。李劝代表们回津，当即遭到代表们的拒绝。代表们表示：“总统如果一天不接见，我们就一天不回去。”晚6时，国务院总理龚心湛又来与赴京代表们纠缠、敷衍，他在春藕斋听取了天津代表所提出的三项条件之后说：“此事尽可以从长计议，必能将此意转达总统。”韩麟符等人仍以未见总统不能即回为辞。龚退去之后，又有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出见，他说：“总统于上午接见北京代表时受了暑热，所以不能接见各位。”天津代表们则坚持不见不行。在韩麟符等人强烈要求下，总统徐世昌见推辞不掉，不得已，在集灵囿接见了天津代表。代表推举韩麟符、王厚斋、刘清扬3人为谒见总统时的发言人。见面之后，韩麟符等毫不客气地表示了对总统的不满：“大总统竟然两天拒见代表，显然是忽视民意。拒绝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是4亿人民的呼声。”他们向徐世昌力陈天津代表的三项条件，请北京政府“速电吾国专使对于

<sup>①</sup> 1919年6月26日天津《益世报》。

和议万勿签字,并行惩办卖国诸贼,以谢国人。”徐大总统则有气无力地说:“余老矣,既肩此重任,万不能使中国有所损折。至青岛问题,余持保留主义,签字与不签字无大关系。”韩麟符等严正指出:“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绝不空手回去!今晚非去电拒绝签字不可!”徐世昌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深知民愤难平,才勉强地答复说:“你们年青人这样爱国是好的,政府当然接受民意,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读书吧!”韩麟符等进逼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们交待。”在韩麟符等人的步步紧逼之下,徐世昌实在没有退路,不得不囑令秘书当众拟好电文,签批之后拍往巴黎,电文中令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总统以最恳挚之词”回答韩麟符等天津代表们的要求,“坐[座]谈1小时余,各代表始退出至新华门。”<sup>①</sup>在国内外各方爱国人士的压力下,28日(巴黎时间)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实现了”<sup>②</sup>。当时年仅20岁的韩麟符在其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在全国各地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中,抵制日货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天津竹竿巷万德成东洋庄订购日商布疋1万匹,且专售日产棉纱,共获利60余万元。1919年7月10日下午,天津各界联合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公推韩麟符等3人赴该号质问。韩等前往,万德成老板避而不见,且于12日对人说什么:“人皆抵制日货,我且提倡之不假。”同时表示出对韩麟符等青年学生不以为然,以手指其帽说:“此为日本帽,我乐意戴之,何与此辈事?”韩麟符于7月14日向评议部报告了万德成行径,并主张对其严厉制裁。大家

---

<sup>①</sup> 1919年6月29日天津《益世报》。

<sup>②</sup> 《中国现代史》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讨论结果,对万罚款10万大洋。后经联合会多次会议议定,令万交出存货,罚款3万元。万在爱国青年韩麟符等同学面前低下了头,并受到了应有的制裁。7月24日,由韩麟符等人筹建的抵制日货委办会宣告成立。一次,他在天津商业各界代表所参加的集会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说:“谁要当汉奸,谁要买卖日货,我们就要不客气了,当以奸商论处!”说着,拔出匕首,插向讲台,以示警告,表明了将抵制日货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1919年8月初,韩麟符做为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出代表,辗转全国各地,先后到达石家庄、太原、汉口、南昌、九江、安庆、杭州、南京、镇江、开封、芜湖、上海、郑州等市,以筹建全国各界联合会,直至9月初方北返天津。9月上旬,韩麟符所联系的各地代表陆续抵津,13日抵津代表同天津各界联合会在法租界(因受查抄而移至租界内)维斯理堂召开会议,公推马骏、韩麟符等7人为全国各界联合会干事,<sup>①</sup>并为“山东事件”<sup>②</sup>组织第二次赴京请愿活动。10月1日,各省赴京代表31人遭到北京政府的逮捕,坐镇天津的韩麟符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于10月2日立即组织了天津各校学生4000余人、童子军300人结队前往省长公署。当请愿队伍抵达东辕门之后,韩麟符亲自前往与省教育厅王叔钧厅长接洽,后又有省公署参谋长刘启恒出面,共同在省政务厅西跨院接见韩麟符。刘、王对韩说:“要求之事,如可以办到,无不尽力。”于是,韩麟符将各省请愿代表在京被拘情形及所要求之五项条件一一说明,并请省长转电中央,要求各条款给予圆满答复,以顺民意。刘、王二人入内商议片刻之后出来说:“省长对于学生爱国举动极其钦佩,人所

---

<sup>①</sup> 北洋政府档案:《天津警察厅密报津、沪、鲁代表决定赴京请愿》卷,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sup>②</sup> 指1919年7、8月份山东相继发生全省戒严和马良逮捕请愿学生、枪杀爱国回教徒事件。

共知。此次题目太大，恐省长不能为力。”韩麟符毫不退让：“题目固大，但请省长转请中央，非请省长执行。”“且青岛本为我国领土，宁可迫于强力被人夺去，不能令少数人任意送人！”韩麟符通过有理有据且义正词严的争辩，两位省署要员无以相对。最后，王、刘二人说省长公出，俟省长回署之后定然代答，并让次日午后3点听信。韩麟符见请愿目的基本达到，再坚持下去也无多大益处，便组织请愿队伍前往高等工业学校，沿途高呼“民国万岁”等口号。请愿队伍抵达该校大操场之后，韩麟符向大家报告了同省署要员们会谈的情况，直到晚7时队伍方散。

1919年9月，天津市的进步学生成立了两个著名的组织，一个是由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发起的“觉悟社”，并创办了《觉悟》社刊；另一个是由韩麟符、于方舟、安幸生、陈镜湖、王天麟等人组织的“新生社”，他们的目的是唤醒沉寂的“睡狮”——中华大众，把落后、贫穷的中国引向新生。同时，他们也出版了《新生》刊物。当时，周恩来是以南开中学为中心并广泛吸收各校进步青年共同探讨革新之路；而韩麟符则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为主体，并接纳其他学校进步学生共同研究新生之路。他们在各自的社团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而并肩拼搏，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10月2日，当韩麟符率队到省公署请愿并会见省署要员时，曾对省署限制周恩来等同学创办的《学生会报》一事提出了质询：“且杨以德<sup>①</sup>暗中压迫印刷局，不许为《学生会报》印刷，不得已停刊。言论已失自由，应请省长加以维持。”不久，周恩来因双十节赴省署请愿而被捕，省署在传讯他时曾为其拟定21个必答问题，当中第12题即是：“韩致祥<sup>②</sup>赴粤何

① 为直隶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

② 韩麟符当时的名字。

事？”周恩来则拒绝回答。由于周恩来等进步同学的保护，反动当局无法加害韩麟符。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韩麟符所领导的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张太雷接受李大钊的委派，在天津原觉悟社和新生社的基础上组织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sup>①</sup>小组成立不久，周恩来于11月初远涉重洋赴欧洲勤工俭学，该小组在韩麟符、邓颖超等人的领导下，曾出版过日刊《劳报》<sup>②</sup>，刊载天津和全国各地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组织机构就是在天津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23年1月，李大钊亲自介绍原新生社主要成员韩麟符、于方舟、陈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1日，中共北京区委组织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召开纪念五一国民大会，韩麟符担任大会的执行主席。到会的有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俄罗斯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中国少年学会等40个团体及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30余所院校师生共达五六千人之多。大会最后通过了“拥护工人集会、结社及罢工自由”等五项决议。正当大会执行主席韩麟符亲自宣读这五项决议时，他发现颈上的围巾被人从两面拉住，扭头一看，一面一个警察，拼命地勒住了他的脖子。韩麟符憋着一口气，使出全身的力气，将一警察打倒，在群众的掩护下脱离了险境。

1923年暑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韩麟符、邓中夏等人先后到北京蒙藏学校，向在校的蒙古族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寒假期间，由韩麟符和李渤海介绍，发展了云泽（乌兰夫）、奎璧、赵诚、佛鼎、春和、康根、李裕智、多松年、孟纯等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起内

---

<sup>①②</sup> 谢忠厚编著：《近代河北史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蒙地区第一个党支部<sup>①</sup>。

1924年3月9日,韩麟符仿照北京团组织的形式,在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到会55人,大家推举韩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方舟等5人为委员,邓颖超等5人为候补委员。此后,韩麟符又在张家口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春,韩麟符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带领吉雅泰、奎壁、赵诚、陈镜湖、郑丕烈、杜真生等共产党人在绥远、包头、察哈尔、热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4个地方工作委员会<sup>②</sup>,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先后由陈镜湖、杜真生担任;中共察哈尔工委负责人是张良翰、杨洪涛;中共绥远工委负责人是吉雅泰;中共包头工委负责人李裕智。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198人,其中共产党员仅24人,直隶省一大代表只有6人,由于韩麟符、陈镜湖、于方舟均出席了会议,所以由韩麟符所领导的原新生社成员占到会共产党员的1/8,占直隶代表的1/2。<sup>③</sup>会上,韩麟符同沈定一、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韩麟符协助李大钊建立起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李大钊出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组织部长,韩麟符、石碛、傅汝霖、于树德、丁惟汾、于方舟、张国焘、白云梯任委员。北方执行部派于方舟、韩麟符分别去顺直和热河主持建立两省(此时热河应为特别区,属省级建制——笔者注)的国民党省党部。

<sup>①</sup> 据王树盛、郝云峰整理的《乌兰夫回忆录·在北京蒙藏学校》。

<sup>②</sup> 《热河革命史大事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sup>③</sup>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汇刊》,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韩麟符来到热河特别区的首府承德之后，凭着他多年学生运动的经验，在串联、座谈、集会、演讲的基础上，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师生，并很快地组织起以热河中学和热河师范为主体的中师两校学生联合会，并迅速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在学潮中，韩麟符将一批进步师生发展成为国民党党员，并于承德三条胡同上口原肃顺府内建立起国民党热河省党部，由热河早期共产党员陈镜湖、杜真生等出任党部执行委员。此后，韩麟符又到内蒙京绥铁路工运中心张家口，很快在那里建立起国民党张家口支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韩麟符等人在热河首府承德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悼念活动。当五四运动6周年之际，他与热河国共两党地方组织负责人一起，在承德演武厅召开了学商各界上千人的群众集会，会后上街游行，焚烧日货。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了，他们又一次发动群众走上街头，并与游行的群众手挽着手，边走边高声唱道：“叹，上海繁华世界已成屠杀场，工人流血学生死，残忍似豺狼。劝我国民急速起，誓死雪国耻，舍命救同胞，义气高千丈！”由于韩麟符、陈镜湖、杜真生、郑丕烈等热河早期中共党员把先进的革命思想输入落后的热河山区，深受广大知识界和穷苦百姓的欢迎，所以被承德民众誉为“热河四杰”。

李大钊非常重视农运工作。韩麟符遵照李大钊的教导，在热河活动时把农运做为主要的任务之一。在他举行的集会上，带领群众第一次呼喊出“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穷苦农民的心声。他曾派出马德元等4人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又送部分农运骨干到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培训，聆听李大钊亲自讲授的《土地与农民》等课程。这些学员返回热河之后，在当地掀起了农运的高潮。不到1年的时间里，热河特别区办起了县农民协会9个，区农会13个，乡（村）农会56个，共有农会会员5423人。其会员之多，范围之广，在中国北

方各省区仅次于山西省，位居第二位。<sup>①</sup>

1925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热河、察哈尔、绥远的蒙汉各族农工兵代表200余人。韩麟符是大会的主持者之一，并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大会选举了李大钊为大同盟书记，韩麟符、赵世炎为副书记。会后，大同盟的具体工作由韩麟符负责。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资助下，韩麟符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热河的建平、赤峰、平泉、开鲁、林西、林东、围场、承德各县的士兵、土匪<sup>②</sup>以及农牧民群众中都有同盟会组织，并进行了多次反豪绅、反捐税的斗争。绥远地区原有哥老会组织，其成员10万人以上，他们的首领大多加入了同盟会，能够听从韩麟符指导的在5万人以上。

韩麟符为了建立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队伍，经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同意，创立了“内蒙古特别民军”。他以30多名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组建起3个纵队（相当于3个团），第一纵队司令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李大钊提议，经共产国际同意而组建的）中央常务委员乐景涛担任；第二纵队司令由原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国民党热河党部执行委员陈镜湖担任；第三纵队司令由热河早期中共党员、农工兵大同盟执行委员郑丕烈担任。在这支队伍的创建中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曾亲自到塞外坝上高寒地区的多伦，检阅了这支由共产党第一次组建的军事武装队伍。1926年春，第一纵队攻下了热河的经棚、林西、乌丹地区，将奉军石文华部击溃；第二纵队出兵承德，赶跑了奉系军阀设在热河的都统阎朝玺，由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部宋哲元出任热河都统，陈镜湖出任热河民军司令。这是由官方所任的第一

---

① 据《国民党热河省党部报告》（1927年4月），《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版。

② 大多土匪为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

名共产党员的“司令”。第三纵队攻击迅猛，于冰天雪地之中，连下赤峰、建平、朝阳、开鲁数县，占领了热东、热北的大部地区，基本上将奉系军阀赶出了热河。不久，奉、直、晋、鲁各地军阀联合起来从四面围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内蒙古特别民军同冯部一起奋力抗击，损失惨重。不久，向西突围，编入冯玉祥的部队，直至冯与蒋合作而“礼送共产党出境”，陈镜湖、郑丕烈等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才先后离开冯部，返回热河。

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韩麟符等6人被指定为监票员。经过大会选举，韩麟符同毛泽东、董必武、屈武、邓颖超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二大的闭幕式上，韩麟符发表了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演说。

1926年3月18日，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在北京发生了，韩麟符作为这次示威游行的指挥者之一，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后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

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军俘虏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大批高级军官，广东国民政府为了转变他们的思想，为国民革命尽力，便将他们集中到黄埔军校举办训练班，韩麟符出任了这个训练班的政治部主任。他不负重任，经过他对这批高级战俘耐心的开导和严格的教育，终于使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投入到国民革命的斗争中，增强了北伐军的实力。

1927年“四一二”之后，韩麟符在于佑任的帮助下，带病从海上乘渔船离开广州，辗转到达武汉，在国民党中央执委第二届常委会第十二、十三、十四扩大会议上，力促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讨伐背叛国民革命事业的蒋介石。7月15日，“宁汉合流”，韩麟符等人在中共中央安排下到九江待命。7月31日晚，韩麟符历尽艰辛将在庐山数十名国大代表带到南昌江西大旅社，并参加了“八一”起

义。

1927年8月1日上午9时,在南昌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主席团由林伯渠、吴玉章、韩麟符等7人组成。当天南昌《民国日报》刊登出以朱庆龄、毛泽东、韩麟符等22人为名义的《中央委员宣言》及《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当日下午,由周恩来等人作为委员的革命委员会根据上面两个《宣言》公布了起义军行动纲领。

8月2日,南昌市召开了军民大会,到会的有民众团体200余个,各界群众及起义部队5万多人,隆重庆祝起义的胜利及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大会上,各地代表公推韩麟符代表革命委员会向各机关、江西省政府和起义负责人贺龙授印。然后,由韩麟符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演说。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败之后,韩麟符因身患疟疾在当地地下党员家隐居下来,病愈之后,北返天津,通过中共顺直省委找到了原热河特别区共产党的负责人陈镜湖、杜真生、郑丕烈、卢东白等人。

1934年9月21日,韩麟符在榆次县东苏村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身亡,时年35岁。

# 胡耀邦在华北战场上

钱 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终于实现了上前线的愿望,于当年10月14日东渡黄河,经张家口到北平,在军调处中共代表团停留了一段时间,不久后进入冀热辽军区,在担任了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后,来到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担任政治委员。自从1936年东渡黄河作战之后,他又一次置身于前线的战火之中。

## 充满活力的纵队政委

四纵司令员陈正湘,1911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是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的老战士。胡耀邦和陈正湘配合得很好,建立了友谊。建国后胡耀邦到川北工作,仍在北方的陈正湘身体不适请中医开出药方调理,他给胡耀邦来信,请帮助配牛黄和麝香若干。胡耀邦接到信后马上吩咐秘书办理了。<sup>①</sup>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以11个师共7万人,进攻晋察冀根据地中心张家口市。双方交战正酣,傅作义出其不意地从侧后发起进攻,华北部队处境不利,被迫撤出张家口。这次,华北部队丢了不少物资,主力退入涞源山区。

---

<sup>①</sup> 1999年11月6日在北京访问郎宗耀的记录。

守卫张家口的正是四纵，会战失利对部队情绪上的影响很大。针对一些干部战士对失去张家口的抱怨情绪，胡耀邦在灵丘召集干部会议，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进行政治动员，他指出，占了张家口，国民党也并非就不得了了。傅作义孤军深入，占领一城，就要分兵把守，兵力会逐渐分散。而我军才是真正了不得的，因为是为人民而战，到处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援。丢了张家口确实可惜，但是没有了包袱，反而可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看准哪里有机会就打哪里，最近就可以收复比张家口更大的北平和天津。事后看来，他结尾的话说得过头了一些，但是这篇讲话的精神鼓舞了四纵指战员。

根据胡耀邦的要求，四纵出版了铅印的《前卫报》，用两辆马车拉着铅字和印刷机随军行动，一停下来就出版报纸，鼓动士气。不久，这份报纸改由晋察冀军区出版。

在紧张的战争中，胡耀邦抓紧片刻时间博览群书。每解放一个城市，他总要搜集历史、地理和各种书刊。有时骑马行军，他也在马背上读书。遇到不甚珍贵或有副本的书，他骑在马上读一页即撕去一页，待到全书撕完也就读完了。采用这样的读书方式主要是为了减轻行军的负担。环境好转以后他再也不这样做了，到后来更成为一个非常爱惜书籍的人。<sup>①</sup>

1947年，四纵先后参加了保南战役、正太战役，于5月间包围了阳泉煤矿，在测石火车站附近，围歼了前来救援的太原敌军两个师。四纵征战于河北、山西之间，行军途中经常可以看到胡耀邦的身影。他不怎么骑马，而是喜欢走进行军队伍，一边走一边和干部战士聊天。到了驻地，他不是召集干部开会布置工作，就是找人谈心。

---

<sup>①</sup> 李昌：《良师益友胡耀邦》，见《百年潮》1999年第2期。

## 一部《三字经》的产生

在四纵当政委的时候，有一天，胡耀邦看到纵队油印的小报上有一首《三字经》式的歌谣：

天荒荒，地荒荒，  
不识字，是文盲。  
不怨爹，不怨娘，  
旧社会，害人狼。

一打听，原来是四纵“前卫剧社”的年轻战士和谷岩写来练笔，交给纵队小报发表的。胡耀邦马上要政治部主任李昌把作者找来，当面赋予任务，要他编写给连队战士读的《三字经》。

和谷岩担心地说，其实自己只上过小学，生怕写不好。

胡耀邦鼓励他：“还没有干不要先泄气嘛。天下许多大事都是小人物干成的。有志者事竟成。”胡耀邦找来两个小凳子，与和谷岩面对面坐下，娓娓道来：我们部队现在的成分绝大多数是翻身农民，他们作战勇敢，能吃苦，政治素质好，可是文化水平低，文盲太多。这样的军队在小米加步枪时代马马虎虎还可以对付。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就是新中国国防军，要搞现代化，掌握飞机、坦克、大炮，那时我们这样的“土八路”就要抓瞎了。所以，不管行军作战任务多重，从现在起，就要想方设法提高我们战士的文化素质。

胡耀邦说，办法有许多种，进学校当然好，但是不可能都进学校，主要还是靠自学。一定要在连队中造成学习文化的浓厚空气。我们要搞一本《三字经》就是这个目的。由你把文字写好，请人配上插图，看图识字，好读好记，发到连队作文化教材。本子要印得小一些，便于携带，行军休息时就可以掏出来念几行。

和谷岩说：“胡政委的想法很好，我完全同意。就是我从没有写



过这样的东西，怕写不好……”

胡耀邦打断和谷岩的话，站起来握紧了拳头用力一挥，说：“一定能写好，要有这个信心。”说着，他信口就将和谷岩已经发表的《三字经》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然后说：“这样就很好嘛。就照这样写下去。文字要通俗，要顺口，不但要写学文化，还要写共产党，写毛主席，写朱总司令，写穷人翻身求解放。”

最后他吩咐：“形式要生动活泼，写好以后送李主任和我看，多改几遍，就可以定稿了。”

胡耀邦一锤定音。此后的两个月间，和谷岩写了40多章。胡耀邦仔细审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如增加党史、军史内容等。根据这个意见，和谷岩增写了《大革命》、《红军》、《长征》等章。

在第二次送稿的时候，胡耀邦看到作者写了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提议说：“这样写不全面，不利于团结，要把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写上去，五湖四海嘛。要靠革命根据地团结一致的努力，才能把蒋介石王朝彻底打垮。”

胡耀邦还动笔修改了《三字经》的个别句子。原稿《学习》的一章是：

学政治，炼思想。

学文化，知识广。

学军事，打好仗。

能文武，本领强。

胡耀邦改为：

学军事，打好仗。

三字经，念几行。

能文武，本领强。

指战员，状元郎。

前后3个月，这本《人民军队三字经》问世了。全书共57章，四

纵文工团的郑拓为每章配了图画，先在四纵范围内下发到连队。战士们普遍反映这个“三字经”编得好，易读好记。经胡耀邦介绍，这本“三字经”后来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下发到全军区各个连队。<sup>①</sup>

和谷岩本人很快就调到军报社当了专职记者。后来，他任《解放军报》副社长。

### 走上兵团领导岗位

1947年6月，鉴于该地区战局好转，经过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野战军建立了兵团的编制，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为参谋长。该部被称为“杨罗耿兵团”，胡耀邦被任命为新编的第三纵队政治委员。

同年11月，三纵在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指挥下参加了攻克石家庄的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进驻平山县西柏坡创造了条件。1948年春，军委决定，撤销原晋冀鲁豫军区，组成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参谋长陈漫远，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全兵团8万多人。但这时陈漫远和胡耀邦都没有到职，而是继续在各自的部队参与作战指挥，他们都是1948年8月来到第一兵团部报到的。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徐向前、胡耀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徐向前病重，一时间难以坚持战役指挥。刘少奇和徐向前谈话，要他先到石家庄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赴前线，争取打下太原后再休养。徐向前即要胡耀邦先回太原前线，向兵团负责人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

---

<sup>①</sup> 和谷岩1999年写下的纪念文稿，《胡耀邦教我写“三字经”》。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局势,1948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建立了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解放军,以聂荣臻、徐向前为华北军区正、副司令员,徐向前同时担任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王新亭任副司令员,副司令员陈漫远兼任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

担任军政委两年后的胡耀邦在此时走上了兵团级指挥岗位。9月6日,胡耀邦主持了兵团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整整8天,主要议题除了执行加强党委领导,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外,着重总结临汾攻坚战的经验,解决执行城市政策、纪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 一块手表的故事

10月,第一兵团,另加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彭绍辉、政治委员孙志远、副政治委员余秋里)和晋中地方部队共17个旅,发起太原战役。

这时,发生了胡耀邦要兵团侦察参谋“退手表”的故事。

原来,在晋中战役期间抓获的阎锡山军队俘虏中混有700多日本军人,他们本是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官兵,日本投降后被阎锡山收留,投入了内战。这些被俘日本人集中在祁县子洪口接受解放军的教育和改造。为了深入了解太原城内的各种情况,为即将开始的太原战役准备情报资料,物色向太原城里派遣的人员,晋中战役结束不久,兵团的侦察参谋都爱国来到了子洪口俘虏收容所。

解放军有严明的战场纪律和优待俘虏政策,不准搜俘虏腰包、不准没收俘虏私人财物,但在这时出现了变相违反俘虏政策的事情。这批日本俘虏大都戴有手表,但他们普遍吸烟,为了手头有些零钱买烟抽,就要管理人员帮助他们变卖手表和其他物品。乘这个

机会,有些看守俘虏的官兵买下了日本俘虏的“廉价”手表。都爱国见此情景,也以16包“无敌牌”香烟(每包50支)换了一只短三针的日式手表。他拿出的16包香烟,是用情报活动经费购买的,所以“买来”的手表属于公家所有,他回到兵团侦察科就交给大家共同使用,谁出差时谁就戴用,因为当时兵团侦察科只有一只带闹铃的马蹄表。

太原战役开始后,全兵团进行各项纪律检查,子洪口俘虏收容所检讨违犯俘虏政策时,变相“掏”了俘虏腰包的事情即被揭发,都爱国榜上有名,引起了兵团司令部首长重视,敌工部易成科长到侦察科调查,还找了都爱国谈话。侦察科科长张增安、黄政基都作了检讨。不过,侦察科参谋们说这只表系全科所有,而且在易科长来检查时,表就被一位到前沿去工作的人戴上走了。

不管怎么说,手表是一定要退还的,只是都爱国总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他到敌工科领手表的时候,仍然态度“强硬”,强调说,自己这样“买表”是为了给公家省钱。

突然,一个声音在都爱国的身后响了起来:“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给公家买的也是犯了纪律!”

都爱国扭头一看,是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他继续斩钉截铁地说:“公家需要表,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不能用这种变相的办法从俘虏身上去‘买’。”

胡耀邦很少这样严厉,都爱国低下头不吭声。胡耀邦又说:“机关干部应该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你们出差到下边去,用这种办法‘买’手表,下边的同志怎么看这个问题呢?16包烟换一只表,如果人家不是俘虏,在什么地方能有这样的便宜货呢?况且,人家是日本俘虏,以后还要遣返他们回国去,这种变相搜俘虏腰包的事,能说明我们宣传不搜俘虏腰包是真话吗?”

他问都爱国:“你说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年轻的都爱国还希望能为自己开脱,说:“以前我只想:表是给公家买的,而且便宜,给公家省了钱。”

这个辩解使胡耀邦笑起来:“是啊是啊,确实给公家省了钱,但是违犯了不搜俘虏腰包的纪律!得和失,到底哪个大呢?”

都爱国喃喃地说:“当然是失大了!”

“这就对了。失大,是政治上的损失。”胡耀邦转而对易成科长说:“好吧,你们慢慢谈,表要派人给收容所送回去,发还给本人,要向人家道歉,挽回影响。”不过,他也想到了年轻参谋的“面子”问题,在临出门时又对都爱国说:“没有人说你私买手表,不要东想西想,有什么想不通的还可以找我去谈。”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过了好些时候,有一次都爱国给胡耀邦送情报,胡耀邦旧事重提:“怎么样,想通了没有?”

这时的都爱国已经心服口服,对胡耀邦说:“其实我早就想通了,因为政治机关找我谈话,当然要找些理由为自己辩解了!”

胡耀邦开玩笑地说:“结果是:有气无力,歪歪道理。”说到这里,他和都爱国都笑了<sup>①</sup>。

## 太原城下壮士行

10月5日,太原战役拉开战幕,胡耀邦连夜起草兵团的《攻取太原紧急动员令》,于10月7日下发部队。

在太原外围鏖战最激烈的时候,徐向前和胡耀邦经常同时走向前沿。胡耀邦善于阵前鼓动,他来到十五纵的淖马阵地,把《人民子弟兵》报送到战士们手中,他要求兵团政治部的干部、记者都上前线去,“不拿下敌人四大要点,誓不罢休!”

---

<sup>①</sup> 都爱国1999年写下的纪念文稿:《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胡耀邦还对徐向前说，你是太原前线党的前委书记、前线司令员兼政委，军事的、政治的全面负总责的工作担子，就够你挑的了。你的身体又不好，我们年轻人身强力壮，有些事情，我们去做好了。

徐向前信任胡耀邦，用他的话来说，胡耀邦这个人朝气蓬勃，工作热情，积极性特别高。他乐于将重要的工作交给胡耀邦来完成。当年胡耀邦的秘书贺明回忆，徐向前非常信任胡耀邦，把大量的组织和思想工作交给胡耀邦做，彼此十分默契。有一次在司令部，徐向前正和胡耀邦谈工作，突然就吐起血来。胡耀邦见状马上说，徐司令请不要谈了，你的意思我知道了。说完他就下部队把事情办了。事后他回来向徐向前汇报的时候，徐向前还不能讲话，就朝着胡耀邦伸出了大拇指<sup>①</sup>。

胡耀邦全面负责的对敌政治攻势，太原战役打响后仅一个半月，向解放军投降的阎军就有 1.2 万人，还出现了守军黄樵松部准备起义的绝好机会。

黄樵松是太原守军第三十军军长，他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起义，于是派出亲信中校参谋兼谍报队长王震宇（又名王正中），出城与解放军第八纵队接洽，表示愿意立即交出该部防守的东、北两座城门，接应解放军进城。

徐向前授予胡耀邦全权，负责与黄樵松接洽起义。11月3日天快亮的时候，胡耀邦、高树勋等人徒步来到八纵指挥部，这时王震宇已经被安排休息，胡耀邦同意先让来人休息，他和高树勋、王新亭交换情况。

天亮以后，双方见面。胡耀邦问王震宇：“黄军长举义的方案，是怎样考虑的？”

王震宇说：“军座已经在亲信部属中，作了部署和动员，尚无反

---

<sup>①</sup> 1999年12月1日在西安访问贺明的记录。

对者。他的打算是，以最可靠的部队，把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指挥机关包围起来，逼阎交出指挥权，如阎不从，则以武力解决。然后通电宣布起义。……”

胡耀邦指出：“王代表，此事关系重大。回城后，请向黄军长阁下转达，对阎锡山老牌军阀，可要特别提防。况且，阎锡山统治山西近40年，还没有哪一派势力能征服他。在山西，阎锡山是有社会基础的，而且特别会耍政治手腕。千万千万要警惕啊！”

高树勋一旁插话：“胡主任讲话有道理。王代表应尽快回城，将此议忠告向樵松军长转达。”

经过协商，达成初步协议：黄樵松率部起义，引导解放军入城围攻绥署，捉拿阎锡山。王震宇提出，为沟通城内城外联络，交换情报，请解放军派一名负责干部随他人城掌握起义部队。

事关大局，胡耀邦要通了徐向前的电话，汇报说：“已和黄樵松的联络代表商定一个可行方案，黄部拟交出该部防守的东门和北门，接应我军入城解决阎锡山。然后，黄部撤出城外，到指定地域接受改编。但我方急需派一名代表入城协助，并与太原前线司令部保持通信联络。”

胡耀邦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派谁入太原城？”没等徐向前回答，他就自告奋勇地说：“徐司令，那我就亲自入城协助黄樵松举义吧？”<sup>①</sup>

徐向前果断地劝阻了胡耀邦，说，你是政治部主任，打仗需要你，那里面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去不得呀，另外派个人去吧。

胡耀邦回过头来，与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商量人选。胡耀邦提出，选拔这名联络代表的条件是：“政治上很强，又懂军事。”最后，由王新亭提名，决

---

<sup>①</sup> 原十八兵团作战参谋乔希章的回忆，1999年于北京。

定派八纵参谋处长晋夫(对黄樵松说是宣传部长)和侦察参谋翟许友(对外称是晋夫的通讯员)进城<sup>①</sup>。

不想,黄樵松的部下、第三十军二十七旅旅长戴炳南出卖了机密。11月3日,晋夫和翟许友刚刚进城,就和黄樵松一起被捕,不久被押送南京,黄樵松、晋夫壮烈牺牲。翟许友因以警卫员身分入城,被监禁。这次,要不是徐向前的阻止,胡耀邦一进太原就会落入敌手。

黄樵松起义的失败丝毫没有减弱胡耀邦瓦解敌人的信心。《人民子弟兵》报编辑科长韩铁民记得,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突然接到通知,赶紧到前线指挥部见胡耀邦。韩铁民飞身上马,跑了20来里路赶到那里。胡耀邦对他说,把你找来,是给你谈一谈太原前线形势和最近报纸工作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击下,太原城里敌人很惊慌,士气低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特别明显的是阎锡山的部队和胡宗南的矛盾加深,各自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互相不信任。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sup>②</sup>。

太原前线瓦解敌军的工作在胡耀邦的全面指挥下卓有成绩。从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太原的阎锡山守军有3万被瓦解,或起义,或投降,占全部守军的30%。

## 夺取战役的最后胜利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原华北野战军的第一兵团改称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

---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85—786页。

② 原十八兵团政治部韩铁民的回忆,1999年于北京。



1949年5月后由周士第接任),为中央军委直属兵团。

1949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将参加了平津战役的第十九和第二十兵团,还有四野的炮兵一师调往太原前线,与第十八兵团合兵打太原。

1949年3月17日,以原第十八兵团部为基础,成立了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周士第,副政治委员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时成立总前委,由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陈漫远、李天焕、胡耀邦8人组成,其中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指挥包围太原的部队约25万人。这是胡耀邦在战争前线担任的最高职务。

参战部队多,入城教育尤为重要。胡耀邦以太原前线政治部名义,向前线各部队重申《入城守则》,提出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要求。要求在太原前线的各部队,都要贯彻中央军委、军区(即华北军区)、军管委员会(徐向前兼任军管会主任)和本政治部(太原前线政治部)关于入城的各项纪律。“使全军所有同志,都能去严守纪律、去执行政策,并且能去监督和维护政策纪律,所有干部必须成为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对部队入城后提出的口号是“攻城战斗结束后,除警备区维持治安部队,全部撤出城外。”<sup>①</sup>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彭德怀返回西北,毛泽东要他先到太原前线视察,因为太原战役结束后,十八兵团将归属第一野战军指挥。

3月28日,彭德怀来到榆次的峪壁,看望了正在养病的徐向前。徐向前向彭德怀介绍了进攻太原的部署和准备。他还谈到,自己身体情况很差,没有办法到前线去,为此请彭德怀留下指挥攻城,待拿下太原后再走。中央军委当天就批准了徐向前的请求。

---

<sup>①</sup> 原十八兵团作战参谋乔希章的回忆,1999年于北京。

彭德怀对徐向前说：“明天我就上阵地看地形，找个年轻的陪我上阵地吧。”

徐向前说，从打仗方面来说，应该由周士第副司令陪你去，但周士第是前线副司令员，又是总前委副书记，他得向兄弟兵团介绍太原情况。要论年纪嘛，胡耀邦主任最小，就由他陪你吧。

胡耀邦欣然答应：“我愿意跟彭老总学打仗。”

4月20日，解放军向太原发起猛烈进攻，进展十分顺利。24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这天凌晨2时，彭德怀叫醒了胡耀邦，对他说：“走，我们到前面的阵地上看看去。”一路上，彭德怀情绪甚好，对胡耀邦说，现在我们的兵力、火力都大于过去，士气高涨，有可能一举拿下太原。

果然，当天上午10时，太原守敌被全歼，此役共歼敌13.5万人。胡耀邦至此完成了他在华北的战斗任务。

## 刘涌与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

薛 宪 明

1947年年底,伴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的隆隆炮火声,全国解放的形势即将到来,党中央电示中共中央社会部为接管大中城市准备干部。中社部部长李克农指示,由副部长谭政文牵头,一室主任罗青长、三室副主任刘涌、二室科长甘露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1948年4月,中社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晋绥分局发电报,要求选调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保卫干部。分配数字为华北局50人、华东局28人、晋绥分局12人、西北局10人,共计100人。罗青长、刘涌、甘露等3人对所有学员分工负责地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对个别不合乎要求的坚决退回,另予补充,确保了参加培训人员的质量。这些学员于1948年6月底前被送到中社部驻地,另有8名从北平来的党员大学生,合计108人(戏称“一百单八将”)组成训练班。训练班设在河北省平山县(又叫建屏县)中社部所在地东黄泥村对岸的西黄泥村。谭政文兼任训练班主任,龙潜(开学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刘涌任副主任,刘涌兼党支部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甘露任组织科长,狄飞任教育科长;李国华任总务科长。训练班课程主要有情报保卫人员的修养、公安、情报、侦察、审讯等。情报人员的修养,由刘涌讲,其他业务课,分别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同志讲授。为了使训练班的学员全面了解北平的情况,中央社会部还搜集了一些有关北平情况的资料汇编成《北平概况》,供学习参考。

9月17日,训练班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正式开学,开学典礼由中社部部长李克农主持,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中,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外,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亲临大会,并都作了重要讲话。中央领导同志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公安保卫工作的重要意义,讲到党对公安保卫干部的要求等。并一再强调公安工作是党的刀把子,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要求学员们要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争当无名英雄,反对争名逐利等等。领导讲话后,学员们深深地感到承担责任的重大。

辽沈战役之后,胜利捷报不断传来。形势的发展、任务的要求,接管城市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此,原计划学期一年的训练班不得不提前结业。

当晚,训练班全体学员打好背包,参加了隆重的结业典礼。在典礼会上,李克农给学员们讲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指出了蒋家王朝彻底覆灭是大势所趋,北平解放指日可待。摆在大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接管北平市警察局、肃清特务、组织革命政权等。他介绍北平情况时说道:北平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既有清朝遗老、下野军阀、失意政客,又有蛰伏的汉奸、官僚资本家、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等,工作任务将非常艰巨,不得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因为任何粗心大意都可能会给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李克农还根据这些同志虽久经战场,但绝大多数未到过大城市的特点,热忱地教大家如何打电话,如何使用抽水马桶等生活常识,并要求同志们要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坐人力车,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使大家很受教育。

是夜,李克农宣布了进城的四个队的编制(这四个队就是市局最早成立四个处的机构设想)。命令谭政文、刘涌带领学员开赴北

平。谭政文因工作需要，乘吉普车先行。训练班除少数几个人留在中社部工作外，大部分学员与中社部的几位主要干部一起（共计114人），由刘涌带队，分乘5辆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式卡车，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高昂的革命斗志连夜向北平进发。

为了使干部深入了解北平的情况，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刘涌组织大家抓紧有限的时间，认真学习了李克农等同志关于掌握政策、遵守纪律、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思想作风的报告。晚上又继续行军，行至武强县范镇宿营。16日由范镇出发，过献县、河间、任丘、高阳，于当晚到达保定市。

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彭真、叶剑英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及主要干部任命名单。任命：谭政文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刘尽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处长（一处）；冯基平为侦讯处处长（二处）；赵苍璧为治安处处长（三处）、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处长（四处）；张廷楨为公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同时宣布了“内七外五郊八”（国民党在北平设制20个区，即：城内7个区，外城5个区，郊区8个区）20个分局局长。他们是内一分局局长刘坚夫；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内三分局局长于苇；内四分局局长张杰；内五分局局长汤光礼；内六分局局长苗捷夫；内七分局局长李超；外一分局局长邢相生；外二分局局长李成；外三分局局长慕丰韵；外四分局局长惠锡礼；外五分局局长何明；郊一分局局长贺生高；郊二分局局长任成玉；郊三分局局长谭兆屏；郊四分局局长徐欣三；郊五分局局长徐守身；郊六分局局长张锋；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郊八分局局长白玉山。当晚，刘涌及时向大家传达了市委会议精神，公布了任命干部的情况，做了暂短的动员后，继续北上。经过一夜行军，于18日晨到达涿县。19日夜由涿县改乘火车，

于20日凌晨3时到达长辛店。

12月21日,全体人员乘火车抵达良乡。根据市委书记彭真指示,由谭政文、刘尽中、刘涌、冯基平、赵苍璧、张廷楨、曲日新7位同志组成了中共北平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刘涌任党委书记;经北平市委介绍华北局党校学员程毅、杨天知、冯庭枋等77人和华北局干部魏相如等14人也一起来到市公安局报到,分配到各个分局,加强了接管工作。尽管这样充实干部,但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百废待兴的城市,大家仍感到任务繁重,干部太少。针对此情况,是月下旬,谭政文、刘涌、冯基平在向彭真汇报接管干部情况时,刘涌再次请求增加干部,冯基平还特意提到平津地区情报人员的情况。彭真对这一情况已有所了解,当即表示向中央请示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同意。

12月24日,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的700多名战士,奉中央命令改编为“公安大队”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的编制,负责保卫北平市党、政机关和首长的安全及配合二处查封国民党特务机关等任务。25日,彭真在良乡向全体干部作报告,提出进城后的首要任务:一是安定社会秩序,二是搞好接管,三是肃清特务,四是解决人民生活问题。

1949年1月17日,党中央又电令各解放区在北平地区的情报工作站(组)撤销,全体工作人员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分配工作。先后有:①冯基平负责的中社部直属平津站;②王兴华负责的华社部保满情报站;③刘景平负责的华北局平西情报站;④任远负责的东北局社会部冀热察分局情报科;⑤李宁负责的晋察冀北岳区党委社会部平汉情报站;⑥张烈负责的华社部冀中公安局平保工作站;⑦安林负责的冀东区党委情报处北平情报委员会;⑧刘茂田负责的冀察热辽情报处平津站北平组;⑨阎塘负责的房、涞、涿情报站;⑩王森负责的中社部直属五人情报组。此外,还有晋绥调

查局单线联系的闵步瀛和华北局社会部单线联系的刘光人等 100 多人。这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充实了公安局的接管力量,其中部分同志后来成为首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领导干部。

1 月 22 日起北平市公安局一、三、四处和公安大队陆续从长辛店迁到海淀办公,城内、外各分局亦同期迁到海淀办公。在海淀期间,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颐和园后山召开了一次接管北平市全体干部大会。叶剑英号召全体接管北平干部要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强调首要的任务是安定人心,解决好粮食、煤和物价的问题,保障人民生活。

是月下旬,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仁组织有关方面负责人,又从各大学、中学选调学生 130 人,充实到局属各处室单位。这些人对北平的情况比较熟悉,虽然缺乏工作经验,但工作积极,热情很高。另有从东北南下队伍中华北、中社、华社等处调来 243 人一起参加接管工作。

1949 年 1 月 1 日,二处处长冯基平在香山召开处务会议研究接管工作,提出需要进一步了解敌情的要求。经市局领导研究决定派刘尽中、闵步瀛、张士晶、吕岱、梁文英、袁泽 6 名同志跟随解放军军事谈判代表团进入北平,分头了解城内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各系特务机关及警察局的情况。在分析研究了这一次收集到的情况的基础上,又决定派张廷桢、刘涌、武创辰等 3 人,通过地下关系调查了解警察局的情况。

进城后,他们住进位于西单教育部街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内,当时国民党市党部的党魁要员都潜逃了。白天,他们顺着绒线胡同走到位于前门公安街的北平市警察局,通过地下关系以及与地下关系有联系的警察了解情况,晚上回来整理材料、研究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那时警察局旧警人员中除高级警官外,带家属的很少,大部分家在原籍,这些人及小职员、勤杂工等绝大多数都在大

伙房包饭吃。原以为他们的伙食很好，其实因为物价飞涨，生活也很苦。调查的几天里，几乎天天和他们一道吃窝头，啃咸菜，有时喝点白菜汤，根本见不到什么荤腥，伙食远不如解放区的好。这些人多来自产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苦力、贫雇农、城市贫民、中农、自由职业者、少数家庭贫寒的中学生等。他们在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下失去土地和职业，为了生计当上了雇佣制的国民党警察。但是，在统治阶级长期反动思想宣传下，世界观被扭曲，或多或少地参与或执行对人民的镇压，染上欺压、敲诈老百姓的恶习等。开始工作时，旧警人员有畏惧心理，不敢接近，可当他们看到刘涌等上下平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一丝一毫没有欺压人的行为时，就逐渐变畏惧为敬佩，也愿意接近了。他们3人乘机向这些人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号召他们解除疑虑，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争取立功。并晓以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你们要争取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自己的前途创造条件。一些有正义感的警察本身就对国民党嫡系警官、特务分子等不满，经教育后工作很积极，主动提供了不少情况。

经了解，国民党警察局机构有：督查处、机要、专员等5个室；户政、政工等4个科；刑警、女警等5个大队；医院、学校、乐队、感化所；“内七外五郊八”20个分局。分局下设84个分驻所，322个派出所，共1.3万余人，分雇员、警长、警士、公役四种。未了解前，刘涌他们对警察局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情况不太清楚，对一些警察也只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上。如一次刘涌和同事在王府井十字路口，看到一个形体长得彪悍、样子很凶的大麻子脸交警，感觉他一定很坏。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工作者赵凡也曾对刘涌讲过，他经常去东安市场联系工作，看到这大麻子就有凶狠不良的印象。经过了解，发现这个人很能干，并没有欺压百姓。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深，使同志们再了解情况时，更注重实事求是。市局根据刘涌等同志了解的



情况,修改了接管计划,制定了相关条例,详细列出了分批逮捕的特务名单和查封接管单位名称、地址等,有针对性地部署了分工接管工作任务。

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当日,北平市公安局全体人员进城的人数是公安大队728人,公安干部539人,暂住西单教育部街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里。当时人多床少,只能打地铺。不少同志见有的房间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用手摸摸,高兴地说:“这不是很好的床吗?”打开背包往地毯上一铺,就这样开始了接管生活。

2月2日上午,谭政文局长带领刘涌、冯基平、赵苍璧、曲日新4名处长和公安大队负责人张廷桢等10多人,在公安街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的身分主持了仪式,宣布了分工负责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畏罪潜逃,由外一分局长徐澍为代表参加交接)。徐澍召集巡官以上旧警察在礼堂里,谭政文在讲话中宣布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旧警人员的政策。他说:这次的革命是人民大众翻身、国家永远为人民所有,与历次改朝换代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强调:旧警人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人民公安是保护人民的,当人民的勤务员;旧警是镇压好人,保护坏人的,人民公安是保护好人,镇压坏人的;旧警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工具,人民公安是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号召他们解除顾虑,立功赎罪,坚守岗位,维持社会治安。并公布了《民警八项守则》,即:一、尊重群众利益,不得仗势凌人;二、维护法令,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纪律;三、爱护公物公产,不得玩忽职守;四、廉洁奉公,不得贪赃舞弊,假公济私;五、保护社会治安,不得包庇敌特,袒护坏人;六、积极忠诚服务,不得消极怠工,阳奉阴违;七、革除恶习,改造自己,不得赌博宿娼;八、加强改造自新,努力立功,将功折罪,不许言行相违,心怀叵测。并指派刘涌、张廷桢、武创辰3人为军事代表,设立公安军事代表

办事处,代表局长监督指导工作。召集旧警人员开会,连续开了两天。

2月4日,市局又向全市内城7个分局、外城5个分局、郊区8个分局派出了公安军事代表、联络员67人。至此,接管工作从上到下,逐级层层展开。最先是从收缴印信开始的。先由市公安局以谭政文局长的名义下达命令,责令警察局所属各单位将印信官章迅速上缴。同时宣布“嗣后关于人事、文书、收发用印等事项希与刘涌先生接洽办理;嗣后关于治安行政管理等业务事项希与武创辰先生接洽办理;嗣后关于武装部分事项希与张廷桢先生接洽办理;嗣后关于总务、财会事项希与陈白先生接洽办理。所有本局各单位未经办结文件应留待移交”。从而完成了市局一级的权力接管。接着市公安局又向各分局原警察局分局局长发出训令:“在未奉接管命令以前,应与公安军事代表共同负责办理事务,对外行文则公安军事代表副署;各分局改称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分局;印信保管由公安军事代表或指派专人负责。”

2月10日,北平市公安局正式发出了局字第0001号文件,文件宣布: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北平市警察局谭政文于2月2日到职视事;原警察局各分局局长在未奉接管命令以前,应与公安军事代表共同负责办理事务;对外行文由公安军事代表签字。宣布从1949年2月10日起各警察分局的名称改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分局”;印信由公安军事代表或指派专人负责管理。

2月14日,市公安局除正式任命了以训练班及中社部干部为主的“内七外五郊八”分局局长外,还陆续任命了一批接管干部担任分局科、股和分驻所一级的领导职务,从而完成了分局这一级的权力接管工作。

2月17日,谭政文局长召开各分局长、警士代表和机关科室

新旧工作人员 1000 余人的大会,重申人民公安机关与国民党警察局本质的区别,再次勉励旧警人员要全心全意做人民的警卫员,忠实革命事业,为人民服务。宣布: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对原警察局所属各单位已经正式接管,从今天起,停止军事代表制。以谭政文局长的名义,向全市印发了 400 张《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布告》。

2 月 18 日,公安局工作人员进入前门公安街(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办公,启用公安局新印。大门挂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牌子,身着解放军制服的警卫战士替换了身着乌鸭色的国民党警察门卫。

当年,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就对旧警人员的接收、使用和改造提出了明确的办法,就是让旧警人员继续工作,让他们围着我们转。当时,确立的方针是粉碎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策略是粉碎旧机构,逐步洗刷坏分子。具体是先处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后处理一般旧警人员;先处理上层,后处理下层。对一般人员以教育改造为主;对特务、反革命分子以集中管训审查为主;有重大罪恶或现行活动的逮捕、关押;反动党团成员历史不清,又不坦白交待或品质不好、有劣迹、群众痛恨的开除,其中需要管制的交派出所和社会管制;对思想顽固,老弱病残,不称职,无改造前途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对旧警恶习不深,无劣迹,有一技之长者留用教育改造;对解放前不久参加旧警察的青年学生中思想进步、历史清白的一律留用,照常工作。对旧警机构则视其性质不同而分别采取解散、撤销或者改造的办法来处理。对人事部门采取了解散后重新改建的办法。对组训室、政工科、机要室、督察处、专员室这样的反动政工机构予以撤销;对秘书、统计、通讯、司法、刑警、女警、外管、消防、总务、行政、会计和警察医院这样的业务行政部门予以改编,而后划分为人事、侦讯、治安、行政四部分,分别归属成

为市公安局下设的四个处。与此同时,将各分局的旧机构原有的组室打散,依照市局的整编原则,改编成为秘书、政保、治安、总务四个科。在改编中,所有科、股长以上干部除个别情况外,全部改换为我接管干部。当时限于人力的原因,分驻所、派出所的人员机构仍维持原状。直到1949年6月,根据中央和市委指示,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取消分驻所。街政府的干部大部分转到派出所工作,这样所有的派出所里都有了任领导职务的接管干部。从此,公安局基层机构也以接管人员为主了。

在旧警察局人员中,要分清类别区别对待,该管训的管训,该使用的使用,不论对哪种人员,都不歧视和虐待,教育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如接管工作开始后不久有个旧警察的母亲病故了,这个警察的级别低,薪水少,家里生活很困难,无钱料理母亲的后事,尸体只能停放在家中,愁得不得了。想来想去就壮着胆子给市公安局领导写了个申请救济的报告,送上去后心里还直扑腾,不知能否批下来,也不知多久才能批下来。当时这个报告送到了刘涌的手里,刘涌看完后就在原信及封皮上批了要行政处给予补助。行政处接到信后马上做了安排,及时拨付了救济款。这个旧警察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简单的手续,这么短的时间里事情就有了结果;喜的是他的老母可以入土为安了。他几乎不敢想象眼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这要在以前,我这报告打上去,一级转一级,起码要转几个星期才能有结果。结果是啥还说不清呢。”这件事不仅使这个旧警察深受感动;对其他的旧警人员也有很大影响,使他们意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不歧视他们,共产党派来的干部都是清正廉明的,是关心、爱护并且肯于帮助他们的,使得大多数由不自愿地转变为自觉地向接管干部靠拢,心悦诚服地为接管干部工作。

旧警察局人员中,经过审查认定为特务分子的有400余人。对

这批特务分子的处理,严格掌握政策。市局通过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工作同志了解掌握一些情况。此外,还争取了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聂士庆协助我们工作。聂士庆曾任北平市警察局秘书主任,北平市民政局秘书,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聂长期效忠国民党、阎锡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血债累累,罪恶极大。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指示,营救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1月23日,警察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特务分子携枪逃散,聂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带领刑事警察大队军统特务及其他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这样有立功表现的人给予了宽大处理。对其他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有劣迹、底细不清的人,市局领导研究决定将他们全部集中,成立管训队,做进一步的审查和清理。

提起聂士庆,这里有一段故事。一次刘涌、冯基平等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参观当年军阀残酷杀害李大钊所用的那座绞刑架,在上天安门城楼时很拥挤,冯基平胸前佩戴的一只派克牌钢笔让小偷偷给扒走了,回来后大家都很气愤,认为这些小偷偷太猖狂,竟偷到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头上来了。当天晚上刘涌就找到了旧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聂士庆,说了钢笔被窃的事。不料第二天刚一上班,聂士庆就把钢笔送来了。这件事,说明旧社会里警察与盗贼是相互勾结的关系,因而对旧警人员必须进行教育和改造。二也说明了经过工作,使得旧警人员对共产党人很信服,很敬佩,还能为共产党办事。

接管过程中,除对库存的冲锋枪 27 支、机枪 199 挺、长短枪 12133 支、小炮 15 门、炮弹 24708 发,各种子弹 1356376 发收缴外,对保警总队和旧警人员手中的武器也进行了收缴,这是一项很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保警总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和嫡系军官控制的武装队伍,有官兵近 2900 人,编为 6 个大队、18 个中队、一个车巡

大队、一个军乐队。4名总队、副总队长中有3名是军统特务、1名是中统特务；20多名大、中队长中特务占了70%以上。每个大队配有两个步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有一个手枪班，其他人员配有三八步枪。在机枪中队中配有重机枪4挺、轻机枪2挺，步枪62支，其他为驳壳枪、勃郎宁手枪等，是一支装备精良、有一定战斗力的反动警察部队，担负着国民党重大活动的警卫和镇压革命的任务。五四运动以来，保警总队参与了历次镇压民主的任务，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为此，谭政文局长召集刘尽中、张廷桢、刘涌多次开会，进行专门研究。军人出身的张廷桢深感要让敌人缴械投降，没有武装做后盾的困难性。谭政文指出：收缴保警总队的武器事关重大，对消灭城内反动武装有重要意义，对城外待编的傅作义部队也有重大影响，所以不管困难多大，必须做好，防止拒缴或携枪潜逃的危险情况出现。刘涌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我们手里没有兵，但是我们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促其缴械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凭借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影响，利用警察和保警总队的上层、中层分子，争取下级官兵，联系愿意接近我们的分子，运用和平接管的权利，提出了“民主改编，争取改造，立功赎罪”的口号。2月4日至8日，经过深入细致地层层做工作，终于在我公安大队的指挥、监督下，收缴了旧警察手中的武器，计机枪152挺、长短枪9987支、战刀873把、手榴弹5954枚及子弹1145932发。

接管期间，将了解到的特务机构组训室、政工科、机要室和官僚机构督察处、专员室等予以解散。共接管旧警人员13635人。其中，职员2169人，警长和警士9147人，公役2319人。经审查发现有特务、特嫌和重大反革命分子501人（均送清河大队继续审查、清理）。到1949年底，已处理和离职的6922人，剩下的大部分精简还乡和转到建筑部门，只有极少数留用。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

作，消除了不安全隐患，解除了后顾之忧，巩固了新生政权。

接管期间，全体军事代表、接管人员，为了社会的安宁，他们每日加班加点，忘我工作。但每天吃的却是窝头、小米饭、青菜，身上穿着灰粗布军装，脚上登的是解放区妇女做的“支前”军鞋，过着当时北平劳动人民最低水平的生活。局里当时的食堂没有夜餐，劳累一天晚上又继续加班的同志们想吃点东西，只能到离市公安局所在的公安街不远的前门大街外夜市的小吃摊上吃。一次，治安处处长赵苍璧加夜班坚持不住了，拉上刘涌直奔前门夜市，从小摊上买碗新鲜的老豆腐和刚出炉的火烧，热热乎乎地吃下肚，这在当时就觉得很高兴很满意了。他们每谈起这事仍记忆犹新，余味浓浓。然而，他们在和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西服革履、长袍马褂的社会名流打交道时，心里是那样的坦然和豪迈，表现出来的是高昂的斗志、超人的工作效率。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是那样淋漓尽致，赢得了北平上下各阶层人民的崇高赞誉。

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军管会肩负的任务相当艰巨和浩繁，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亲自主持制定了接管工作和恢复社会秩序等大政方针。彭真提出公安工作首要任务是把敌情搞清，并具体提出了肃清反革命要“先武后文、先上后下”的方针，即先迅速抓捕搞行动破坏的武装特务和阴谋暴动的匪徒，先清理上层反动分子，“擒贼先擒王”等。谭政文、刘涌、冯基平等努力落实彭真的指示，恪尽职守地开展工作，经过全局公安民警齐心协力地工作，使北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巩固了新生政权，恢复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人民生活，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前夕，彭真提出北京市委组建政法部，以便适应形势的发展，更好地开展工作。经彭真提名，市委决定将已任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刘涌调任市委政法部部长

(1956年至1966年),彭真为此亲自找刘涌谈话,阐述了成立政法部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并提出了工作的任务与要求。刘涌表示接受任务,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 对周维炯任职的辨证

徐修宜

周维炯，豫东南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他领导的商城起义，是鄂豫皖边区人民继黄麻起义之后的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他过早地牺牲，因此，有关工具书在介绍其任职时，往往出现某些讹错。如一些工具书，认为周维炯“1930年，任前敌指挥部指挥，率领红三十二师与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三师共同战斗，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sup>①</sup>。此说有误。笔者与周维炯同为安徽金寨县人，加之专业的需要，曾对周的革命活动进行过调访，从未发现他任过鄂豫皖前敌指挥部指挥，也没有发现过他率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师共同战斗。当时，既没有前敌指挥部这一机构的存在，红军三个师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

翻开鄂豫皖苏区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927年11月13日，鄂东北地区的黄安、麻城两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从而揭开了鄂豫皖边区人民斗争的序幕。在这次起义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1929年5月6日，豫东南地区的商城县人民举行起义，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1929年11月8日和19日，皖西地区的六安、霍山两县人民举行

---

<sup>①</sup> 《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04页。《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也持此说。

了六霍起义，“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两个游击纵队在六安七区流波疔胜利会师。在中心县委召开的常委和游击队党团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任命徐百川同志为师长。”<sup>①</sup>这是鄂豫皖边区人民组建成的第三支红军部队。这一史实说明，1930年1月20日前，为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创立时期，这一地区只有红三十一、红三十二师，没有红三十三师这一红军的建制。

1930年1月20日，即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成立后，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仍分别活动在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地区，皆各自为政。正如知情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这三个地区还是分散的，没有联成一片；党的组织相互虽有联系，尚未统一起来；红军虽有统一建制番号，但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sup>②</sup>事实说明，红三十三师成立后，周维炯同样未能任前敌指挥部指挥，也没有率领三个红军师共同战斗。

为了统一鄂豫皖边界地区的三支红军部队，以利于展开更大规模的斗争，1930年“三月十八日，党中央又指示（第一次指示信为同年2月25日，决定把分散的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统一的鄂豫皖边特委——笔者注），将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直属党中央指挥。四月，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于黄安北部箭厂河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将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师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并成立了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3个师

<sup>①</sup> 《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sup>②</sup> 成仿吾著：《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鄂豫皖边特委、革命政权的建立和红一军的组成，统一了边界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把这个地区的三块根据地结成一个整体，标志着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的形成。”<sup>①</sup>这一事实告诉我们，1930年4月前，周维炯未能任前敌指挥部指挥和率3个师红军共同战斗。同时，我们从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也可以发现，若周维炯在此前曾任过前敌指挥部指挥并率3个红军师共同战斗，那么，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中不可能没有他的任职。在新编红一军中，周维炯由原红三十二师师长成为红一军第二师师长。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周维炯从1929年5月领导商城起义（起义地区在今金寨县境内），到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改组派”名义，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为止，他始终担任师长一职。对此史实，有关文献中有着清楚的记载：“周维炯从立夏节起义（即商城起义——笔者注）到第二次反‘围剿’结束（1931年5月底——笔者注），一直担任师长职务。”<sup>②</sup>

在此还需指出的是，工具书中出现的这一讹错，可能是条目的编写者误解了有关书刊中关于周维炯传记中的内容。如《江淮英烈》一书在谈到有关问题时指出：“维炯同志很快同三十三师取得联系，准备扫除商南和皖西边界残余之敌，使两块根据地联在一起。经过协商，成立了前敌指挥部，维炯同志与徐百川分任正副指挥，兵分两路，南北合击……从此，豫南、皖西根据地联成一片。”<sup>③</sup>我们如果以这样的说明，去认定周维炯任前敌指挥部指挥，率三个师的红军共同战斗，此说同样值得商榷。因这时的前敌指挥部它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和有关方面批准成立，它是为协调两师之间的行动而成立的临时性机构。这一组织是地区性的。由于鄂豫皖边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2页。

② 《不屈的共产党人》（4），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③ 安徽省民政厅主编：《江淮英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212页。

区是由3个地区举行的武装起义,从而决定了这个地区的任何一方领导人,都不可能去领导另外的两块苏区根据地和两支红军部队。只有中共中央作出统一的决定和派员出任领导,统一方能实现。

据上之所辨,笔者的结论是,1930年4月前,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作为红三十二师师长的周维炯不可能任前敌指挥部指挥,率3个红军师共同战斗。1930年4月后,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周维炯任红一军第二师师长,他也未在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中任职。

## 关于“毛泽东预言美军仁川登陆”的时间考

〔韩〕徐相文\*

韩国战争(以下简称韩战)爆发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的仁川登陆作战是逆转整个战局的重大战役。根据俄罗斯近年来公布的有关文献记载,毛泽东曾经在战争发生不久的1950年7月初即准确地预见,美军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从仁川登陆,并通报金日成建构坚固的防塞以禁止敌人登陆。然而当时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兼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在他回忆的一些文献中提及自己在8月23日向毛泽东汇报美军登陆仁川的可能性,毛泽东即根据雷英夫的判断,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通知金日成着手备战并督促中共东北边防军的各项战备工作等,以便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

两者之间存在的时间差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却涉及这样一个实质问题:开启毛泽东派兵介入战争的意向究竟始自何时?

1950年9月10日至11日,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美国第一陆战师分乘66艘运输舰从日本神户港出动。紧接着,第七步兵师、第五陆战区也相继于11、12日从日本横滨及韩国釜山港分别驶向济州岛西南海面的集合点。被动员的运输舰共261艘,总数6.9万余人的兵力构成是由以韩、美两军为主共组的第十军<sup>①</sup>。美军登陆

---

\*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 至于仁川登陆作战的计划及部队编成,见〔韩〕国防军史研究所:《韩国战争》,1995年版,第392—401页。

仁川后,于18日占领金浦机场,20日渡过汉江。接着26日第十军与从釜山桥头堡北进的美第八军在乌山附近汇合,28日攻占汉城。

最初,对于仁川登陆,因地形和潮汐的障碍,不仅美国联合首长参谋部不看好前景,就连麦克阿瑟自己也估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sup>①</sup>。但结果却是登陆作战进行顺利。

仁川登陆作战的成功具有影响全局的重大战略意义:其一是造成了收复汉城的有利战斗环境;再者,夺取并控制仁川和汉城,即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及后援渠道,使正在南部战线的战斗力量处于瘫痪状态。有关韩战研究的一些专著指出:在美军登陆作战之前,毛泽东早就通报斯大林关于中共分析的相关预测,同时也劝告金日成先行预作部署<sup>②</sup>。这一论述的依据来源于当时参与分析、研究韩战战局的有关情况,并负责直接向周恩来与毛泽东汇报的雷英夫的两段回忆。雷英夫回忆说,为了获得对韩战战局的一个准确判断,有关部门的要员在8月中旬数次进行了辩论形式的讨论,从而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并认为是“美国想扭转朝鲜战局的一着很厉害的棋”<sup>③</sup>。该推论的依据如下:

一、美军13个师集结在洛东江三角洲一个狭小的滩头阵地上,凭借强固的工事,密集的兵力、火力和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坚持

---

<sup>①</sup>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p. 348-349.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朱建荣:《毛泽东的朝鲜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129-134页;Sergei N. Goncharov etc. *Uncertain Partners -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1-172;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7-149等等。

<sup>③</sup>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死守,既不撤退,也不反击,显系诱兵之计。

二、集结在日本的两个美军师即陆一师美七师,既不增援洛东江,又不在日本沿海布置防守,而是突击训练,并组成了第十军,说明这是采取新的战略行动开辟新战场的征候。

三、美英在地中海、太平洋的大批舰船,最近正在向日本—韩国海峡集结,这也是一个登陆和扩大战争的迹象。

四、韩国是一个狭长的半岛,南北长 800—900 公里,东西宽只有 100—300 公里,三面环海,可登陆之处甚多,如仁川、元山、南浦、群山、兴南等地都是,在这些地方之中,以仁川登陆对敌最为有利,它可以割裂进攻洛东江的朝鲜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又可配合由洛东江向北反攻之敌,形成夹击和包围人民军的战略态势。

五、美军第八集团军和麦克阿瑟等高级指挥员,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多在太平洋作战,有丰富的登陆作战经验,加上在韩国战场上,美国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组织登陆作战不仅可以发挥其优势,而且无论进退都游刃有余。

六、朝鲜人民军主力打到洛东江是个很大的胜利,但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这就是部队连续作战疲劳不堪,兵力分散,补给线延长 400—500 公里,后方空虚。从各方面情况看来,人民军的八月攻势实际上已逐渐由主动转为被动地位。敌人则相反,兵力集中,工事坚固,补给方便,可守可攻,战略上已逐步转为主动地位。

除了这 6 个情况外,还必须充分估计到一个根本问题,即: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头,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和工业基础,又有原子弹,现既发动了战争,又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用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指挥着 16 个国家的军队同朝鲜人民军作战,决不会甘心战争初期的失败,为了巩固其霸主地位和既得利益,必然要尽量发挥其优势,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更严重的较量,不到它的力量实在支

持不下去，它是不会轻易撒手的<sup>①</sup>。

雷英夫回忆说，他曾估计到美军将会于9月15日登陆仁川<sup>②</sup>。因此，在8月23日他把这一判断经过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sup>③</sup>。

雷英夫的回忆表明，首次预测美军登陆仁川可能性的是他本人负责的总参谋部作战室，而非毛泽东。毛泽东则是在听取雷英夫的汇报后才对战局趋势有了精准判断，并当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

一、命东北边防军采取一切措施务必于9月底以前作好一切准备工作，认为只要东北边防军9月底以前能够开到鸭绿江边并作好一切作战准备，我们就主动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二、立即通知北朝鲜、苏联方面：我们判断美军要在仁川登陆。并向他们讲清仁川登陆的利害关系，建议朝鲜人民军主力立即从洛东江一线适当后撤，布置一些部队在仁川进行防守，做好工事，以防敌人登陆。

三、要总参谋部、外交部密切注意敌人的登陆活动<sup>④</sup>。

如果雷英夫上述的回忆是事实，那么毛泽东在8月23日以前，亦即雷英夫提出汇报之前，并不可能预测到美军的仁川登陆行动，将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推论。而毛泽东下令采取的措施，特别是通报斯大林与金日成的这一项，确是8月23日以后的事。然而俄罗斯近年开放的相关材料所显示的内容就与此结论大相径庭。根据苏联驻北京大使罗申报告斯大林的内容所显示，当他在1950年7月2日听取中共对韩半岛的政军情势评估时，他获悉了毛个人

①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

② 雷英夫：《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

③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

④ 雷英夫：《音容宛在思海犹蒙》，程华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对于时局的判断：“美国能够调动驻日占领军十二万人中约六万的兵力投入韩半岛，在登陆釜山、木浦、马山等的港口之后，可以沿着铁路向北进攻。因此北韩人民军应加速向南挺进，以便占领这些港口。同时，毛泽东以为有必要在仁川建立坚固阵地，以加强汉城地区的防御。因为美军有可能登陆此处”<sup>①</sup>。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比雷英夫提出汇报还要早几乎两个月的时间业已预见美军登陆仁川的可能性。如果此说真确，那么毛对战局的预测应非以雷英夫的判断作为基础。

在罗申的公文不可能是造假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提出合理的假设：是否雷英夫在7月2日以前即已向毛泽东提出汇报，却在记意中误植为8月23日？若非如此，雷英夫的回忆即应属事实。而究竟是记忆的错置或者果为事实？据理推断，前者的可能性不大，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雷英夫对于朝鲜人民军与美国第八集团军沃克将军所统率的13个半师在洛东江一带相持不下，致战事呈现胶滞的正确描述，确实是7月初尚未发生的情况。

二、雷英夫曾述及他们获悉朝鲜人民军已经直指洛东江的战况情报分析，“正是酷暑8月”，证诸事实，金日成确实也在文告中宣布：“8月将是朝鲜人民取得胜利的一个月份”。<sup>②</sup>

三、雷英夫根据“作战室”所获得的情报资料引述：美国高级军事领袖们曾于8月份多次在东京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商的动向<sup>③</sup>，确实也是一项已发生、在时间上相符的历史事实。这些

<sup>①</sup> 〈罗申致莫斯科当局的电文〉(1950年7月2日)，大韩国外务部编译，《韩国战文书要约1949.1—1953.8》，第32页。

<sup>②</sup>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雷英夫：《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第146页。

<sup>③</sup>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

频密的会商正是为了8月23日召开于东京的战略会议预作准备的事前迹象。

雷英夫的回忆既有不容否认的事实作为支撑,那么,本文整个推理势将导向一项结论:毛泽东在7月初早已预见的仁川登陆,是在未听取雷英夫的报告前独自思考的结果。至于支持毛作出预见的理据为何?除非是来自于历史文献的佐证,否则在此之前,我们可以臆断毛的事前之明是来自想像丰富的军事直觉。

因为7月初的时刻正是麦克阿瑟亲自前往汉江战线视察战况,并初步构想逆转战局之反击作战计划(6月29日)后不久<sup>①</sup>,因此麦氏脑海正在酝酿中的仁川登陆构想不可能泄漏。为推进反击作战,麦克阿瑟在7月7日首次向华府请求增加军力,但直到7月23日,才致电呈报预定在9月中旬发动的登陆计划<sup>②</sup>。虽然目睹进行作战准备的新闻记者们作了关于登陆作战的有限报道,麦氏仍保持自我节制,作为一个成功登陆的因素,可以探知麦氏将视秘密进行为必要步骤。虽然在预备进行过程中,在釜山港码头的联合国军及南韩军队搭乘运输船为朝鲜人民军的间谍所目击<sup>③</sup>,但它毕竟是距离7月初太远的9月份之事。在整个韩战期间,把从西方得到相关韩战的情报及资讯提供给中共和北朝鲜领导层的斯大林也对于美军登陆的可能性一无所知,他算是藉由驻北京大使罗申的报告才获得了相关谍报。

其次,为了隐蔽登陆地点,联合国军在周密的计划下不断以欺骗佯动以及散播谣言的手法以混淆视听。譬如:密苏里号战列舰率领数艘驱逐舰于9月13日晨(仁川登陆2天前)出现在北朝鲜军

①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 PP. 333—334.

②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 P. 346.

③ 大韩民国国防部政训局战史编纂会编:《韩国战乱一年志 1950—1951》(Seoul:编者出版,1954年),第A39页。

队背后的要冲东海岸的三陟海面上,并且以其400毫米的巨炮开始炮击,佯装为登陆的火力准备。另外,特里姆盖号航空母舰和海伦娜号巡洋舰在炮击平壤的外港和镇南浦一带的同时,攻击清川江口的达阳岛,进行了欺骗和心理作战。对西海岸最适宜的登陆点群山实施了积极的佯动;第五航空队在9月5日至13日期间,以对仁川周围的轰炸完全相同的方法对群山周围50公里以内的公路桥和铁路设施等目标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而且9月12日夜,英国舰队组织美陆军上校路易斯指挥的美陆军袭击队和英国陆战袭击队在群山海滨登陆,进行以佯动为目的的战斗侦察,以便接着在群山登陆,收集情报,切断沿岸交通,防止朝鲜人民军对群山地区的增援<sup>①</sup>。

对于这些拟隐匿进行的计划而言,从麦克阿瑟在7月7日为了作战向美国政府发出电报到日后实施其对北朝鲜攻击的过程总的来看,上述的美军隐瞒作战,完全在毛泽东预测的“仁川登陆作战”以后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独自预料到了美军登陆的可能性及登陆地点。

从毛泽东预见至通报斯大林与金日成,其间脉络可以串连如下:

如同罗申的电报所言及的,毛泽东已在6月末7月初之间独自直觉美军会从仁川登陆。这就是毛泽东判断战争不易很快结束,而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一个端倪。因而,毛泽东在7月上旬指示聂荣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调往鸭绿江边集

---

<sup>①</sup>〔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高培等译校:《朝鲜战争》上部,(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503页。

结,并指挥执行必要的措施<sup>①</sup>。同时毛泽东多次指示雷英夫为首的作战室要员,“要注意韩战战况的变化”<sup>②</sup>。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8月23日在雷英夫进行上述报告以后,使毛泽东坚定了美国必将发动仁川登陆作战的看法,并立刻指示周恩来采取包括告知金日成等的上述三项措施。

另外,依据前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日后回忆,由于周恩来请求北朝鲜派遣特使前往北京,李相朝就被派到北京会晤毛泽东<sup>③</sup>。当时,毛泽东即指出美军有可能从海上迂回到朝鲜人民军背后从三个地点实施登陆,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个可能的登陆地点中,就包括仁川港。接着毛泽东要求李相朝尽速告知金日成,即刻部署防止美军登陆的措施<sup>④</sup>。

9月8日李相朝将毛泽东的言谈内容汇报金日成。但金日成忽视毛的忠告,一周后毛泽东忧虑的美军登陆行动果然在仁川发生<sup>⑤</sup>。

对于仁川登陆作战最早作出事前预言的是雷英夫,已几乎成为一个定论被公认,直到近年“罗申7月2日的电文”问世,才表明毛泽东才是最先预见仁川登陆行动的人。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雷英夫的8月23日汇报,使毛泽东更确定了自己的判断,并影响毛泽东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如提供重大情报给金日成,更加快军事行动的步伐。

在进行历史建构的工作时,参考的各种回忆录,具有不可忽略

---

① 毛泽东:〈关于同意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决议事项给聂荣臻的信〉(1950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② 雷英夫:《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第148页。

③ 〈李相朝回忆〉,1989年6月1日《韩国日报》。

④ 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军事史林》1990年第5期。

⑤ 〈李相朝回忆〉,1989年6月1日《韩国日报》。

的重要性。它们能弥补第一手资料之间的空白，也让研究家置身到从官方史料所感受不到的背景以及氛围当中，但阅读并把它们当作认识某些历史事件的凭藉，须有较扎实的旁证才宜使用。

本文所引用的“罗申的7月2日电报”中的相关记载被公开后，雷英夫在他新的回忆录当中增补了一段话：“事后我才知道，美军的这步险棋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了”<sup>①</sup>。这一段话正暗示着，历史事实的错落难辨，而雷英夫回忆中关于仁川登陆的内容为何被接受为定论，也在此获得了引向答案的指路明灯。

---

<sup>①</sup> 雷英夫：《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第150页。

##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介绍

王伟红 贺秀红

自从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以后，许多解放区都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里，我们介绍五种版本。

(一)《毛泽东选集》第一种版本是由苏中出版社于1945年7月出版发行的，为24开本的简装本。共发行了2万册。当时的售价为抗币6元。封面是纸质的，上面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右下角有一“1”字，表明当时仅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选集的编者集录了朱德、周恩来、李富春、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的文章观点，写了“论毛泽东思想”作为代序。全书共收集了毛泽东在1937年2月—1938年7月的著作11篇。其中有《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这11篇文章是毛泽东从抗战爆发后，针对如何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著作。这本《毛选》的出版，是第一次对毛泽东论文的收集和概括，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1946年7月由胶东新华书店出版并发行了《毛泽东选集》1卷，也是24开本的简装本，共发行了5000册，由新华书店印

刷厂印刷，封面也是纸做的，有一张毛泽东的小画像，左上角五角星中有“1”的字样，书名也是《毛泽东选集》，只是在扉页上增加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肖像的字和相片。它出版、选录的文章和苏中出版社的内容完全一样，共有 11 篇著作，也有集录“论毛泽东思想”作为代序，很有可能是苏中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翻版本。

(三)《毛泽东选集》第三种版本是 1947 年 7 月出版的，编印者是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发行者是新华书店晋察分店，总经售为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分售处是边区各地新华书店及各代销处。共发行精装 2000 册，平装 2000 册，版本是 24 开本，精装封面为红色烫金，书名为《毛泽东选集》。扉页后是毛泽东四张带着帽子的肖像，这本书是《毛泽东选集》全一册，全书共分为 6 卷，主要收录了毛泽东 1927 年 3 月—1944 年 10 月期间的著作共 38 篇，其中有许多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战时期的主要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这次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较前两次要完整得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四)《毛泽东选集》第四种版本是由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并出版的，分为上、下册两本，版本为 16 开，装订形式为红色布面烫金，封面标题为《毛泽东选集》，双白页后是一张毛泽东照片，全书共收录毛泽东文章 62 篇，主要是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 1927 年至抗战胜利 1945 年的主要著作，主要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

《反对党八股》、《关于抗战最后阶段的声明》等，其中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的文章 16 篇，其余 46 篇文章是抗战时期的著作。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著作，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毛泽东选集》第五种版本是 1948 年 5 月由东北书店出版并发行的。印刷者是东北铁路印刷厂。共出版发行了 2 万册，全书为 16 开本，封面装订是兰色布面烫金，封面标题是《毛泽东选集》，下面有一毛泽东侧面的印像，全书分为 6 卷，共收集毛泽东的文章 50 篇，主要是 1927 年至 1947 年间的重要文章，如《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重要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南。



## 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

[俄]阿·莫·列多夫斯基 著

陈 春 华 译

**编者按：**本文作者阿·莫·列多夫斯基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名汉学家。1942—1952年间曾在中国工作并参与解决苏中美三国关系的一些问题。作者试图以亲历者的身分记述与马歇尔使命相关的一些事件和问题，但由于作者认识的局限性，使其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记述有失客观和公允，也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本辑刊译此文旨在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参考。

自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私人代表驻在中国。他奉总统之命，在蒋介石所主持的中国政府和武装反对执政党——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谈判中进行调停。当时华盛顿正式宣布，马歇尔使华之目的，是使正在斗争的双方和解并制止中国业已爆发的内战。

众所周知，马歇尔的调停使命并未收到成效，未能使国共两党达成妥协。他于1947年1月返回华盛顿，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

在1942年至1952年期间，我有幸在中国工作并有幸参与解决苏中美三国关系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与马歇尔使命相关的一些问题。马歇尔是在国际局势开始复杂化，特别是反希特勒同盟和反日同盟的主要参加国苏美两国、苏中两国矛盾深化的背景下来华

的。在远东苏美两国对一些问题，首先是对履行关于日本的波茨坦公告的问题；其次是对制止内战的途径和解决引起这场战争的问题；再次是对和平安排朝鲜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分歧。美国首先掌握了核武器并用来反对日本的城市居民，对苏美关系的恶化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苏联由此看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看到了美国企图在国际事务中以军事优势地位行事<sup>①</sup>。

谈到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认为，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应当成为苏美两国间的一座“桥梁”，应当同他们保持同样的友好关系。这一思想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在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有具体反映。该协定的原则规定为苏联政府和蒋介石政府1945年8月14日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其他协定奠定了基础。上述协定作为建立远东战后和平及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得到联合国官方人士和各国人民的完全肯定，苏美中三国在远东的合作是建立远东战后和平及安全体系的基础上的。

然而中国内战的爆发毁掉了这座“中国桥梁”，并导致苏美之间，莫斯科南京之间彼此不信任。因美军在中国登陆，苏联产生了怀疑和忧虑。中国共产党要求美军立刻撤出中国，并中止对国民党的各种援助。苏联政府给予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军的存在和美国给国民党的其他援助，是挑起内战的重要因素。莫斯科完全赞同这种意见，且怀疑美国企图利用驻华美军，使中国屈从自己的权威，并像利用日本那样，利用中国以达反苏目的。

马歇尔使华前，新疆和东北是苏中关系中两个主要矛盾焦点。在新疆敌视苏联机构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公民的行动更加频繁。莫斯科把此事的责任归咎于蒋介石政府，指责蒋介石反苏。其实是新疆省长背信弃义和苏联的政策不完全得当所致。问题在于莫斯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56，目录：6，夹：47，案卷67。

科与盛世才的关系过于密切，莫斯科背着蒋介石秘密吸收他为苏共党员，且常常绕过中国政府，会同盛世才解决一切问题。盛世才则利用自己同莫斯科这种特别密切的关系，以达分立主义目的。蒋介石决定除掉盛世才，并根据平等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使新疆的苏中关系正常化。盛世才在竭力保住政权的同时，决定断绝同莫斯科的特殊关系，并煽动警察对苏联公民和苏联机构采取粗暴的行动。苏联对此表示了抗议，并运回了在新疆的企业的苏联设备，召回了自己的专家，中止了同新疆的一切公务联系。

东北也是最复杂的矛盾焦点。由于苏军迟迟不撤、莫斯科拒不允许国民党军队经旅顺大连进入东北、莫斯科宣布为“红军战利品”的前日本财产，即工业企业及其他设施的分配问题、部分工业设备已运往苏联等这类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使莫斯科和国民党在东北的关系极为紧张。由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已进入东北，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而展开的斗争，使莫斯科与南京的关系急剧复杂化。在这场铸成内战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是苏联的物资技术援助，国民党所依靠的是美国的支持，美国在东北拥有自己的利益，希望将“门户开放”政策扩大适用于东北。

当时中国一片混乱，经济彻底崩溃，百姓大批死亡。中央（国民党）政府军正向华北进发，以解除那里的日军武装和建立自己的政权。共产党军队拆毁铁路，炸毁桥梁，拆毁电话线等，竭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前进。内战过程中重要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电站发生故障，煤矿被淹，列车颠覆，城市的燃料、电力、水和粮食供应中断，轻重工业工厂停产，失业增加。大批大批人饿死病死。

马歇尔使华前，苏美英三国外长曾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建立欧洲和远东战后和平问题。鉴于中国内战爆发，莫洛托夫建议讨论中国形势问题，中国政府对讨论这一问题又无中国政府代表与会提出了抗议。但因莫洛托夫的坚持，驳回了抗议。会议根据苏联

的建议讨论了中国问题并通过两项决议。第一，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声明：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化必须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实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国民政府全部机构和停止内战。第二，苏美两国外长达成协议“最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中国撤出苏美两国军队”。

正准备从东北撤军的苏联方面坚决要求两国同时撤军，但担心美国不撤。因此，莫斯科要求美苏两国军队同时撤军，并明确撤离期限，届时应撤离完毕。美国拒不接受苏联建议，声明说，他们并不打算把美军滞留在中国，将把美军撤走，但拒绝确定具体期限。结果通过折中的提法，撤军期限问题其实并未解决。实际情况是，莫斯科并未等到美军撤离，于1946年5月3日前，已将苏军撤离完毕。

莫斯科会议就中国民主化和停止内战问题发表的声明，成了马歇尔使华的委任状，而马歇尔只收到了一个方面的委任状。签署莫斯科声明的另外两国政府宁可不参加声明的切实实施。这就限制了马歇尔的调停活动。

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参加与否，均不可能同毛泽东达成协议。但他不敢拒绝美国政府的建议，以往形势危急时，美国政府曾是国民党的唯一支柱。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杜鲁门的建议，致电毛泽东，邀请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

共产党方面当时犹豫不决。早在1945年8月，毛泽东前往同蒋介石谈判，那是斯大林提出建议执意要他去<sup>①</sup>。关于国共两党在马歇尔调停下进行谈判一事，斯大林与毛泽东是否交换过意见，苏联大使馆未接到莫斯科关于此事的通知，当时我在大使馆任一秘。

1945年12月底，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后，通过其驻重庆办事处与苏联大使馆联系，请求会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正如我们所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2，页：98—121。

料，中共代表团打算同苏联大使讨论同国民党谈判以及马歇尔参加谈判的问题。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大使馆不与冲突双方讨论这类问题，不提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任何建议。从后来解密的文件中发现，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有过十分秘密的信函来往。但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大使馆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们当时执行的是禁止他们参与国共谈判的指示。

因此，苏联大使馆当时不该同中共代表，特别是同从延安前来谈判的代表团断绝联系，而应该给他们提些建议。当时莫斯科不想让国民党人和美国人认为，共产党是按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行事的。于是，大使馆做出决定，大使不要会见中共代表团，设法以生病为由不同他们会见。我奉命接见了他们，接见于1946年1月1日举行。中共中央委员、八路军首长叶剑英将军，中共中央委员、新四军副司令员王若飞来到苏联大使馆。我代表大使对他生病不能亲自接见和责成我接见他们表示歉意。他们在说明来意时说，中共代表团前来重庆，是因为接到了蒋介石就停止内战问题、就美国总统私人代表马歇尔参加谈判问题进行磋商的建议。因此，对中共代表团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共代表团是否应该同意马歇尔参加谈判，因为他参加谈判就意味着美国将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当时中共代表团曾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不要期望美国代表参加谈判会有什么好结果。马歇尔当时竭力对中共代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出有利于蒋介石的让步。当时叶剑英和王若飞表示，该问题业经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长时间讨论，但未能做出任何决定。中共代表在紧急请示延安的同时，决定征求苏联大使的意见。他们希望苏联大使给予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蒋介石和马歇尔打算在谈判进程中提出东北问题。中共代表团认为，由于该问题触及到苏联的利益，苏联方面应参与讨论。

叶剑英和王若飞谈完这两个问题之后，坚决请求将此事报告

给大使，以便他给他们提些建议。因第二天中共代表团要同中央政府代表举行会谈，他们急需他出谋。

我向大使报告了会谈的情况，对所提问题须做的回答也征得了他的同意。接着谈及中共代表团对我抱有期望时，我说，关于中国民主化和停止内战的谈判，中共代表团应请求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和给予指示，对这一问题苏联大使馆不可能给代表团提任何建议。根据苏联大使的意见，关于东北，无论中央政府，还是马歇尔，尚未正式提出这一问题，讨论它还为时尚早。至于和平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和停止内战问题，苏联政府的立场相当清楚地反映在莫斯科会议公报上。<sup>①</sup>

在这次与叶剑英和王若飞会谈之后，苏联大使馆同中共代表团的接触少了。出于策略的考虑，我们竭力不鼓励他们。苏联大使馆从许多来源，其中包括从美国代表那里得到有关谈判的情报。比如，过去我们同美国大使赫尔利保持着良好的接触。现在同马歇尔和新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保持着这种友好接触。司徒雷登于1946年7月10日被任命为此职，接替赫尔利。马歇尔在抵达重庆后的最初几天里便正式拜访了苏联大使。1月8日，苏联大使馆设宴，马歇尔应邀出席。宴会上只有美苏两国外交官，进行着十分友好的交谈，当时我也出席了宴会。马歇尔说，美国人渴望美苏两国互相理解，渴望本着二战期间我们两国在共同斗争中所确立的合作精神发展两国关系。他强调指出，这种合作目前在中国特别需要，因为他来华的使命是实施莫斯科会议在苏联倡议下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因此，他期望与苏联大使馆合作。

马歇尔指出，他对俄国一向怀有友好的感情，钦佩苏联人民在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4，夹：253，案卷：22，页：20·21。

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以及苏联在战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1937年苏联飞行员奇卡洛夫、拜杜科夫和别利亚科夫勇敢地飞越北极前往美洲,便是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中突出的一例。马歇尔讲述了美国舆论界和官方人士是以何等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他本人也有幸在美国官方人士中第一个欢迎“奇卡洛夫一行”,当他们在华盛顿州万库维尔军用机场降落后,他马上在家中接见了他们。据他说,“奇卡洛夫一行”是穿着皮衣飞到气候炎热的美国的。为了让他们脱去熊皮和鹿皮大衣,换上普通的男式服装,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衣服,供他们穿用。

马歇尔在谈及自己使华的目的时说,他与蒋介石会晤之后,便开始同各种政治思想倾向的党派和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严重困难,使解决他所面临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比如,他指出,同他谈过话的所有中国人都赞同中国存在着尖锐的问题和必须尽快予以解决这一“思想深刻的论断”,但谁也不知道摆脱危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所有中国人的一致意见是国家必须民主化,但谁也提不出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办法。马歇尔说,照他的意见,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什么是民主化尚无明确的概念。在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落后松散状态下,未必可以期望将民主方式运用于政府机构和确立国家立法原则方面。中国的民主原则应由上层来确立,因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进行广泛的人民选举。

马歇尔指出,在反对派中唯有中国共产党组织性最强,目的最明确,不过目前中共的纲领未必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还补充说,切不可忘记在中国居民中农民占多数,他们对政治口号毫无兴趣。他们只希望减轻他们的税务负担和军役,这一向是中国农村破产和贫困化的原因。老百姓对战争已感厌倦,他们不可能欢迎以武装斗争推翻现行制度的思想。马歇尔说,国民党完全有能力

通过渐进的办法使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国民党“作为最广泛的党,对中国的民主前途注定起决定性的作用”<sup>①</sup>。

马歇尔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绝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正确。由于他提到的历史形成的特点和传统等,中国并不准备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他在这方面无疑是正确的。何况在内战情况下也不可能进行彻底改革。急剧转向民主也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每个省,甚至整个地区是督军、封建主的封地,他们拥有军队,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但往往根本不服从。要他们放弃无限的权利和特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马歇尔抵达中国后就十分清楚这一点,然而美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并不清楚,特别是那些进行鼓噪宣传的人,要把西方的民主模式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马歇尔同中国人交往时很有分寸。但他承受着美国对中国国内形势宣传的压力。

中国农民对民主口号毫无兴趣,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马歇尔在这方面也是正确的。中国农民的确渴望减轻税务负担和军役。但当马歇尔谈及农民不可能欢迎以武装斗争推翻现行制度的思想,他就错了。照马歇尔的意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正是因为他们能把“不受欢迎的口号”变得受欢迎,他们向亿万少地、无地农民提出夺取地主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发给他们武器,率领他们斗争,推翻国民党政体。国民党政体不能及时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这条对农民最重要的原则,放弃了孙中山的旗帜。而共产党人举起了这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造成国民党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此,而不在于他们未能实行美国政治家们提出的中国政治改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4,夹:253,案卷:22,页:31-36。



革建议。

蒋介石一方面接受了杜鲁门提出的马歇尔以国共两党调停人的身分参加解决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建议,同时又决定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身负特殊使命前往莫斯科,以征得斯大林同意由中国政府军接收东北,由中央政府控制东北,说服斯大林不要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人,要促使毛泽东放弃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同国民党合作。为了促使斯大林赞同这一立场,蒋介石授命蒋经国运用其全部外交才能,运用在苏联多年生活和工作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使斯大林相信自己的父亲以及自己的父亲所领导的政府最真诚地期望同苏联结下最亲密的友谊,在各个领域,包括在国际事务中协调中苏两国行动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蒋介石怀疑马歇尔能帮助他同共产党人达成谅解。他认为,华盛顿单方面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需要寻找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另一把钥匙,照他的意见,这把钥匙在莫斯科斯大林手中。

据苏联大使馆所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想亲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积累下来的全部问题,以改善苏中关系。但他不敢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自己出访莫斯科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把握得到肯定的答复,他不想一旦被拒绝而“丢面子”。蒋经国同苏联大使和其他苏联外交官会谈时,曾暗示他父亲有这一愿望,而苏联方面对这一试探却没有反应。于是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以自己的私人使者的身分,前往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

关于苏联政府曾邀请蒋介石出访莫斯科,但蒋介石没有接受邀请的说法,曾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版物中传播。然而苏联大使馆当时并不知道这一邀请,我尚未发现苏联的档案能证实这一事实。我认为,蒋介石对美国人表示自己应邀出访莫斯科一事,目的是向美国人出示“莫斯科这张牌”,以便取得更多的美援。斯大林亲自接见蒋介石并不是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战术。斯大林不

愿因向蒋介石承担某种义务而束缚自己。何况他出访莫斯科可能损害克里姆林宫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前往苏联，但斯大林出于政治考虑，认为这种会见是不适宜的。众所周知，毛泽东来莫斯科是在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元首之后。在那以前，斯大林宁愿国共两党在政治、外交方面去斗去。

斯大林与蒋经国曾就苏中关系中的全部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两次会谈。蒋经国在谈及自己的使命以及在重庆交给他的任务时说，蒋介石派他像见“私人朋友”一样见斯大林，他（蒋介石）请求他（斯大林）帮助解决国共两党冲突和中国统一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蒋经国转达了蒋介石的坚决保证：他不打算消灭中共，而期望同中共合作，为此，必须使中共放弃消灭国民党的企图。蒋介石认为，唯有斯大林的劝告和威信能使中国共产党人做到这一点。

蒋经国指出，蒋介石同意中共在与政府商定的限度内拥有自己的军队，同意中共在政府行政监督下拥有一定的地方。不过，蒋介石要求中国全部军队要服从最高司令部的统一命令，而所有地方政权均在中央政府监督之下。共产党不同意这些要求，这就使中国统一问题陷入僵局。

斯大林表示赞同蒋介石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他说，蒋介石是对的，而共产党是错的，他还强调指出，一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个军队。斯大林指出，不过共产党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不向他征求意见。斯大林在答应蒋经国的坚决请求时说，只有在共产党向他征求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他才能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按照与蒋经国会谈时所讲的精神发表这些意见。斯大林指出，如果他主动向共产党人提出意见，而共产党人又不听从，他会感到很尴尬。<sup>①</sup>

斯大林完全赞同蒋经国所讲的蒋介石对苏中美三国关系的政

---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2，页：100--105。

策。此外，他还对美军驻在中国表示忧虑，并且指出，美军必须尽快撤走。斯大林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就解放的东北地区的日本企业问题提出的建议，他坚决表示，这些企业是“红军的战利品”，但莫斯科愿意在苏中两国平等伙伴的条件下共同利用东北的工业联合企业。他还强调指出，东北“是苏联的地区”，美军也好，英军也好，其他外国军队也好，均不允许进入。至于中国的对内政策，斯大林说中国需要建立宽容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其他党派才能与国民党共存。斯大林回答问题时，还谈到：“国民党将作为民族自由党而存在。那些认为共产党将吃掉国民党的人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广泛、更有影响的党。”<sup>①</sup>

鉴于中国、中国人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作为领袖和有地位的人）处境艰难，斯大林对蒋介石表示了理解甚至同情。但斯大林并不认为可以迎合蒋介石的强烈要求，帮助解决国共两党冲突，首先是克里姆林宫改变对东北的政策。

蒋经国自莫斯科回国后，中苏关系的紧张状况并未缓和。斯大林认为新疆和东北是缓冲地带，是苏联的特殊利益范围。他依然不想干预新疆和东北范围以外地方发生的中国事件。许多重要因素，特别是战后最初几年国家经受的严重经济困难，不允许斯大林开展过于积极的活动。他担心苏联可能卷入包括华北地区在内的内战，他认为集中力量巩固苏联在东北的力量已足够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美国的政策和行动，即美国垄断了核武器、美军在中国登陆、美国对日本单方面进行监督、在远东和亚太地区建立了针对苏联的美国军事基地，使他感到忧虑。他还担心，美国利用强大的经济力量对经济很弱的中国进行控制，并企图向紧靠近苏联远东边界的东北扩展自己的影响。斯大林不相信国民党，他认为共产党是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2，页：118、133—134。

比较可靠的盟友，遂决定将东北交给共产党。

在马歇尔的使命中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这项建议是毛泽东作为停止内战的重要条件之一提出的，1945年11月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出访延安期间也参加了讨论。赫尔利同意将这一建议列入他与毛泽东拟订的在他（赫尔利）调停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日程。赫尔利自延安回到重庆后，将这些问题一览表提交蒋介石签署。蒋介石否决了这个日程，主要是因为各政治党派代表参加联合政府这一条。蒋介石认为这一思想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担心，在这个政府中起主要作用的可能是共产党人，以及中共党员秘密打入的自由民主党派组成的盟友。

马歇尔抵达中国后，积极推行赫尔利未能实现的联合政府思想。蒋介石依然加以抵制。为使他对这一问题及其他问题做出让步，马歇尔建议杜鲁门由华盛顿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1946年6月27日，杜鲁门致电蒋介石，要求在一个半月内，即7月31日以前同中共达成折中的协议。为了迫使蒋介石履行这一要求，杜鲁门下令根据援外机构的援助计划向中国提供的军需品和军用物资要稍加遏止。这些行动使蒋介石非常气愤。<sup>①</sup>但他不得不让步，并接受马歇尔关于成立“五人小组”的建议。已责成该小组在联合的基础上，对国家机构改革的各种问题加以研究。事情已发展到切实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毛泽东拒绝中共参加新建立的国家机构，因为这些机构自然不能保障中共起主导作用。

毛泽东的这一策略表明，当时毛泽东需要利用联合政府的思想同蒋介石做政治斗争。毛泽东竭力向中国和世界舆论表明，蒋介石是反动派，而他（毛泽东）是民主战士。不过，蒋介石一旦同意成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4，夹：253，案卷：22，页：143—145。

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这一思想将立刻失去任何意义。他不再需要联合政府的思想做斗争了，而积极努力以武力夺取政权。当时毛泽东打算取缔所有其他政党。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成例，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阶段，除中国共产党外，所有政党均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的力量。”

斯大林表示不赞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和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其他原则问题的立场。1948年4月20日，他致电毛泽东，在谈及毛泽东打算取缔所有其他政党时，指出：“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们认为，代表着中国人民中间阶层，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各个反对党还将存在，中国共产党只好吸收他们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领导地位。也许要这些反对党的一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宣布政府为联合政府，进而在人民中扩大这个政府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国民党代理人。”斯大林继而指出：“应当考虑到按照自己的政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至少在胜利后这一时期（这个时期有多长现在还很难说），中国政府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斯大林指出：“这意味着目前还不能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不能把土地私有制取消，不能把所有大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充公，不能把大土地占有者以及靠雇佣劳动生活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充公。还要等一个时期才能进行这种改革。”<sup>①</sup>

从不久前解密的苏联档案文件中发现，斯大林背着苏联外交部同毛泽东进行信函来往时，曾敦促毛泽东在转归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成立联合政府。斯大林根据来往信函认为，当中共代表不参加，蒋介石和马歇尔便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时，他们犯了一个严重

---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1，页：28—29。

的错误。斯大林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可以巩固国民党的地位，削弱中共的地位。国民党可能以和平民主的政党面貌出现，而中共因拒绝参加联合政府，将以“好战的党”的面貌出现。此外，斯大林还认为，假如国民党和美国人成立了中国联合政府，则美国和西方国家就有了捍卫中国民主政府而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很好借口。斯大林预先告知毛泽东，国民党和美国人可能企图改正他们犯的错误，掌握主动，成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斯大林建议毛泽东“不要推迟此事，解放后在北平成立联合政府”<sup>①</sup>。斯大林根本不反对中国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之后在南京成立联合政府。不过他认为，对中共来说，联合政府成立越早越好。

不过毛泽东认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1949年1月，米高扬秘密访华期间，毛泽东同他会谈时表示，没有政府中国共产党会生活得更好，因为如果有了政府，就意味着要联合，意味着做事要对其他政党负责，这会带来麻烦。毛泽东表示，他打算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南京之后成立联合政府。米高扬在转达斯大林的意见时，对毛泽东说：“如果在解放南京后成立政府能够加强政府的实力，那么无谓地推迟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就不会享有什么威信。对无党派群众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就不会像可颁布法令，要所有人履行的国家政权的决定那样有力量。”<sup>②</sup>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9月30日在北平成立了政府。国民党没有利用毛泽东提供给他们的机会，没有成立自己的联合政府。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信函判断，此事帮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忙。

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谈时说，中国共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1，页：53；案卷：39，页：7—8。

<sup>②</sup>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606，页：1；全宗：39，目录：1，案卷：39，页：7—8。

产党与美国进行的最初接触是在1944年,当时美国斯季鲁埃尔将军向延安派了美军观察组。周恩来指出:“当时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坚决不许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对马歇尔的使命也持这一政策。比如,我们拒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看来,他是指“五人小组”——作者),在该委员会中决定性的一票属于美国。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要求遵守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在同马歇尔会谈过程中,我们已看透美国人想对我们的军队进行监督。我们同美国人(在1946年2月)签署了改组军队的协议,因为这对我们有利。后来协议被撕毁,内战爆发,我们的办事处也撤离了南京。从这时起,我们开始坚决揭穿美国……虽然我们已断绝了同美国人关系,但美国人不止一次企图通过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士同我们建立联系。而我们只不过听听美国人同我们建立联系的愿望而已。”

周恩来继而讲述了1945年至1947年期间共产党士兵与美军之间发生的事件。由于这些“小冲突”,一些美国军人被打死,一些美国军人被共产党军队俘获,当中有一位美国将军。周恩来承认:“我们俘获了这位将军。从1947年5月起,他被扣押在山东,他不承认自己是将军。美国人佯装不知此事。”

周恩来随后向米高扬表示,林彪所部进驻沈阳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之间出现了新问题:“外国驻沈阳领事馆(美、英、法领事馆)暗示我们,他们不打算撤离,希望同我们建立事实上的关系。我们清楚,这些领事馆留下来是为了侦察我们和苏联的情况。我们不想在沈阳见到他们,我们正采取措施把他们孤立起来,给他们创造难以忍受的条件,迫使他们离开沈阳……因为我们正同美国人打仗,我们要把他们牢牢地控制起来,而对别国则不是这样……美国人在破坏我们的制度,我们要把美国孤立在自己的国家内。”<sup>①</sup>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页:18—19。

因此,指出斯大林不禁止毛泽东渡长江这一点很重要,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开始的莫斯科和北京大论战期间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斯大林经常劝告毛泽东对美国要审慎,不要挑拨。斯大林认为,美国见到自己的盟友国民党遭到不幸,不会丢下不管。他不排除在蒋介石最艰难的时刻美国会帮助他,并采取一切措施直至军事干涉,以挽救国民党政体。这不仅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也使苏联政府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防止美国采取行动,斯大林竭力使毛泽东不轻举妄动。比如,他建议毛泽东不要没收共产党占领区内的美国财产,要视共产党政权的巩固情况,视局势和美国的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sup>①</sup>

1948年11月,林彪所部进驻沈阳以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被围,停水,断电。总领事瓦尔德和领事馆一些工作人员,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和粗暴对待中国服务人员,而被捕入狱。

这一事件有可能导致远东发生严重国际政治、军事冲突。问题在于,杜鲁门打算宣布对中国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实行海上封锁,派海军陆战队在满洲登陆,以武力解救驻沈阳领事馆工作人员。他已授命军事部门和国务院制订实际行动计划。军事部门和国务院对这一问题研究之后,向总统作了完全一致的报告:切不可动武,这将给美国本身带来极严重的后果。他们解释说:只有在战争情况下才能宣布对海上封锁;阻止、搜查、击沉别国海上商船,就意味着同自己的所有盟国断交;东北地区处在旅顺海军基地和远东军区苏军的监视之下,派陆战队在东北登陆,可能导致美苏两国严重的军事冲突。因此,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即通过别国政府和联合国对中共政权施加影响,解救领事馆工作人员。

事件持续了近1年之久,终获解决,1949年10月底,沈阳法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页:21。



庭对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一案件进行审理之后,判处监禁3至6个月,但又指出,执行判决,驱逐出境。

马歇尔在中国逗留期间,即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战役中击溃林彪所部,取得重大胜利。一些研究人员,其中包括美国格林教授,指责马歇尔不许蒋介石借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战役中取得胜利之机,派军队向哈尔滨进发,粉碎共产党残余部队。格林认为,马歇尔和蒋介石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因这一错误,国民党于1948年失去了整个东北和自己的精锐部队。许多事实证明,在当时具体历史情况下,马歇尔有重要理由按自己的做法行事。否则他应该去无谓的冒险。在这场赌博中首先美国本身下的赌注太大。马歇尔未冒过险,他也不想冒险。国民党军队进军哈尔滨和北满可能给国民党、美国以及整个远东国际形势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后果。其实,林彪所部在四平街战役中失败惨重。周恩来在6月27日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谈话时,承认在持续40天的顽强战斗中共产党军队伤亡很大。用完了他们的全部弹药。林彪当时并没有力量阻止蒋介石军队的进攻。6月6日,林彪下令做好准备撤离哈尔滨,因为他认为,他不能守住哈尔滨。然而周恩来说,共产党达到了停战,这就保障哈尔滨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中。<sup>①</sup>

应当承认,这次停战是由于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了强大压力。马歇尔的观点受到杜鲁门的称赞。从以前公布的没人用过的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担心斯大林采取报复行动。他可能把苏军再次派往东北,那里是俄国的特殊利益范围。这是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苏中条约所公认的。马歇尔不能不考虑1900年至1901年所谓义和团运动期间俄中关系史上类似的先例。当时东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54,夹:253,案卷:21,页:37—40。

北发生百姓骚乱，使俄国修建的东省铁路遭到严重破坏。俄国政府当时曾把军队派往东北，捍卫俄国臣民生命财产。许多中国人同苏联外交官交谈时均表示担心：苏联政府可能采取类似行动。之所以产生这种担心，是因为苏军在东北地区逗留期间，中国人常对苏军士兵和军官采取敌视行动，而在苏军撤离南满和国民党军队进入南满之后，那里的许多苏联公民被殴打，受到残酷迫害，有许多人被打死。苏联政府不得不从国民党军队占领区把在中东铁路工作的苏联铁路员工撤回。简言之，斯大林有种种理由使苏军重返东北，更何况蒋介石若是进军集中了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国防利益的北满呢。马歇尔对这一切十分清楚，认为，如果把苏军派回东北，将使美国政府进退两难：或给予蒋介石直接军事援助，这可能导致苏美两国军事冲突，或容忍苏军回到东北，美国的威信将受到沉痛的打击。同其他将军不同，马歇尔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是十分老练的政治家，他不冒险。他认为，过于冒险和向斯大林挑战是不理智的。

5月24日，同苏联大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谈话时，周恩来是这样描述马歇尔在这个问题上的举止的。他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北平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预先通知蒋介石，美国不会帮助蒋介石进军北满。他们建议蒋介石保持住长春一线。周恩来说，根据美国人的计划，东北应划分为南北满两部分。长春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以北地区由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周恩来说，美国人认为，他们“协助蒋介石进一步向北进军可能招致同我们（指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一切关系，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可能遭到苏联的强烈阻挠”。<sup>①</sup> 杜鲁门承认，马歇尔从中国发回的电报表明：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4，夹：253，案卷：22，页：127—133。

“他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指望俄国人给予援助。”马歇尔为什么反对蒋介石进军哈尔滨，情况就是如此。

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定的苏中条约，苏联军队应在日本投降后3个月内离开东北。然而，应蒋介石的请求，苏军的撤离推迟到1946年2月1日，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期限以前还来不及把自己的军队调往满洲，并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地区。苏军司令部单方面推迟了撤军期限，于1946年5月3日才撤离完毕。

莫斯科解释说，之所以推迟撤军，是因为冬季运输大批军队有困难。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当时没有明说，当然，中国人当时已经猜到了。第一，1945年9—10月间，即日本投降后，美军在华北、华东登陆，美国第七舰队的舰只开进中国的海港，大量美国空军部署在中国各机场上，这使莫斯科非常忧虑。斯大林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对中国进行监督，就像在日本干的那样，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把大批美军部署在日本领土上。斯大林决定让美军尽快撤离中国，利用苏军推迟撤出东北之机，对华盛顿施加压力，以达这一目的。第二，1945年11月，毛泽东通过其驻哈尔滨的代表请求斯大林让苏军在东北滞留一段时间。11月20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彭真的电报中，谈到：“请我们的苏联朋友尽量推迟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的时间……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国民党和马歇尔向我们提出的苛刻条件。”电报指出，希望“苏联朋友”帮助他们不许蒋介石在两三个月内在东北聚集他的军队。毛泽东写道，中国共产党“正处在转折时期……我们恳请红军在这场斗争中支持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指示苏军司令、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满足中国共产党人这一请求：阻止国民党调动军队，给共产党人创造机会，把华北的部队调往东北，建立相当强大的军队，以便同国民党争夺东北。斯大林决定设法让中国共产党人执掌东北政权。同蒋介石和

国民党政府相比,他更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斯大林把美国视为主要对手,特别在美国垄断了核武器以后,他认为,在自己的远东地缘政治战略中,在对抗美国战略方面,东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蒋介石看到驻扎在东北的苏军在为共产党人的利益效力时,便设法使苏军尽快撤离,并向马歇尔求援。下面是马歇尔1946年2月2日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谈及这一问题的情况:“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昨晚前来访我,通报说,东北事态在急剧发展。他说,几天前他召见了俄国大使彼得罗夫,问明为什么2月1日前苏军未撤离东北,这是苏中条约和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明文规定的。彼得罗夫回答说,他要征求一下莫斯科的意见,然后将向中国政府通报苏军撤离情况……王博士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指出,东北苏联当局曾‘非正式’建议中国当局说,俄国期望将它有权作为战利品而得到的生产设施让给俄国,如果中国同意俄国这些要求,则苏军可能提前撤离。把苏联所谓的‘战利品’让给苏联,就意味着把百分之五十的拥有经济项目或实际分摊东北每个经济部门的权利转交给了苏联。这里包括共同利用自然资源,如煤矿、电力系统和国家一切重要工业企业之权。王世杰对彼得罗夫表示,中国政府不同意这些要求,在苏军未撤离之前,无论如何不可能就解决合法的军事战利品问题进行谈判。他提醒说,中国政府在苏中条约中已做重大让步,不可能为解放东北而再付出代价,何况,当时是在威胁下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

马歇尔建议王世杰“假如苏联承认他们的把军事战利品列入他们有权得到的租让经济企业的要求,他们也不要对苏联承担任何义务,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强调指出:“时间对苏联不利,因为苏军在东北驻扎的时间越久,全世界对苏联蓄意破坏条约就看得越清楚。”

关于军事战利品、关于工业和其他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设施

问题,当然是重要的问题。苏联政府的确希望在苏军撤离东北以前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不是延迟苏军撤离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第一,斯大林为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机会,将其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军队调往东北,在那里聚集力量,以便同国民党斗。第二,斯大林把苏军留在东北是想以此给美国施加压力,促使杜鲁门让美军与苏军同时撤离中国,这也是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所坚持的意见。

王世杰说,马歇尔是对的,苏军继续滞留在东北在外交方面将有损于苏联的利益。苏联政府也清楚这一点。斯大林不想提供借口,让人指责苏军介入国内冲突,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指责苏联因而违背苏中条约。斯大林不打算停止对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但决定给予援助要以更巧妙的办法,而不是以苏军直接介入国共两党斗争。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首先是苏联不愿看到的中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反应(国统区知识分子和青年掀起了要求苏军尽早撤离的群众性示威浪潮)。苏联政府决定不等美军撤离,于1946年5月初首先将苏军撤离东北。

美军继续留在了中国。表面上美国政府说把军队派往中国是希望帮助中国解除东北以外地区的日军武装,并使他们撤离中国。蒋介石政府也正式承认,中国政府向美国总统提出过这一请求。对大批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登陆做这种解释不能令众多的中国人信服。

许多中国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坚持8年抗战,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没有外援情况下,使无条件投降的日军放下武器,何况中国政府还有300多万军队。对解除日军武装和要日军离境来说,中国的交通工具不够用。不过美国可以提供交通工具,无须向中国派兵。中国人是这么想,这么议论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派美军登陆是美国企图帮助国民党

政府挑起内战,压制“民主力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称作“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报道中宣言:美军参加了对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行动,轰炸了共产党占据的城市和乡村,屠杀和平居民,等等。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同苏联外交官交谈时,中国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承认:美军并未参加国共两党军队的交战,共产党军队只不过与美军士兵偶然发生一些“小冲突”。

蒋介石请美军来中国,当然是期望他们帮助他解除日军武装并使其离境,帮助他同武装的反对派斗争。不过美国领导人当时产生了相当清醒的看法,不再给予蒋介石最希望得到的这些援助。杜鲁门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部不许美军直接介入中国国内军事冲突。可以认为,把美军派往中国大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显示军事力量,而不是以直接介入中国的冲突,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武装的反对派施加影响,迫使他们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看来,显示军事力量是指加强美国在华地位。不过大批美军在中国登陆,长期驻在中国,恰好适得其反。

美军来华使本来危急的中国国内形势更加复杂。中国共产党把美军来华视为外国武装干涉,威胁中国独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把美军派往中国多半不是为解除日军武装,而是为帮助蒋介石解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他们把马歇尔的使命视为给共产党设下的“狡猾的圈套”,以强硬态度迫使共产党和解,这严格限制了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他们是从这一观点来观察马歇尔使命和美军作用的。

在美国政治家中,马歇尔第一个明白了美军驻在中国给中国和美国本身带来了巨大损害,在中国与世界舆论面前败坏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名声。马歇尔建议杜鲁门尽早将美军撤离中国。

1946年3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称,苏军

将于4月15日前撤离满洲全境。马歇尔得知此事后，命令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提前做好美军撤离准备。

蒋介石政府坚决要求美军留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则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中国舆论界的反美行动在加强，而美国政界、军界对这一问题也在进行激烈的争论。马歇尔依然坚持接受并实行他的建议，理由是美军驻在中国将使中国局势更加紧张，会激怒中国舆论界，并破坏他为调停做出的努力。

杜鲁门想支持蒋介石，并考验国会外和其他有影响的政治集团中的亲蒋集团的压力，杜鲁门并未匆忙做出最后决定将美军撤离中国。中国冲突双方的斗争并未停止。马歇尔看到自己努力进行的调停未能奏效，于1946年12月得出结论说，他应该离开中国了，让中国人自己决定如何摆脱危机吧。1947年1月初马歇尔离开了中国，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

总之，马歇尔的使命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这是早已注定的。正如斯大林所说，蒋介石与毛泽东彼此根本不信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本不想同国民党谈判。他们期望苏联给予援助，宁愿只以武力解决全部问题。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实际立场是中国可有两个政府，两个军队。对蒋介石政府而言，这种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双方绝对势不两立的立场，使马歇尔的使命陷入了绝境。若不发生内战，只是在美苏两国协调一致的努力调停下，和平解决冲突，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本来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苏联领导人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只是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由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的。莫斯科千方百计回避参加实际实施这一声明。毛泽东反对同蒋介石和睦相处和合作，并竭力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而斯大林又不想与毛泽东绝交。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调停失败是必然的。

（译自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9年第2期）